

魏知信 著

陳獨秀思想研究

南京大學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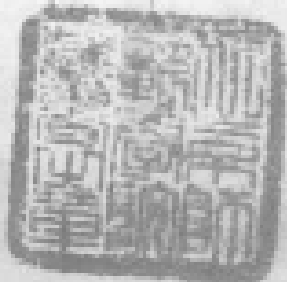


D389/18



魏知信 著

陈独秀思想研究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7·南京

1118472

陈独秀思想研究

魏知信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扬中县印刷厂印刷

字数：120千字 印张：4.625

开本：850×1168 1/32

ISBN 7-305-00057-4/B·2

印数：0001—5000

统一书号：2336·007

定价：1.20元

序

在中国现代史上，陈独秀是一位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我读了魏知信同志的这部著作《陈独秀思想研究》，深感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是一部个性十分鲜明的著作。从方法论上看，本书有两个特点：

一是坚持“分段论”。

在历史研究上，有一种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一段论”。陈独秀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背叛了党，按照“一段论”的评论方法，他就是叛徒，对他前期的活动、功绩一概否定。他背叛了革命，也就自我否定了他前期的功绩，否定了他自己的一生。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上，在60年代中期出现的对李秀成的大批判也采用这种方法。李秀成写了一份所谓自白书，就否定了他过去的一切，他只能以叛徒的身份挂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人们往往对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称之为“盖棺定论”。这是一种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片面的方法。

魏知信同志的这部著作对陈独秀的评价采取另一种方法，即分段论的方法。他认为：

“在辛亥革命时期，他已经是一个爱国、反清的革命民主派。”

“辛亥革命失败后，激流勇进，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五四运动以后，“由激进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成为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大革命时期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的前半生是同中国革命史和党史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一时期，中国革命事业的兴衰、党的产

生和发展、党的前进和后退、成功和失败，都和陈独秀密切相连。”

“大革命失败，则成为他走下坡路的转折点，在政治思想上从马克思主义者转向叛离马克思主义”，“在组织上从共产党的领袖转向托洛茨基反对派。”

抗战初期，他拥护抗日。“发表了许多与党的方针政策相符合相接近的政见”。

在一生的最后三年中，陈独秀“政治上消沉，思想上颓废”，“反苏、反共，顽固坚持资产阶级民主观，肆意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完全彻底地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作者分析了陈独秀在各个阶段政治思想的发展变化，并且探讨了发展变化的原因。除了客观原因以外，魏知信同志认为：陈独秀自始至终在理论上坚持“二次革命论”；“二次革命论”是陈独秀在政治上倒退堕落的理论基础。这样，陈独秀各个阶段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就不是各个孤立的现象，而始终是围绕着这个理论基础转动的。

本书作者还对陈独秀的个性作了一定的分析，指出他是一名旧型知识分子，“固执自信，清高孤傲”。对这种个性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对陈独秀各个阶段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的理解。

二是坚持“两点论”。

本书作者对陈独秀每个阶段的分析并没有简单化，而是全面地分析问题，坚持“两点论”。

陈独秀在辛亥革命时期，本书作者高度赞扬他的革命活动。但是，又指出：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使陈独秀一度陷入消沉苦闷之中。这年冬季，他在沪闭门读书，研究文字学，写成《字义类例》。”

作者分析了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中的作用，同时指出：陈独秀“在思想上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在世界观

上，他倾向法国启蒙时代的机械唯物论，而又受到康德、黑格尔、尼采、柏格森、詹姆士以至杜威等各唯心主义流派的影响。他头脑中既有唯物主义观点和某些辩证法因素，又有大量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观点。在自然观上，唯物论占主导；在历史观上，唯心主义占优势。他把精神的東西看作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离开人的社会性、阶级性而以抽象的人性、国民性解释社会现象。”

本书作者不仅指出，1919年以后，陈独秀向共产主义者转变，又指出：“陈独秀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常常表现出相互矛盾的趋向。在同一时间的不同文章中，甚至在同一篇文章中都有许多矛盾、混乱的思想言论。1920年10月1日《学说与装饰品》一文中，既强调中国‘有输入马格斯社会主义底需要，’又说：‘我们不懂适者生存的道理，社会向着退化的路上走，所以有输入达尔文进化论底需要。’”

在分析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原因时，本书作者既分析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又指出：“陈独秀的许多右倾错误同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代表有直接关系。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有其自身的主观上的原因，也有来自共产国际方面的原因。”本书作者还指出：“共产国际是中国革命的最高决策者。陈独秀基本上是一个执行者。尽管陈独秀也有自己的思想主见，不断提出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但是从根本上要受到共产国际的制约。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可以纠正他的错误，共产国际的右倾错误更因与他自身的右倾思想相吻合而积极贯彻执行，所以共产国际应当对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负主要责任。陈独秀个人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相对共产国际来说，是第二位的。”

对陈独秀的晚期，本书作者分析了他背叛马克思主义，又写了他的抗日爱国思想。

在研究方法上的这两个特点就使本书具有鲜明的、实事求是的个性。这种研究方法对于人们研究复杂的历史人物，我个人认

为，是有启发作用的。当然，对于本书的具体论点，读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看法作出判断。

读了这本书稿，愿意向读者作如上的介绍。

茅家琦

1987年3月于南京大学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激进民主主义者（1897—1919）

- 一、从儒学秀才到资产阶级革命派……………（ 4 ）
- 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11 ）
- 三、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21 ）
- 四、五四前期的思想弱点……………（ 28 ）

第二章 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1919—1921）

- 一、从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31 ）
- 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50 ）

第三章 大革命时期的功过（1922—1927）

- 一、大革命的初、中期功大于过……………（ 56 ）
- 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形成和发展……………（ 71 ）
- 三、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原因及其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86 ）

第四章 托陈取消派（1928—1937）

- 一、由右倾机会主义到取消主义……………（ 93 ）
- 二、从党内反对派到托洛茨基派……………（ 97 ）
- 三、铁窗五年……………（ 104 ）
- 四、中国共产党反对托陈派斗争的经验教训……………（ 110 ）

第五章 抗战时期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活动（1937—1942）

- 一、十字路口的徘徊……………（ 115 ）
- 二、抗战初期的政见……………（ 120 ）
- 三、最后的政治见解……………（ 129 ）
- 四、陈独秀晚年的生活和学术活动……………（ 135 ）

结束语

前 言

(一)

陈独秀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著名领袖之一。他上承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下启五四时期的一代革命知识青年。早在辛亥革命时期，他已经是一个爱国、反清的革命民主派。辛亥革命失败后，他激流勇进，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进而由激进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大革命时期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的前半生是同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一时期，中国革命事业的兴衰，党的产生和发展，党的前进和后退，成功和失败，都和陈独秀密切相连。1927年以后，陈独秀退出了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然而由于他的历史声望，在社会政治生活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在文化知识界仍有一定的影响。由于陈独秀在中国历史上的这种地位，我们学习、研究中国革命史和党史，便不能不研究陈独秀。

(二)

陈独秀的一生，总的说来，前期是一个站在时代前面，推动历史前进的叱咤风云的人物；后期从时代前进的列车中跌落下来，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角色。

他曾经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而又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为创立中国共产党作出了重大贡献而又背叛了党；参加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而又由于他的错误导致这次革命失败。研究陈独秀一生所走过的道路，可以引出深刻的教训，以为后人的借鉴。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如何对待陈独秀的错误，如何正确开展党内斗争问题上也有深刻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研究和吸取。

（三）

陈独秀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是历史人物研究中的一个难题。他充当过历史上的正面人物又转向反面。当他是正面人物时，也兼有不少消极黑暗的东西；当他成为反面人物时，也不是一切皆非，还有某些值得肯定的东西。

陈独秀的思想是很庞杂的，他接受过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的三种意识形态，而又都不彻底。在同一个时期里，常常有许多互相矛盾的思想观点混合在一起。譬如在五四时期，他坚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又有一定的社会主义思想；既有科学社会主义，又有基尔特社会主义；既有唯物主义，又有主观唯心主义；既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又有赫胥黎的社会进化论；既颂扬工人劳动人民是社会的台柱子，又埋怨中国人民国民性的低劣；等等。

他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思想观点常常随着革命形势的顺逆和革命潮流的高低而变化，有时正确，有时错误，或正确多于错误，或错误多于正确。他的错误，除自身因素外又有复杂的国际背景。

他的生活和性格既有光明面，也有阴暗面；既有好学深思、积极进取、敢作敢为、尖锐泼辣的一面，又有顽固守旧、轻率急躁、孤傲自负、放浪不羁的一面；既有政治思想家的风格，又有更多的旧文人的气质。他的一生中，有许多闪闪发光的東西，又有许多的污泥浊水，他的晚年虽已淹没在污泥浊水之中，也能看到一点微弱的荧光。

由于陈独秀这个人物的极端复杂性，多年来，他一生的功过、是非，在国内外学术界议论纷纷，至今在许多问题上仍然莫衷一是。我们研究陈独秀，就是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科学历史观对他的一生给予全面的、实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评价，避免任何片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

（四）

陈独秀不仅是一个政治人物，而且是一个学问家，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也应当有他一席之地。他才华横溢，博学多才，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一生写下的文章难以数计。他在文字学研究上具有很深的造诣和独创的见解。他的大量文章，特别是五四时期的文章和晚年的文字学著作至今仍应看作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毛泽东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①。我们研究陈独秀应当把他的政治错误和文化学术成果严格区别开来，绝不能在批判他的政治错误时，把他的学术成果一概抹煞，而应当作中国历史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品承继下来，传给后人。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9页。

第一章

激进民主主义者

(1879—1919)

从陈独秀出生到1919年五四运动，正是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年代。这一时期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一浪高一浪地向前推进并由旧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年代。当时的陈独秀由走科举取仕道路的封建知识分子转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由一个儒门逆子成为激进民主主义者和文化思想界的明星。五四运动之前，陈独秀的思想发展始终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界线，这是陈独秀思想发展的早期阶段。

一、从儒门秀才到资产阶级革命派

(一) 儒门叛逆

陈独秀，1879年10月8日出生于安徽怀宁县淶水乡陈家破屋，世居安庆府城。陈家是一个官宦之家，书香门第，人称“安庆望族”，习儒业十二世，一家出了三个秀才，一个举人。陈独秀的祖父陈晓峰，是个廪生，教私塾一生。父辈兄弟四人，大伯、二伯早年去世；生父（老三）陈衍中，字象五，清末秀才，一生教书为业，生两子，独秀和大哥孟吉。独秀两岁丧父，自幼过继给四叔陈衍庶（字普凡），陈衍庶光绪六年中举人，家资丰厚，曾任奉天知县和知州。陈独秀的家庭系封建官僚地主兼工商业，这样的家庭环境，使陈独秀自幼年即受到封建文化教育的熏陶。陈独秀6岁至9岁期间，在祖父严教下读四书五

经。9岁那年，祖父去世，改从其他塾师。到12—13岁时，由大哥孟吉执教，学习八股文和昭明文选。八股文是明清以来中国封建皇朝科举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为题，以八股形式阐发经义，代圣贤立言，不得越雷池一步。八股文的格式和字数都是固定的，毫无自由发挥的余地。昭明文选是南朝梁萧统（昭明太子）编选的先秦至梁诗文辞赋和部分史书，包括了许多具有代表性作家的作品。陈独秀幼年是一个聪明好学、博闻强记的儿童，他苦于背四书五经，对八股文反感，而对昭明文选中的文学作品却颇有兴味。清朝的科举分为州县级考试，包括县试、府试及院试；省级考试，称乡试；中央考试，先在礼部会试，后举行殿试。院试被录取者称秀才，可参加乡试，乡试被录取者称举人。各省举人到中央会试，被录取者称进士，进士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考中举人和进士者可以进入封建统治集团，做大官、发大财。这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追求功名利禄的道路。陈独秀自幼带有某种叛逆性格，讨厌八股文，对科举不感兴趣。但是社会关系和家庭环境决定了幼年陈独秀的发展道路。在儒学思想的熏陶和封建家庭的严格教养下，他不可避免地走上了科举取仕的道路。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陈独秀参加了县府考试。宗师出了一个“截搭题”——“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他对这样不通的题目，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把昭明文选和《康熙字典》上的古文难字，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地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却被大宗师录为第一名，得中秀才。这是他科举功名的顶点。捷报传来，母亲乐得掉泪，亲友邻舍也都来恭维奉承，而陈独秀却由此更加鄙薄八股文和科举制度。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18岁的陈独秀，在考取秀才的第二年又去参加江南乡试，攀登举人的阶梯。虽然他视科举考试为灾难，为了不负母命，还是耐着性子用功，企图考个举人以了母愿，以后好专心作点正经学问。参加江南乡试期间，他目睹考场的种种黑暗，看到考生个个官迷心窍，丑态百出。《儒林外史》

中描写的范进一类人物，活生生地再现出来。他由考生的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的话是有些道理呀！”^①这一年，正是甲午战争失败后的第三年，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的奇耻大辱激起全民族的义愤，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危机已波及长江流域，“公车上书”中的慷慨陈词仍在南京士人中流传，变法维新的思潮已形成一个颇具声势的社会运动。在这些影响之下，作为后生小子的陈独秀已不再拘泥于儒家经典而转向变法维新，开始离经叛道，追求新学，并懂得了忧国忧民。正如《实庵自传》所说，参加江南乡试，“这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梁康派之最大动机。”从此，陈独秀摆脱了由秀才、举人、进士的科举取仕道路转向康党、革命党的发展道路。

（二）爱国反清

陈独秀对于乡试落第毫不在意，他的追求已转向新学。1897年末至1901年，他考入杭州求是书院学习西学。在这里，他开始接触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学习了法文、天文学和造船学。陈独秀从儒家经典出发又走上与儒学决裂的道路。这一时期他的思想发展已开始冲破封建文化的牢笼。他为甲午海战中国水师的惨败而痛心疾首，故此发奋学习法文和造船学，想为祖国发奋图强，发展海军而效力。他认为要发展海军，必须研究长江。长江发源于青海，流经藏、川、滇、鄂、湘、赣、皖、苏、沪等省市，是我国最大的一条水道。自古以来是兵争重地。于是他收集了大量有关长江的史料、论著，考察研究长江两岸地理形势及其在军事上的重要

^① 《实庵自传》

地位，于1897年末写成了《扬子江形势论略》，这是青年陈独秀第一部木版刻印的著作。书中才华初露，锋芒脱颖而出，从此文名远扬，被称“皖城名士”。陈独秀写作此文的动机是由于“近时敌解卧榻，谋直神州，俄营蒙满，法伺黔滇，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覬觐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因此他详细地论述了长江沿岸地形、山势、城镇、港湾，历代兵家争战故事，军事设施及其历史变迁和在军事防守上的重要地位，以唤起清政府重视江防建设，加强长江防守力量，使“欧西之铁甲虽强，亦不容其越雷池一步矣。”^①其忧国之心、爱国之情渗透到字里行间。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后，俄国为实现其“黄俄罗斯计划”，出兵占领我国东三省，血洗海兰泡，制造了江东六十四屯大惨案。这一年陈独秀曾随继父官职调迁赴东北一行，他目睹关东丧乱，“中国人坐火车者，虽已买票，常于黑夜风雨中无故被俄兵乘醉逐下，或打死于车中，华官不敢过问，沿铁道居民时被淫虐者更不胜数”。^②对于遭受外敌欺侮的切肤之痛，更激发了陈独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陈独秀在《扬子江形势论略》中表现的爱国主义，还没有摆脱忠君爱国的正统思想，他把希望寄托于清政府，“略述沿江形势，举办诸端，是引领于我国政府也。”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篇向清政府的劝进表。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掀起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清政府又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1898年，全国知识界翘首以望的百日维新运动遭到顽固派残酷镇压而失败，“六君子”血洒北京菜市口。1900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清政府更加腐败无能，变本加厉地推行对内镇压、对外妥协投降的政策，这些事实，使满腔爱国热忱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0页。

^② 陈法已，《安徽爱国会演说》，《忠报》，1903年5月26日。

的陈独秀逐渐认识到中国依靠清王朝来革新图存是不可能的，“洋人逞洋势”，而清政府却“安排着洋兵到，干爹奉承，奴才本性”。^①原来清政府和洋人是“奴才”与“干爹”的关系，要反对外来侵略，救亡图存，就必须反对奴才本性的满清政府，于是，陈独秀的思想由忠君爱国发展到反清爱国。1901年，他在“求是书院”里，已开始发表反清演说，写反清文章，抒发“瘦马仰天鸣，壮心殊未已”^②的豪情壮志。被通缉后逃回安庆，创办图书馆，联络同仁，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并从事革命活动。这是陈独秀从事政治活动的开始，他的政治思想，已从康党向革命党转化。

（三）资产阶级革命派

1901年至1905年同盟会成立，是辛亥革命的酝酿和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形成时期。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达到高潮，推翻了清王朝统治，取得了伟大胜利。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浪潮之中，陈独秀是一个站在历史潮流前面的弄潮儿。他虽未参加同盟会，但在政治思想上已发展成朝气蓬勃，敢讲敢作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

第一，追求科学、民主，接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到国外留学的日益增多，那时，许多爱国志士认为要报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成功地建设成为资本主义的强国，故学习日本被看成是学习西方的捷径。从1901年到1905年，赴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从100多人增加到8000人以上，许多革命者如章炳麟、陈天华、邹容、秋瑾等都先后多次到日本。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日本建立，日本一度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革命宣传和活动的大本营。他们努力学习和传播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

① 《安徽通俗话报》，第1期。

② 《陈独秀庚戌〈感怀〉二十首》。

期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学说。1900年下半年，励志会部分会员编辑《译书汇编》，逐期刊译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方法精理》，约翰·穆勒的《自由原论》，斯宾塞尔的《代议政体》等欧美政治学著作。资产阶级革命派办的《开智录》、《国民报》等刊物也大力宣传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学说。

从1901年10月到1915年上半年，陈独秀曾先后四次东渡日本（另有一次去法国）。在日本期间，他热烈追求和广泛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人权学说、人文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他一些社会思潮。1901年10月，陈独秀第一次去日本入东京学校学习。他赞同励志会的思想主张，并一度参加了励志会，他在日本读到许多在国内读不到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论著。1902年，他借潘赞化返国安庆，组织青年励志学社，发表反清爱国演说时，首先提出了“科学与民主”的口号，由于遭到清政府的追捕，是年秋末第二次东渡日本，继续广泛地接触西方政治学说，积极参加爱国反清活动。1903年，陈独秀回国后到上海佐章士刊主编《国民日报》。其主要内容是介绍西方学术。陈独秀与苏曼殊合译法人器俄的《惨社会》，曾在报上连载。陈独秀在《说君》和《赠奴隶》两文中提倡民主，批评封建君主制，以卢梭《民约论》的国家观来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主张建立立宪政府。他认为“国民与奴隶是对立的”，“国家由国民组成”，“国家强弱皆国民的觉悟”。《国民日报》公开宣称愿作国民之“公仆”^①。陈独秀在《国民日报》上的言论虽未摆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响，但是他的科学、民主的观念正在形成之中。《国民日报》停刊后，陈独秀和房秩五等人于1904年2月至1905年8月，在芜湖主编了《安徽俗话报》。陈独秀以“由己”、“三爱”为笔名发表了大量文章。各期社论性“论说”大都出自他的手笔。他在包世

^① 又公报：《中国报学史》（《国民日报》发刊词）。

号上发表的第一篇论说文题为《瓜分中国》。文中说，“自俄国占了奉天……其他各国看见中国这样容易欺负。”于是把中国“当作切瓜一般你一块，我一块，大家分分，这日名就叫做瓜分中国”。他大声疾呼，“中国人又该做洋人的百姓了啊！”“我们中国地大民众，大家都肯齐心协力办起事来……哪还有怕洋人欺负的道理呢？”^①这时正是日俄战争之际，陈独秀对清政府的所谓“局外中立”极为愤慨，以要紧新闻在报上及时刊载日俄战争的消息，揭露日俄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积极宣传了爱国反清革命的思想。陈独秀在《亡国篇》一文中，依据近世国家学说，认为国家应包括土地、人民、主权三要素。他列举中国土地被分割，主权被剥夺，人民受欺凌，大呼这就是亡国现象。^②他在《说国家》等文中宣传资产阶级国家观，否定君权，提倡民权，主张人民“要有自己作主的权柄”，国家是“全国国民所共有”，“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上自君主，下至走卒，有一个侵犯这主权的，都算大逆不道”。^③报上还以诗词、小说等多种形式抨击封建迷信与旧的伦理、道德，宣传民主思想并涉及到婚姻制度、妇女解放等内容。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的大量文章，表明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有了飞跃性的发展，他把爱国、反侵略、反清政府，联系在一起，突破了狭隘的种族界线，表现了反帝的爱国主义和反封建专制的民主主义，他很快地同资产阶级改良派划清界线，在政治思想上站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更前进一些。这一时期他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已经确立。到1905年和1911年第三、四次东渡日本期间，其科学、民主的理论观念已发展成熟，这就为1915年创办《新青年》，高举文化革命的旗帜，奠定了思想基础。

① 三爱：《瓜分中国》（《安徽俗话报》，第11日）。

② 三爱：《亡国篇》（《安徽俗话报》，第3日）。

③ 三爱：《说国家》（《安徽俗话报》，第5日）。

第二，积极参加资产阶级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前期，陈独秀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观已经形成，民主革命派的立场已经确立，这不仅表现于他的思想言论，而且见诸实际行动，在民主革命思潮的汹涌发展中，他不畏强暴，不避风险，积极、大胆地参加了反帝爱国和反对清政府的斗争。

早在1901年末，陈独秀第一次到日本时候，参加了资产阶级革命团体——青年会，他赞同青年会的主张，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

1903年，俄国出兵侵占东三省后违约拒不撤兵，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极为愤慨，组织拒俄义勇队，陈独秀毅然报名参加，决心以尚武精神开赴东北战场。清政府指责学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于是通过日本政府，勒令解散了义勇队。许多爱国学生更加认清了清政府的反动本质。当时清政府委派的湖北留学生监督姚文夫（姚燮），苛待爱国学生、有奸私事，陈独秀便约友好邹容、张继、翁浩、王孝缜等五人，夜入姚寓所，“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稍稍发抒割发代首之恨。”^①因此事陈独秀被遣返回国。回国后，他继续进行更为激烈的革命活动，在安庆组织“励志学社”，仿效东京拒俄义勇队，进行军事操练，准备披坚执锐，效命疆场。1903年8月17日，陈独秀联络安徽大学堂、武备学堂等校学生300余人，赴藏书楼集会。“由陈君仲甫（独秀）开演大旨，谓当今非提倡军人精神，断不足立国，外患日亟，瓜分之至，吾辈恐有不足为牛马奴隶之一日。尚情慷慨，满座歔嘘”。^②会议决定建立爱国会，准备联络上海爱国分社和东南各省志士成立国民同盟会，遭到清政府通缉，陈独秀被迫逃到上海。这时上海《苏报》，已被查封，陈独秀和张继、章士钊等则创办《国民日报》，继承《苏报》精神，宣传革命思想，当时

^① 章士钊：《疏〈黄帝魂〉》。

^② 《苏报》，1903年8月23日。

人称其为《苏报》第二。1904年《国民日日报》受当局干涉停办后，陈独秀冒着杀头的危险，又潜回安庆与房秩五、吴守一创办《安徽俗话报》，从1904年2月15日创刊，到1905年8月15日止，一年半时间出版33期。该报与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日本东京开展的批判保皇派的大论战遥相呼应，积极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陈独秀认为，当时各种报刊，包括同盟会的刊物，虽出的不少，却都是深文奥意，满纸的之乎也者矣焉哉，一般人读不懂。为了唤起广大民众，必须用最浅近最好懂的俗话办报纸，进行革命的鼓动工作，这是陈独秀办《安徽俗话报》的指导思想。该报对于启发群众思想觉醒，促进革命高潮到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蔡元培在《独秀文存》序言中曾对陈独秀办报中的艰苦创业、革命献身精神，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那时我们所做的都是表面普及知识，暗中鼓吹革命工作，我所最不能忘的是陈君在芜湖与同志数人合办一种白话报，他人逐渐因不耐苦而脱离了，陈君独立支持了几个月，我很佩服他的毅力与责任心。”

1904年，地方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纷纷建立，如湖南的华兴会、浙江的光复会、武汉的科学补习所等。陈独秀在办进步报刊的同时，积极组织革命团体，参加革命武装起义活动。1905年，他参加了吴稚晖在北京谋刺清朝出洋五大臣的活动。同年，他与柏文蔚、常藩侯(恒芳)等，联络芜湖安徽公学和安庆武备练军中的革命青年，组织了一个秘密的半军事性质的革命团体——岳王会，总会在芜湖，陈独秀为总会会长，常恒芳为安庆分会会长，柏文蔚为南京分会会长。这个组织以推翻满清政府为目的，是安徽地区辛亥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它在安徽新军中作了许多争取士兵的工作，还建立了一些外围组织。1907年，陈独秀第三次东渡日本，岳王会重心移至安庆。1908年，岳王会领导了有名的马炮营起义，这次起义参加者有千余人之众，安徽新军的马、炮两营全部参加，激战昼夜，攻城未下，在清政府的残酷镇压下，安庆岳

王会瓦解。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在安徽的淮北、皖中等地有三个分部。岳王会同三个分部之间联系密切，互相声援，1906年夏，岳王会总部决议，全体加入同盟会，只有陈独秀没有参加，其原因主要是不满意同盟会中过分的民族主义情绪，即兴汉灭清的狭隘民族主义。据濮清泉说，陈独秀认为同盟会人士除孙中山、廖仲凯、朱执信等人以外都是平庸人才或官僚军阀，不足与谋。^①这也反映陈独秀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已带有激进民主革命的特色，他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在某些方面（反帝民族革命和发动下层民众）超过了同盟会纲领。

辛亥革命前夕，陈独秀已从日本回国，在浙江陆军小学任国文教习。浙江陆小是当时革命派通讯联络机关之一，校内常起风潮，陈独秀作革命檄文多篇，为辛亥革命风暴来临积极鼓吹。

1911年10月10日（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各省响应，纷纷宣告独立。安徽省于11月（旧历九月十八日）宣布独立。孙毓筠（字少侯）出任民国第一任安徽都督。在孙电邀下，陈独秀由杭州返安庆，任督府秘书长。孙毓筠嗜好大烟，政事失理，陈独秀热心于新政权建设，实际主持了皖省政务。为时不久，陈就任安徽高等学府教务主任，秘书长让给李光炯。1912年6月，柏文蔚接任安徽都督，复请陈独秀任秘书长，陈独秀在任职期间，大刀阔斧，除旧布新，主张改善人民生活，对旧有的官僚要敬克任用，不能全部留用，对违碍革命的事要大胆革除。他还提出了统一币制，定钱粮，发展实业、交通、教育等施政计划，被称为“治皖有功”。^②武昌起义后独立各省，大多被军阀、旧官僚和立宪派所把持，巡抚衙门换上一个都督府招牌，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陈独秀在柏文蔚都皖任内的作为，堪称革命派中的佼佼者。

^①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② 柏文蔚：《五十年经历》。

1913年3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宋教仁被刺案，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南方各省发动反袁二次革命，袁世凯却先发制人，宣布撤销粤、赣、皖三都督。柏文蔚离皖后，7月，在陈独秀策划主持下，皖省首先独立，发表了陈独秀起草的独立宣言，响应南方各省、誓师讨袁、举起反袁旗帜。不久，反袁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派倪嗣冲督皖。陈独秀家庭遭到沉重打击（继父丧，继母病，两个儿子外逃，侄子被捕入狱），本人逃亡中被捕，险些丧命，获释后亡命上海。二次革命失败，使陈独秀一度陷入消沉苦闷之中，这年冬季，他在沪闭门读书，研究文字学，写成《字义类例》（1925年3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1914年，陈独秀第四次去日本，在痛苦彷徨中进行新的探索，很快又重新振作革命精神，为完成辛亥革命没有完成的事业而奋勇斗争。

总之，在辛亥革命的历史时期里，陈独秀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封建文化的羁绊，在学习西方民主革命理论和参加革命实践中克服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响，确立了科学、民主的理论观念，成为一个站在时代前列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辛亥革命失败后，在痛苦的探索中，他的政治思想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派逃亡日本，袁世凯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迅速建立起来，国民党被解散，“临时约法”被撕毁，责任内阁和国会都被一脚踢开，辛亥革命所点燃的一点民主火花，尽被熄灭，国内政治陷入一片黑暗之中。陈独秀称之为“黑云压地地裂口，伯强（古传说中之大疔疫鬼）拍手满地走”。^①1914年逃亡到日本的陈独秀，由于对辛亥革命希望的

^① 《甲寅》第一卷，1915年7月。

破灭而陷入痛苦彷徨中，感叹自己“本有冲天志，飘摇湖海间。”

“寒影背人瘦，孤云共往还”。^①但是，陈独秀是一个倔强的人，他没有消沉逃遁，在“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的生活”^②中，开始思考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并进行新的探索。他在政治上不甘寂寞，在东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以“条陈利弊，朴素说理”^③为宗旨。8月，参加黄兴组织的欧事研究会。他揭露和鞭笞袁世凯政权依然是封建制统治，“其专以利禄毁人如故也，敌视异己如故也，耀兵残民如故也，漠视法制如故也，紊乱财政如故也”^④。他认识到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国民蒙昧，迷信落后，缺乏民主、科学的起码知识，必须大力宣传欧美文明进化之理论观念，向传统的中国封建思想意识开战，才能唤起国民之自觉，使民主革命事业不致半途而废。在这个思想指导下，陈独秀于1915年6月毅然返回上海。9月经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介绍，为群益书局主编《青年杂志》，揭起了文化革命的旗帜。

辛亥革命和反袁二次革命之后，在中国文化思想界为什么会 出现一个新文化运动呢？它是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在观念形态上的表现，也是当时中国的政治黑暗、民族危机给予知识分子的强烈刺激的反映。

辛亥革命失败了，但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仍在艰难的挣扎中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获得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机会。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求相应的政治地位，同时也要求有一个思想文化运动为它的发展鸣锣开道。

从一定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也是辛亥革命和反袁二次革命的思想补课。二次革命后，孙中山逃亡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

① 《甲寅》第一卷，1915年3月。

② 傅斯年：《陈独秀案》。

③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90页。

④ 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甲寅》第一卷第4页）。

继续进行反袁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仍无成效。但是辛亥革命和反袁二次革命的失败在中国新兴的先进知识分子中得到了更深刻反思和反响。他们在苦闷、失望中思考，在怀疑中探索。一些早期学习西学、熟悉欧美近代政治历史的知识分子，从中西政治历史的比较研究中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18世纪法兰西资产阶级大革命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取得了胜利，而辛亥革命遭到失败？为什么波旁王朝的几次复辟均遭失败，而袁世凯却轻而易举地毁灭了民主共和制度、恢复了封建专制？他们从对比思考中发现，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前有一个很长时期的文艺复兴运动，法国1789年革命前有一个启蒙运动，德国1848年革命之前也有一个从康德、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的哲学革命。中国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必须先有一个反封建的思想革命运动作为政治革命的先导，而辛亥革命前却没有这样一个运动，于是在先进知识界一个以思想启蒙为目的的新文化运动便应运而生。

恩格斯说过文艺复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20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也是人才辈出，群星灿烂，汇集了先进知识界最优秀的人才，陈独秀便是一个最突出的代表人物。

陈独秀于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标志了新文化运动的发端。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新青年》遂移至北京。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集聚了新旧各派的学者和人才，新旧思潮的斗争十分激烈。不久，形成了一个以陈独秀为首的革新阵营。1918年1月，《新青年》由陈独秀个人编辑改为同人刊物，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高一涵、钱玄同、沈尹默等轮流担任编辑，刘半农有时代理编辑。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也时常参加编辑部的工作。《新青年》集合了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名将，成了文化革命的重要阵地。

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是科学和民主。陈独秀在《新青年》代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中，首先举起了科学和民主这两面大旗。

科学和民主是五四前期文化革命的纲领性口号，陈独秀首先喊出了这两个响亮的口号，并针对中国社会政治现实作了理论上的阐发。后来陈独秀在南京监狱中回顾说，五四前，《新青年》提出科学、民主不是随手拈来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针对中国情况提出来的。辛亥革命失败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青年经过痛苦的摸索才从西方请来了德、赛两先生，“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①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旗手，是当之无愧的。

陈独秀在早期新文化运动的功劳是：

第一，提倡民主政治，反对封建专制，批判孔学。

他吸取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人权学说，以为反对官僚专制军阀统治的武器，说“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②他表示，为了追求民主共和，“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③

他认为，为了反对封建官僚专制的政治制度，仅仅像辛亥革命那样进行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是不行的，必须找到它的思想根子即旧的伦理、纲常、名教。而儒家学说乃是中国旧的“伦理政治之大源”，^④因此，必须彻底批判封建专制的精神支柱——孔学。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曾大搞祀孔祭天，规定“国民教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318页。

② 《吾人最后之觉悟》《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07页。

③ 同上，第318页。

④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08页。

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①袁世凯死后，复古尊孔的逆流仍然猖獗一时，1917年8月旧国会复会时，康有为等研究系分子提议制宪中定孔教为国教。针对复古尊孔的逆流，陈独秀发表了《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宪法与孔教》、《复辟与尊孔》等文章，积极进行了批孔斗争。易白沙首先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是陈独秀的批孔文章却更为尖锐有力，思想比较深刻。他指出，儒教是中国政治、道德、社会堕落之根源，“儒教孔道不大破坏，中国一切政治、道德、伦理、社会、风俗、学术、思想均无救治之法。”^②必须坚决与旧思想、旧道德决裂。他把打倒孔家店的斗争与反对封建复辟紧密联系起来，说“盖主张尊孔者，势必立君。主张立君者，势必复辟。”不扫除封建伦理思想，就无法实现民主政治。他对封建伦理道德、三纲五常给予无情的鞭笞和批判，但并不否定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

第二，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和偶像崇拜。

陈独秀认为，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民主与科学是并重的，“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③他说“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④就是用科学态度对待客观事物，使主观思想与客观现象相一致，排除武断、虚妄、迷信和盲从。他认为，“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⑤不论什么事物和观念如不符合科学法则，即令全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

① 《天坛宪法草案》。

② 《独秀文存》，第2卷，第112页。

③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78页。

④ 同上，第77页。

⑤ 同上，第78页。

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①他运用自然科学知识批判神鬼迷信，指出：“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上帝也是骗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骗人的，一切宗教家所尊重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有的、骗人的偶像，都应破坏。”他饶有风趣地嘲弄偶像是“一声不做、二目无光、三餐不吃、四肢无力、五官不全、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久）坐不动、十（实）是无用。”^②陈独秀反对封建迷信和偶像崇拜的犀利笔锋，使处于封建愚昧和宗教迷信统治下的人们振聋发聩，解放思想。他不愧为欧洲18世纪末叶的伟大启蒙思想家的同志。

第三，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封建八股是新文化发展的严重障碍。为了扫除障碍，从1917年开始，《新青年》揭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1月，《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刊出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八不主义，即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不避俗字俗语，须讲求文法之结构，不摹仿古人，须言之有物，不作无病之呻吟等八条。由此开始了文学革命的讨论。陈独秀曾称赞胡适是文学革命“高举义旗之急先锋”。^③但胡适的八条主要是改革文体，提倡白话文。只有“言之有物”，“不作无病呻吟”这两条被他称为“精神上之革命”，却又讲得非常模糊和空洞。2月，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补充和发挥了胡适的八不主义。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具有三个特点：

（1）深入涉及到文学与时代，内容与形式，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关系。

他认为政治革命与文学革命是相辅相成的，文学艺术“莫不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77页。

② 《偶像破坏论》（《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276页）。

③ 《文学革命论》。

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①同样，政治革命也需要以文学革命辅助之，他指出我国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大部分原因“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他痛斥旧文学陈陈相因，刻意模古，有肉无骨，有形无神，不过如“涂脂抹粉之美人”，其内容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个人穷通利达，没有考虑到宇宙人生和社会。“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为此，他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纲领：“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②

（2）坚决彻底的批判精神。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害怕刺激顽固守旧势力，不用“革命”而用“改良”一词。还有点羞羞答答，客客气气，说“决不愿吾辈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③陈独秀则理直气壮地说，“文学革命天经地义”。“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表现了与旧文化彻底决裂的革命精神。后来胡适也承认没有陈独秀的文化革命论，文学革命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至少还需经过十年的讨论和尝试”。^④

（3）批判旧文学，并不全盘否定。

他批判两汉赋家，雕琢阿谀，词多意寡，是贵族古典文学之

① 《文学革命论》。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五十年来中国文学》（《胡适文存》，第二集，第二卷，第196页）。

始作俑者。但肯定《楚辞》、《国风》盛用土语方物“非不斐然可观”。他批评韩愈“文犹师古”、“文以载道”，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是同一鼻孔出气，但称赞韩、柳文章起于八代之衰，一洗前人纤巧堆杂之习，开宋、元之先，是文界豪杰之士。他痛斥明清的归、方、刘、姚等文派为十八妖魔辈，尊古蔑今，咬文嚼字，无病而呻，无一字存在之价值，但是却称赞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灿然可观者”。^①他批判旧文学中这种辩证的否定观，在当时确系难能可贵。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的思想的深刻和旗帜的鲜明远远超过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鲁迅称陈独秀为文学革命的发难者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说，新文化运动“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②陈独秀在早期新文化运动中是立了伟大功劳的。

三、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封建的文化革命运动，又是空前规模的有广大群众参加的反帝爱国的政治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已有公论。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中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这个评价是公正的、符合实际的，总司令这是一个形象的比喻。我以为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的总司令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主编《新青年》，倡导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影响。

思想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先导，并为政治革命服务。陈独秀倡

① 《文学革命论》。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0页。

导新文化起了思想启蒙作用，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作了必要的准备。当人们在封建愚昧、迷信落后的状态下，举国昏昏，何以能解放思想，爆发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陈独秀从1915年9月创办《新青年》到五四运动的四年多时间发表文章数以百计，这些思想新颖、才气横溢的华章，成为宣传新思潮向旧世界开战的号角。在当时的知识青年中，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1917年1月，有一个青年致函《新青年》说：“仆幼即学……及今春一读大志，如当头受一棒喝，恍然悟青年之价值……连续购读，如病者之吸收新鲜空气。”^①《新青年》第三卷第2号刊载一青年读者的来信说：“仆于友人处得读所谓文学革命论，甚佩甚佩，立起入市，购得贵志全册……”《新青年》以其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顽固守旧势力的革新精神，赢得了当时青年的信任和尊崇。郑振铎曾这样描述，“在那样黑暗的环境里，由寂寞的呼号，到猛烈地迫害到来，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兴奋与苦斗之中生活着。他们（《新青年》）的言论和主张是一步一步随了反对者们的突起而更为进步，更为坚定，他们扎硬寨、打死战，一点也不肯表示退让，他们是不妥协的”。郑振铎称赞《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是这样具有烈火般熊熊之热诚，在作着打先锋的事业，他是不动摇、不退缩，也不容许别人动摇与退缩的！”^②李达的妻子王会悟，五四前在上海美国教会学校读书，那时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对于她的吸引力，竟然超过了圣经的力量。她爱读《新青年》并在它的影响下用白话文大胆地给《新青年》的一些主要撰稿人陈独秀、李达等写信，表示赞成白话文，拥护他们的主张。陈独秀在给她的复信中高兴地说：“没有想到我们的新思想都影响到教会学堂了。”^③

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当时在破除封建迷信、解放思想

^① 《历史研究》，1979年，第4期，第25页。

^② 《新文学大系》，《文学革命论集·序言》。

^③ 王元慎：《中共一大地益是她的主意》（《新华文摘》1986，6，第178页）。

方面所起的重大作用，可以和19世纪德国启蒙运动中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相媲美。恩格斯在回顾这本书对促进他和马克思从宗教神学中解放出来的作用时说：“……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会过的人才能得到”，“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热烈地影响了他”。五四时期的先进青年，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者们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陈独秀的科学、民主的新观点，又是如何热烈地影响了他们呢？张昆弟1917年9月23日日记记述了22日晚在岳麓山蔡和森家中与毛泽东等三人的彻夜畅谈：“毛君润之云，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人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思想，开发新思想，……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①陈独秀以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的形象强烈地印入毛泽东等一代革命青年的心中，毛泽东后来回顾说，他曾经是《新青年》的热烈的读者，“我特别爱好陈独秀和胡适的文章，他们替代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②1919年2月，在陆军预备学校学习的叶挺也写信给陈独秀说：“吾辈青年，坐深深黑狱之中……亟待足下明灯指明者当大有人在也，仆家计不堪，复遇困难……积怀满腔，无暇尽白，足下不弃，辱而训之，甚盼，甚盼。”^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运动，启发、教育、培养了五四时期一代青年的革命进取精神。五四前后出现的各种进步青年团体如少年中国学会、新民学会、觉悟社、利群书社等，大多是在《新青年》的影响下组织起来，热烈地学习和宣传新思潮。许多进步青年对《新青年》爱不释手，称为“良师益友”，“青年界之指针”，青年得此如“清夜

^①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104页。

^② 《西行漫记》。

^③ 《历史研究》，1979年，第4期，第25页。

闻钟”，“神威感奋”。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载文称“陈独秀为提倡近代思想最力之一”，“为思潮界之明星”。有的《新青年》读者称赞陈独秀为思想界的孙(中山)黄(兴)。由于陈独秀主编《新青年》，倡导新文化运动在青年中发生的重大的、深刻的思想解放的影响，为“五四”革命风暴到来起了呼风唤雨的作用。只有亲身体验到陈独秀在当时思想界叱咤风云的人，如毛泽东等，才会恰当地称他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二)他在五四运动前由脱离政治而变为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支持学生运动，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

早期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对于封建的伦理、道德、文化、学术的斗争非常勇猛顽强，而对于现实政治斗争则抱超然态度。1915年《新青年》创刊时，读者来信，要求对杨度组织筹安会加以评论以警告国人。他回答说：“……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①1917年7

^① 《新青年》，第1卷，第1号。

月1日，他在《答顾克刚》信中，开始认识到政治“为人类生活重要部分之一”，但仍认为“盖一群之进化，其根本固在教育、实业，而不在政治。”^①《新青年》在创刊后的头三年对国内重大政治基本上没有评论。1918年5月，爱国学生反对《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斗争，也没有得到陈独秀的支持和声援。这种情况到1918年下半年有了明显转变。《新青年》从第5卷第5号起刊登现实斗争的报导增多了。为了分析形势，评论时政，指导爱国学生的政治斗争，陈独秀和李大钊于1918年12月合编了《每周评论》。这是一个政治性更为强烈的刊物，每星期出一号，每号都有国内外大事评论和社论，还辟了《山东问题》、《对北京学生运动的舆论》等专栏。李大钊和陈独秀写了大量杂文式的随想录，对官僚政治、军阀专横等种种黑暗腐败的政治现实进行尖锐的抨击。陈独秀以“只眼”笔名发表的《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等文章，对于推动学生爱国运动起了很大作用。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传来，北京各校学生纷纷集会，发动请愿斗争，学生运动的兴起也推动了陈独秀更加重视政治斗争。当学生运动高潮到来时，陈独秀在政治上更为活跃。5月4日这一天，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七篇杂文，对学生斗争起了一定的鼓动和指导作用。从“五·四”到“六·三”，学生运动发展为全国性的以工人为主体的反帝爱国政治运动，在群众斗争热潮的影响下，陈独秀拍案而起，写了《研究室与监狱》一文，说：“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②他号召青年把研究新思潮与现实政治斗争结合起来，而且身体力行走出了研究室和讲坛，投身到群众斗争洪流之中。6月11日晚，他和高一涵等亲到“新世界”游艺场散发

① 《新青年》，第3卷，第5号。

② 高一涵：《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

传单，当陈独秀登上新世界屋顶花园正在向下面的游人散发传单时，遭到反动当局暗探的逮捕。被捕时，他还在大呼大跳说，“暗无天日，竟敢无故捕人！”^①

这张传单印的是由陈独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宣言》的锋芒直指皖系军阀的中央政权。对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一、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二、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三、取消步兵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四、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五、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②这个宣言在学生运动直接目标——罢免曹、陆、章三个卖国贼实现之后，提出了把运动引向深入的进一步的政治要求，特别是提出了“根本改造”北京政权问题。高一涵后来回忆说：“1919年6月我们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主张推翻段祺瑞政府，并宣布京师卫戍司令段芝贵死刑。”^③这就体现了中国人民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触及了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政权问题。《北京市民宣言》是五四时期陈独秀政治思想发展的光辉记录，它指明了运动发展的正确方向，对于指导群众爱国斗争，具有重大意义。

陈独秀大胆勇敢地走出研究室，投入群众政治斗争，冲锋陷阵，引起反动派对他“深恶痛嫉，视如蛇蝎而畏如虎狼”，^④通电全国称“陈独秀惑世诱民，凶于兵祸，独夫不去，四维不张。”^⑤这也从反面说明了陈独秀的政治影响对于反动势力发生

① 《每周评论》，第25号。

② 上海《国民日报》，1919年6月14日。

③ 《伟大的开端》，第142页。

④ 《每周评论》，第17号。

⑤ 《历史研究》，1979年，第4期，第25页。

了何等的威慑作用。

陈独秀的被捕在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北京、上海学生联合会及一些省市的教育会、国民大会等群众团体和著名人士，纷纷通电为之辩护，要求迅速予以释放。毛泽东在湖南学生联合会刊物《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陈独秀被捕及营救》一文，高度赞誉陈独秀是“思想界明星”，并说：“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圣至高的精神万岁！”

在社会舆论压力和知识界的营救之下，陈独秀在狱中囚禁了83天，于1919年9月获释。李大钊为经受了铁窗之苦的战友献上了热情的诗篇——《欢迎陈独秀出狱》。诗中赞扬他为真理而斗争的革命精神，“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究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诗中也高度评价了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前我们的只眼，忽然丧失，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如今的只眼光明复启，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每周评论》被封闭）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息，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好象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①陈独秀、李大钊等启蒙思想家们，已经把新思潮的种子，播在一代青年的心中，并正在开花结果。

以上从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的思想影响和政治影响两个方面，说明他确是当之无愧的总司令。鲁迅于1922年为他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写的《自序》中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消极的。”^②从鲁迅与《新青年》的关系来看，这主将称号显然是给予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五四时期是陈独秀一生中最为光辉灿烂的时期。他在五四运动中的功劳应当永垂史册。

^① 《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11月1日。

^② 《鲁迅全集》，第1卷，第8页。

四、五四前期的思想弱点

五四时期，陈独秀作为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登上历史舞台，演出了一幕幕光彩照人的活剧。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及本人的内在因素，他在思想上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

（一）在世界观上，他倾向法国启蒙时代的机械唯物论，而又受到康德、黑格尔、尼采、柏格森、詹姆斯以至杜威等各唯心主义流派的影响。

他头脑中既有唯物主义观点和某些辩证法因素，又有大量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观点。在自然观上，唯物论占主导，在历史观上，唯心主义占优势。他把精神的东西看作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离开人的社会性、阶级性，而以抽象的人性、国民性解释社会现象。认为道德是人类的本能，侵略、独占、利己、嫉妒、争杀、欺诈等是人类本能的黑暗面，相爱、互助、同情、利他心、公共心是人类本能的光明面。他说提倡道德就是要发扬人类本能的光明面。消灭人类本能的黑暗面。^①从这一观点出发，他认为社会的根本问题是伦理道德。而“政治、学术皆技艺问题”，不懂得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伦理道德是政治经济的反映并为政治经济服务。他在《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以提倡“勤、俭、廉、洁、诚、信”等六个字的新道德作为中国救亡图存的根本之道。他要求无论改良派、反革命派、革命派，“皆本诸良心之至诚，慎厥始终，以存国民一线之人格”。^②因此，陈独秀在前期新文化运动中不可能找到改造中国社会的正确道路。

在社会历史观方面，陈独秀和许多同时代人一样，深受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的影响。赫胥黎宣传了达尔文生物进化

① 《调和论与旧道德》（《新青年》，第7卷，第1号）。

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35页。

论的科学思想，同时又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法则也适用于人类社会。这就变成了庸俗的社会进化论。陈独秀等革命民主主义者，用“生存竞争”、“优胜劣败”、“自然淘汰”的公式，激发青年积极进取和民族觉醒，这种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起过进步作用。但是把错综复杂、丰富多彩的社会历史发展，“都总结在贫乏而片面的公式‘生存斗争’中，真是完全幼稚”，^①而且必然会导致谬误。从这一观点出发，他认为中国之所以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是因为中国落后，国民性卑劣，说：“自我观，中国之危，固以迫于独夫与强敌，而所以迫于独夫强敌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有以召之耳。”^②甚至说在中国“惟租界居民得以安宁自由”，“人民咸以其地不立化夷场为憾。”^③一个爱国主义者竟然讲出同帝国主义者辩护士同样的论调，是何等荒谬，这说明社会进化论的观点不能成为中国人民谋求解放的思想武器。

陈独秀的唯心史观还表现为先觉哲人创造历史的观点，他说：“非有先觉哲人，力抗群言，独标异见，则社会莫由进化。”^④因此，他轻视人民大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称义和团是“拳匪”，“何等可恶”，却称赞曾国藩为“中兴名将”，说曾国藩人虽死却留下了真生命，他的精神“雄大精美”。陈独秀的许多文章和言论不断埋怨中国人的国民性如何恶劣，说中国人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甚至“堕落到人类普通资格水平以下”。^⑤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包括李大钊、毛泽东等人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先觉哲人的唯心史观。这是由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31页。

③ 同上，第72页。

④ 《抵抗力》、《新青年》，第1卷，第3号。

⑤ 《陈独秀文存》，第2卷，第117页。

当时知识分子所处的时代和所受教育决定的。但是陈独秀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则根深蒂固，具有很大的顽固性，这是他以后不能成为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原因。

（二）在政治思想上，陈独秀用以向封建主义作战的武器是旧式民主主义。

他极端崇尚法兰西文明，说“此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①他热烈地向往《人权宣言》、“进化论”、“自由、平等、博爱”。他以旧式民主主义思想来观察近代中国问题，则不能认清造成中国民族危亡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他看不清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甚至主张以外国帝国主义来干涉国内的军阀专政。说：“国事被武人败坏到这步田地，国民既不起来解决，除了希望外国干涉，还有什么法子呢？”

他反对官僚专制和军阀统治，主张以法兰西为师，建立民主共和政体，但是却找不到实现民主的正确道路。他在《今日中国之政治》一文提出解决武人专政、军阀割据的办法是劝说军阀把武力用着对外，不许用着对内。由北洋、国民、进步三党平分政权。^②1918年至1919年上半年，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议论时政的文章中，提出了不少改良主义的主张。

陈独秀思想上的这些弱点，在五四运动之后，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并未得到彻底克服，这是他以后政治上犯错误的思想根源。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81页。

② 《希望外国干涉》（《每周评论》，第14期随感录）。

③ 《新青年》，第5卷，第1号。

第二章

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1919—1921)

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发端,到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的思想主流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虽然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潮,并没有影响和改变其民主主义倾向。在五四运动中,他的政治思想没有超出旧民主主义的范畴,基本上仍是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1919年6月,陈独秀起草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入狱,这是他作为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展的光辉顶点,也是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起点。五四运动后到1921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陈独秀的政治思想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即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时期。

一、从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多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于陈独秀向马克思主义转变问题,大致有三种意见:

(1) 肯定他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虽有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但不是主导的;

(2) 五四运动后,他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并未完成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又向后转了,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3) 陈独秀始终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从中国五四时期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鉴于中国早期马克思

主义者成长的特点和复杂性，对陈独秀这一时期全部言行作一综合分析，区别主流和支流，主导方面和非主导方面，我以为第一种意见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陈独秀由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思想历程，大体上经过三个段落：

（一）1917年十月革命至1919年五四运动，从追求法兰西文明转向俄国革命，拥护十月革命。

1917年11月，俄国革命爆发后，帝国主义通讯社和北洋政府的宣传机关竭力歪曲报导，造谣惑众，混淆视听，叫嚣防遏过激派。中国人中最早认识十月革命的真相、性质和意义的是李大钊。当时，他在北大图书馆，每天从英、日等外文报刊中翻译和研究关于十月革命情况的报导。1918年7月1日，他发表了第一篇正确宣传十月革命的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指出，18世纪的法兰西之革命和20世纪的俄罗斯之革命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时代精神之不同，革命性质自异”。他说：“桐叶落而天下惊秋，听鹃声而知气运”。指出十月革命预示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到来。

与李大钊相比，陈独秀对十月革命的认识要迟缓得多。长期以来陈独秀极端崇拜和热烈追求法兰西文明，他认为“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世界而无法兰西，今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①由于他追求西方文明的态度十分固执，在1918年至1919年初一年多时间里，对十月革命的态度是抵触、怀疑和观望的。

1918年11月14日至16日，北京各学校放假三天，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所谓协约国的胜利告终。11月15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举办演讲大会，许多人演讲说：“公理”在协约国方面，协约国击败德国就是“公理战胜强权”。在庆祝“公理胜利”的一

^① 《新青年》，第1卷，第1号。

片喧闹声中，李大钊阔步登上讲台，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说，接着又写了《Bolshevism的胜利》的论文。他明确指出，这回战胜，不是什么协约国的胜利，而是“全世界庶民”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20世纪新潮流的胜利”。11月15日这一天，李大钊在天安门讲台发表庆祝十月革命胜利的讲演时，陈独秀却“不管门外如何热闹，只是缩着头在家中翻阅闲书消遣。”^①后来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说，他1918年11月发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时，仲甫先生和胡适等人还是，“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扎维主义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②直到1918年12月，十月革命一周年之后，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中，仍然跟着一般官僚、政客、受骗知识分子叫喊什么“公理战胜强权”，说：“德国依仗着他的学问好，兵力强，专门侵害各国的平等自由。如今他打得大败，稍微懂得点公理的协约国居然打胜了，这就叫公理战胜强权”。^③

促使陈独秀对十月革命态度发生转变的主要因素有三：

(1) 十月革命影响下风起云涌的世界革命风潮，遍及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独立运动，推动了他思想认识的发展。十月革命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大爆炸。1918年1月，芬兰工人总罢工，成立人民代表苏维埃。11月德国革命工人水兵起义，推翻威廉皇帝，成立苏维埃。同年奥地利工人代表苏维埃成立，接着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意大利等都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这时陈独秀看到北洋政府所竭力防遏的“过激派”竟然风靡世界，是因为它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潮流。1919年2月19日，他在《每周评论》第八号上发表《公理何在》一文，为

① 《新青年》，第5卷，第5号。

② 《李大钊选集》，第231页。

③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304页。

过激派辩护说：“过激派的行为，纵或有不是的地方，但是协约国把他们破坏俄德两大专制的功劳，一笔抹杀，又试问公理何在？德皇未败以前，反对战争始终不屈的，只有李普克尼希一派，从前附和德皇的人，如今都逼迫李普克尼希，而且加害他的生命，又试问公理何在？”^①表现了对欧洲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情。1919年3月，他发表《朝鲜独立之感想》一文，称赞“这回朝鲜独立运动，伟大、诚恳、悲壮……开世界革命史的新纪元。”^②到五四运动前夕，他于1919年4月20日发表了《20世纪的俄罗斯革命》的短评，指出：“18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20世纪的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③在这里，虽然还没有区别法、俄革命的不同性质，却也已经认识到十月革命的重大历史意义。

(2) 陈独秀和许多爱国的中国人一样，透过巴黎和会的帷幕，渐渐地看清了帝国主义者的强盗面目，现实的教训，使他从对帝国主义的幻想中清醒过来。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开幕，参加会议的有27个战胜国，而整个会议都完全被美、英、法、日、意五强国垄断起来。帝国主义者打着“民主自由”、“人道主义”、“保护弱小民族”的幌子，干着强盗分赃的肮脏勾当。1919年2月2日，陈独秀发表“揭开假面”的短评，指出，协约国“公理战胜强权”不过是一个假面具，实际上也就是承认了他过去跟着说“公理战胜”是受了协约国假面的欺骗。巴黎和会开幕前夕，陈独秀还说：“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④到和会开了半个月以后，他便看出“威尔逊总统的和平意见14条”，完全是放空炮，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344页。

② 同上，第365页。

③ 同上，第381页。

④ 同上，第304页。

因而称威尔逊为“威大炮”。① 1919年5月初，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给陈独秀以更大的震动。他心中追求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遭到了毁灭性的一击。五四这一天，他在《每周评论》第20号发表《两个和会都无用》一文，说“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14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若是靠着分赃会议里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没有好结果。”

(8) 陈独秀本身具有爱国主义和追求真理的精神。陈独秀是一个具有爱国主义和现实主义品格的人，在十月革命所引起的世界革命风潮的推动下，经过巴黎和会“这番教训”，他长期以来对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追求，连同对于帝国主义的幻想一起破灭了。一年多的时间里，经过犹豫、观望，到五四运动前遂明确了拥护十月革命的态度。从此，他的眼光从法兰西文明转向苏维埃俄国。在主编《每周评论》中发表了许多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新宪法、土地法、婚姻法等的文章。陈独秀对十月革命态度的转变，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前提。

(二) 从五四运动至1920年秋，他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原理。

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点比李大钊要迟得多。十月革命之后，1918年至1919年初，随着世界革命风潮的兴起，“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② 这一时期李大钊已经初步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他发表的《Bolshevism的胜利》、《新纪元》、《战后之世界潮流》等一批文章，正确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和战后世界形势，热情宣传世界革命新纪元的到

② 《每周评论》，第8号。

① 《李大钊述集》，第173页。

来，明确指出，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已经结束。“这回民主主义的胜利，不是从前英美式民主主义的胜利，乃是新发生的德、俄式社会民主主义的胜利。”^①新的“社会革命的潮流”正滚滚而来。当李大钊从革命民主主义跃进到马克思主义的时候，陈独秀仍旧迷恋于德、赛二先生，固执着资产阶级民主观。1919年1月，在李大钊发表《新纪元》一文的同时，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罪案之答辩书》中宣称，“我们现在认定只有德、赛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②这就是说，欧美式的科学、民主仍然是他基本的思想武器。

五四运动前夕，随着他对十月革命态度的转变，开始重视学习和研讨马克思主义。1917年，他认为在中国社会主义学说之兴，“似可缓于欧洲”。^③到1919年4月6日，他发表《纲常名教》一文，已经清楚地看到“欧洲各国社会主义的学说，已经大大的流行了。俄、德和匈牙利，并且成了共产党的世界。这种风气，恐怕马上就要来到东方。”^④他以幽默而辛辣的笔调讥讽那些试以“纲常名教”来抵挡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封建顽固派，从而表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欢迎态度。他饶有興味地研究克伦斯基与列宁，发出了他自己深思着并令人深思的问题：“世界上温和的人都要渐渐的激烈起来了。这是什么缘故呢？”^⑤于是他感到一向奉为神圣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论不够用了。一旦他的注意力转向了俄国，便从俄、德、匈牙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受到启示，开始赞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观点。他于1919年4月27日发表的《贫民的哭声》一文，已具有一定的阶级观点，他以社会科学家的观察，悉心倾听着“北京城里一片贫民

① 《李大钊选集》，第135页。

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318页。

③ 《新青年》，第2卷，第5号。

④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373页。

⑤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391页。

的哭声！”并预言“这可怜的哭声”早晚叫那班文武官僚们头痛，“最后还要叫他们发出同样的哭声！”他开始用阶级观点观察欧美各国，看到资产者和雇佣工人“贫富悬隔”，“所以穷苦的工人时常和开工厂的资本家为难，渐渐造成那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这就是现在各国顶紧急顶重大的问题。”^①

五四运动中，陈独秀看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的热情象火山一样的爆发，贫民的哭声化作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的怒吼，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斗争舞台，发挥出巨大的威力。帝国主义夺取我国山东的反面教育和人民群众革命运动的正面教育，使陈独秀达到了两种彻底的觉悟。“（1）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2）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由这彻底的觉悟”而抱定两大宗旨：“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六·三以后，全国工人阶级政治大罢工的浩大声势，使他相信以平民的革命强力来征服反动政府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因此，他在6月9日起草和亲自散发的《北京市民宣言》中提出了如果和平方法不能达到目的，便以群众直接行动根本改造段祺瑞政府。从注意倾听贫民的哭声，到承认“平民”以暴力征服政府、改造反动政权。陈独秀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开始突破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界线，逐渐向着马克思主义道路前进。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被捕入狱。经过三个月监狱生活，在思想感情的磨炼方面，起了实验室里的研究所不能起的作用。9月出狱，李大钊、刘半农、胡适等写诗祝贺，有人称他是救济人类的福星。为此，他写了《答半农的D一诗》，说：“我不会做屋，我的弟兄们给我住，我不会缝衣，我的衣是姐妹们做的，我不会种田，弟兄们来给我吃。”人民受苦，“他们不能和我回来，我便到那里和他们同住。”^②他针对知识分子轻视劳动人民

① 《陈独秀文集选编》，第384页。

② 《新青年》，第7卷，第2号。

的思想，公然为无产者申辩，说：“我盼望自命为知识阶级的士大夫，不要太高兴，不要以为无产阶级永远可以欺负，不要永远把他们踏在朝靴底下不当做人看待。”^①表明了他的思想感情和立场向劳动人民转移。这种思想感情和阶级立场的转移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条件。

五四群众运动的暴风雨和三个月的铁窗生活是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强大推动力。他出狱后不久，于1919年12月发表的《告北京劳动界》一文，已能够初步运用阶级观点剖析他长期顶礼膜拜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区别18世纪资产阶级民主和20世纪无产阶级民主具有不同性质和内容，指出“18世纪以来的政制已经破产”。^②在他撰写的《新青年宣言》中公然宣称：“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暴力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和社会改造”。这时，陈独秀继李大钊之后，已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1919年底至1920年初的一段时间里，陈独秀的思想发展中出现了明显的停滞和倒退。主要是由于杜威、罗素来华讲学的影响。杜威和罗素是西方国家有重大影响的著名学者，唯心主义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杜威于五四运动前夕到上海，罗素于1920年初来华，他们先后在中国各省巡回讲演，当时许多报刊，包括《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晨报副刊》、《觉悟》等进步报刊都连续发表他们的讲稿。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宣扬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的浪潮。陈独秀完全陷入了唯心主义的迷雾之中，他把现代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主义——实验哲学与自然科学混为一谈，说相信尊重实验哲学是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还说：“最近代最新的思潮底代表，就是英国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451页。

② 《新青年》，第8卷，第1号。

罗素 (Bertrand Russell) 底新唯实主义哲学”。^① 他于1920年1月撰写的《自杀论》一文，充满了唯心主义的热昏的胡话，什么“精神的自我扩大是历史”，人类和动物一样，在本性上有恶的方面和善的方面等等。他已初步具有的阶级观点，在这里一丝不见了。令人惊异的是他竟然沿着唯心主义和人性论的斜坡滑进了基督教堂。他称赞罗素的预言：人类“将来须有一新宗教。”说：“基督教的根本教义只是信与爱”，“中国社会麻木不仁”，应当拿“宗教来利导我们的情感。”“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② 他甚至说新文化运动反对宗教“是一种大错，我就是首先认错的一个人。”^③

在这一段时间里，陈独秀的思想倒退并非偶然，他是带着固有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背着沉重的旧意识的包袱，在五四运动后各种思潮相互冲突相互影响中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当他具有一些初步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时候，碰到了西方学界巨子杜威、罗素大肆鼓吹所谓最新实验哲学，便丧失了辨别能力，而成为他们的思想俘虏。陈独秀向着马克思主义前进的道路，不可能是平坦的、直线的，必然要经历艰难曲折的历程。

1920年初，苏联红军在东方战线发动强大的攻势，摧毁了白匪在远东地区的统治，打通了反动势力在中俄边界的封锁线，中俄交通得以恢复。直接来自列宁主义故乡的消息，不断传入中国。苏维埃政府于1919年7月25日发布的，废除帝俄在中国特权的第一次对华宣言，于1920年3月间在中国报刊发表。4月，共产国际的使者来华与中国革命组织建立联系，介绍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不久又传来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苏维埃俄国的国际主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465页。

② 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

③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义精神和支援中国民族解放的诚挚友谊，激发了中国先进分子研究苏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潮流冲破各种逆流在中国更加广泛地传播开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芒使陈独秀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迷雾中走了出来。1920年4月他声称“俄国式的方法是唯一的道路”^①，并表示要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他认真阅读和研究当时流传到中国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5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发表前，他进行了认真校对。

从1920年4月开始，陈独秀逐步接受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

1920年3月发表的《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一文虽然有错误观点，但是主要思想是力图以唯物史观分析人口问题与社会制度、发展科学的关系。文中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口过剩的分析以及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的批判，显然是吸取了《共产党宣言》中有关论断。从这篇文章中可以明显地看到陈独秀从唯心史观向唯物史观转变的迹象。

1920年5月，陈独秀发表《劳动者觉悟》的演说，论述了工人阶级、劳动人民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者，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他说：“社会上各项人只有作工的是台柱子”，“若是没有做工的人……我们便不能生存。如此，人类社会岂不要倒塌吗？他饶有风趣地借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表达了被统治的无产阶级必须上升为统治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古训应倒转过来，“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即“做工的劳力者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居于治人的地位。”同时他在《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的讨论文章中，运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驳斥资产代理人的谬论，揭露资本家以红利名义榨取工人劳动血汗，说“这实在是清平世界里不可赦的罪恶。”这时的陈独秀已不仅是同情劳动者的疾苦，倾听

^① 《新青年》，第7卷，第3号。

贫民的哭声，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为工人阶级仗义执言，并断然宣称，中国不能再走欧美日本资本主义的错路。

陈独秀于1920年9月1日在《新青年》杂志第8卷第1号上发表了《谈政治》一文。这是一篇捍卫马列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战斗檄文，是陈独秀思想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正确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在当时条件下的高水平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陈独秀旧民主主义政治思想的脱胎，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新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1) 抛弃资产阶级国家观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国家问题历来是一个被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搞得最混乱、最模糊不清的问题。五四运动之前，陈独秀一直坚持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国家观，在这里他完全放弃了“国家是全国国民所共有”的观点。认为近代国家“就是征服者支配被征服底主权”，“国家是掠夺别人并防止别人来掠夺的工具。”“现在的资产阶级的国家和政治……建筑在经济的掠夺上面”，“是掠夺的机关”，“是官僚底巢穴”，“是资本家私有财产底护符”。他对国家性质职能都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并且指出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列宁说：“国家问题，现在无论在理论方面或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①陈独秀国家观的转变，对于他向共产者的转变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2) 抛弃抽象人性论，接受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观点。这篇文章中虽然还有一些人性论痕迹，已无关全文宏旨。文章的主旨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理论批判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强权 and 国家的谬论。他指出，国家、暴力有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别。“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勤劳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这是非正义的，“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

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他认为正义的强力，“可以有一种排除黑暗障碍底效用”。

(3) 抛弃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观，称赞无产阶级专政。

新文化运动之初，陈独秀最早从西方请来了德先生。直到十月革命之后，他的资产阶级民主观亦未动摇。五四运动半年之后，开始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制的阶级性和局限性。这篇文章里对欧洲社会民主党美化资产阶级民主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批判，也是他对原来旧观念的自我否定。他指出，马格斯的修正派没有看见“戴着德谟克拉西假面的资产阶级特权是怎样。他们天天跪在资产阶级特权专政脚下歌功颂德，一听说劳动专政，马上就抬出德谟克拉西来抵制，德谟克拉西倒成了资产阶级底护身符了。”他公然宣称：“不承认现存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治、法律，有扫除社会罪恶的可能性。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①这就表明陈独秀由长期迷恋资产阶级民主制转向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当时时代条件下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标志。

陈独秀从1920年4—10月间写的一系列文章，说明他已初步接受了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原理。

(三) 1920年末至1921年下半年，建立科学社会主义信仰、坚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基本上实现了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陈独秀认为“学说重在需要”。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不是当作装饰品，而是当作观察国家命运和改造社会的工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9页。

具。1919年8月，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方兴未艾之时，李大钊就说：“一个社会主义者……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社会主义虽流行于资本主义国家，“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它作工具。去驱逐一般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①一年多之后，陈独秀达到了和李大钊共同的认识：必须以社会主义救中国。当代中国“唯有找社会主义那条路走”。^②

从1920年下半年到1921年秋，陈独秀发表的《答柯庆施（劳动专政）》、《致罗素，张东逊的信——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社会主义批评》等一批文章，旗帜鲜明地鼓吹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

（1）运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阐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指明中国绝不能走欧美资本主义道路。

陈独秀于1920年11月答郑贤宗的信认为，我们从事社会改造“万万不能妄想拿主观的理想来自由改造；因为有机体的复杂社会不是一个面粉团子能让我们自由改造的。”他把生产、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表述为“社会进化上”“物质的自然趋向”，说“留心社会改造底人万万不可漠视这种客观的趋向”。在这里他完全抛开了进化论、人性论主观唯心论的历史观，不再从抽象的理性和正义之中去探讨社会变革的原因，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去研究、探讨。他说：“资本主义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富力，一面却也增加贫乏。”^③正因为剩余价值替资本阶级造到这样强盛的地位，而资本阶级必

① 《李大钊选集》，第230页。

② 《中国百年》，第24号。

③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44页。

④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

然崩溃不可救的危机也正含在这剩余价值里面。^①“而过去的大战及将来的经济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产物”。^②因此他断言，中国“非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绝不能再走“欧美日本的错路”。^③这时陈独秀对于社会主义鼓吹已不再象五四运动后不久那样，充满“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等空洞言词，而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以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知识，进行宣传。他向人们宣告：“社会主义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命运。”^④

（2）论证中国必须和可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迫使它的反对者也装扮成社会主义者。1920年末和1921年初，研究系分子张东逊、梁启超等人，一面虚伪地唱着“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的高调，一面却大肆宣扬中国的道路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必须承认在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陈独秀同研究系分子论战中紧紧抓住这个实质问题，着重论述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他针对中国经济落后、宜讲教育、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的论调说，中国人的知识方面、物质方面都不发达，发展教育及工业是顶重要的事，但是用什么制度和方法来发展工业，要看何种制度能给国家带来富强，给人民带来幸福。他运用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普遍性的原理指出，中国和欧美虽有产业发达先后和发展程度的不同，资本主义固有的剩余价值规律必然造成生产过剩、贫

① 《社会主义批评》。

②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

③ 同上。

④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32页。

富对立、经济危机、工人失业、社会革命等却是一样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多数人过不着人的生活”，要“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在我国工业还不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①他还把反对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同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压迫联系起来，说：“外国资本主义压迫我们一天紧迫似一天”，“有许多人一面反对军国主义，而一面却赞成资本主义，这真算糊涂极了。”^②

张东逊说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欲建立劳动者专政而患无劳动者也。”对此，陈独秀反诘道：“请问中国若无劳动者，先生吃的米、穿的衣、住的房屋、乘的车船，是何人做出来的？先生办的报是何人排印出来的。”^③他指出，中国工业虽不发达，中国劳工阶级受剥削压迫却比欧美日本厉害，他们“生活极苦而工钱极贱”，这种状态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中国劳动（农工）团体为反抗资本家资本主义而战，就是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④也就是为实行社会主义而战。列宁说：“社会主义者只是必须认识究竟那种社会力量因其在现代社会所处的地位而关心社会主义的实现，这种力量就是无产阶级。”^⑤正由于五四运动后，陈独秀认识了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中国无产阶级。因此他认为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3）抛弃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择定科学社会主义。

陈独秀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曾经在五四运动后泛滥一时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面前眼花缭乱，真假莫辨而兼容并包。

①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

② 《社会主义批评》。

③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

④ 《同上》。

⑤ 《列宁选集》，第1卷，第198页。

1919年12月，陈独秀还认为“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共同主张”。^①1920年初，陈独秀在杜威的民治主义和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影响下，在北京建立工读互助团，用以改造社会。毛泽东于1920年3月参加上海工读互助团，并设想在岳麓山下组织一个类似的团体。恽代英还写了“未来的梦”，表达对“共产主义新村”的向往。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几乎都是在克服各种冒牌社会主义，特别是无政府主义影响中成长起来的。

列宁在《我们的纲领》一文中说：“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理论为依据；因为它第一次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给这个科学奠定了坚固的基础。”^②陈独秀在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清理了各派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他说：“若觉得各派都好，自以为兼容并包，这种胸无定见无信仰的人也不配谈什么主义。”^③他在《社会主义批评》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逐一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分析它们的思想来源，错在何处和错误的性质。基本上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各种冒牌社会主义的界线，表示要完全抛弃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和行会社会主义。说：“我们应该择定一派”，即共产主义，也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所实行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

陈独秀在批判无政府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中，特别是在批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中，表达了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其要点是：

第一，主张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进行阶级斗争，反对劳资携手；

① 《实行民治的基础》。

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198页。

③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92页。

第二，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反对议会政策；

第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政治掩盖下的有产者一个阶级专政；

第四，主张社会主义生产制，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

第五，主张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护国主义。

这五点大体上反映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这就是陈独秀从“兼容并包”到“择定一派”，这表明陈独秀结束了“浑朴的趋向”，澄清了混乱的社会主义观念，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信仰，基本上实现了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4）陈独秀向共产主义者转变过程中的矛盾和混乱。

陈独秀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常常表现出相互矛盾的趋向。在同一时间的不同文章中，甚至在同一篇文章都有许多矛盾、混乱的思想言论。1920年10月1日《学说与装饰品》一文中，既强调中国“有输入马格斯社会主义底需要。”又说：“我们不懂适者生存的道理，社会向着退化的路上走，所以有输入达尔文进化论底需要。”1920年12月1日《主义与努力》一文中，既肯定主义有定向的作用，说“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又说，“我们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它的弊病一点一滴，一桩一件，一层一层渐渐的消灭去，不是用一个根本改造的方法，能够叫他立时消灭的”。1920年5月《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一文中，他运用剩余价值学说揭露资本家以红利名义剥削工人造成劳资对立，同时又主张“承认工人都有得红利的权利”，“如此工人可以渐渐变到资本家的地位”。同一时间他既主张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又承认人的本性有善恶；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又留恋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说中国“最好经过俄国共产党专政的阶段”，“达到西方的德谟克拉西”；^①既鼓吹民众运动，说“只有作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又污蔑人民群众是群氓，“是一

^① 《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1927年7月1日。

盘散沙，一堆蠢物”；^①既承认劳动人民群众创造物质财富，是社会生存发展的决定力量，说“一切革命史尽是劳苦群众的热血所造成”，又保留着先哲超人的英雄史观，说中国革命需要有“有高等智识足为民意导师”的人去开导群众，对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如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等，不分进步与反动，一律称赞他们雄大精美。类似这种矛盾、混乱的思想言论，即使在他成为共产党的领袖之后亦屡见不鲜。

陈独秀向共产主义者转变过程中的矛盾、混乱和庞杂，应当从他所处的时代条件、社会条件和自身文化教养中得到说明：

第一，时代条件 五四时期，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终结并转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转折交替时期，也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终结并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交替时期。陈独秀和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在短短的两三年中，经历了从欧洲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到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200多年的思想发展历程。十月革命以前，陈独秀梦寐以求的还是18世纪的法兰西文明。五四运动之后，他便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中国的民族解放斗争高潮推动下转向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时间上如此之短，内容上又缺乏系统、完整。中国的早期共产主义者没有象欧洲社会主义者那样，经过长期理论准备，达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②新旧交替的时代，新旧混杂的各种思潮，都必然会给理论上幼稚的陈独秀打下深深的思想烙印。

第二，社会条件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亦未得到充分发展。落后的社会经济，不成熟的阶级关系，和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与马克思主义故乡欧洲的极大差异，给中国先进分子领会掌握马克思

^① 《中国的无政府主义》，1921年7月1日。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主义世界观造成极大的困难。列宁说：“落后的或发展速度落后的经济关系，就使得经常有一些只能领会马克思主义中某几方面，只能领会新世界观中个别部分，或只能领会个别口号和要求，但不能坚决抛弃一般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分子来参加工人运动。”^① 陈独秀的情况正是这样。

第三，自身的文化教养 陈独秀的文化教养使他的思想渊源极为驳杂。他长期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深受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在中西文化的冲突激荡之中，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早期新文化运动中，他竭力吸取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文化来革新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但却遗留了封建文化的影响；在五四运动后，他力图以西方无产阶级文化——马克思主义，来革新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却又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他当时所具有的幼稚而浅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可能彻底地消化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也不能彻底克服中国封建士大夫文化的影响。这便是他思想发展中矛盾、混乱和谬误的根源。

“历史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② 通过对陈独秀一切矛盾趋向的综合分析，透过他的大量的矛盾、驳杂的思想言论，仍然可以看出他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发展线索。这就是从崇尚法兰西文明，到拥护十月革命，到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建立共产主义信仰，并为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他的思想发展进程中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倾向，尽管有时很严重，甚至极其谬误，但是并没有根本改变他的思想方向。从五四到建党的时期里，他的思想主线是积极的前进的，基本上实现了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化。

“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③ 陈独秀不仅信仰和

① 列宁：《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

② 《马克思通讯集》，第1卷，第567页。

③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者。他主张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仅仅研究其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① 为了以社会主义救中国，首先必须建立一个实行社会革命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的无产阶级政党。从1920年春起，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之时，就在行动上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而努力奋斗。当时也曾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如戴季陶、胡汉民一类人，他们在报刊上发表许多鼓吹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的文章，但是到了要以实际行动组建共产党时，便溜之大吉了。听其言、而观其行，陈独秀不惜冒杀头坐牢的风险，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而斗争的实际行动，是判断他实现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最重要的依据。

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五四运动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逐步结合，中国出现了第一代共产主义者，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日臻成熟。

据有关回忆材料证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等，从1920年初已开始酝酿建党。陈独秀出狱后不久去武汉讲学，继续宣传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思想，遭到北京当局的通缉。他于2月7日晚从武汉乘车返北京，为了保护战友，李大钊准备了一辆骡车，从北京西站把陈独秀接走，在李大钊家乡乐亭暂避一时，然后送他由天津乘船赴上海。一路上两人商讨了有关建党问题。李大钊认为自己对马列主义研究不够，应当加强理论研究。陈独秀认为应当立即着手在中国建立共产党。^②

^① 《马克思的两大精神》。

^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92页。

3月，陈独秀到上海，住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继续以《新青年》为阵地，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并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积极进行建党准备工作。1920年4月，共产国际使者威金斯基一行来到北京，李大钊接待他们，进行多次交谈、讨论之后，介绍他们去上海找陈独秀。陈独秀和威金斯基会见后，着重讨论了根据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经验组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问题。威金斯基认为组织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是中国革命当务之急，中国已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条件。陈独秀约集社会主义者，召开多次座谈会，研究社会主义、劳工运动，酝酿建党工作。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李大钊在北京，陈独秀在上海积极进行建党准备工作。

1920年8月，首先由陈独秀、李汉俊、李达、俞秀松、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等七人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不久邵力子、沈雁冰、李启汉、沈泽民和李中（高语罕代名）也参加进来，推陈独秀为书记。党的名称，开始曾叫社会党，经陈独秀写信与李大钊商讨，确定叫共产党。由陈独秀草拟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以陈独秀为首的上海共产党（或称“上海共产党支部”，后来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为建立全国统一的党，积极进行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一）思想准备

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从1920年9月起改为上海共产党机关刊物，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列著作，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苏维埃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陈独秀亲自领导一个有陈望道、李汉俊、李达等人在内的翻译班子，翻译马列著作。

1920年7月，陈独秀筹画出版了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共出版六期），作为党的机关刊物，由陈独秀起草的《共产

党》第一号短言，成为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宣言。它明确地在中国树立起共产党的旗帜，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以及与其他党派的区别。短言宣布，“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有二大使命，一是经济革命，二是政治革命。”号召中国人民“用革命手段打倒本国的外国的一切资产阶级，跟着俄国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短言提出无产阶级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至于无国家，使资产阶级永不至发生。”这可以说是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草拟的第一个党纲草案，它成为一大党纲的基础。尽管这个纲领草案不符合中国社会特点和革命实际。对俄国革命经验机械模仿，但在当时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最重要的是短言明确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十月革命道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为组建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明确的指导思想。短言，在当时作为党员内部学习文件，以此为收纳党员的标准。《共产党月刊》还介绍俄共（布）党建党经验，列宁的建党学说，刊登第三国际和国际共运的实际情况的材料。《共产党月刊》成为各地共产主义组织成员的学习材料，对统一建党思想，加强各地党组织的联系，发挥了重大作用。可以说《共产党月刊》在某种程度上起了近似列宁办《火星报》的作用。毛泽东1921年1月21日给蔡和森的信中，曾以“旗帜鲜明”四个字来称赞陈独秀办的《共产党月刊》。

（二）走出研究室，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陈独秀认为，“共产党底基础建筑在无产阶级上面”。^①而研究马克思学说也“不是在屋中饮茶吸烟，研究其学理，便可了事”。^②他走出书斋和研究室，力图以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促

① 《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135页）。

② 《马克思的两大精神》（《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178页）。

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1920年8月，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面向工人群众的革命刊物《劳动界》，对工人进行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宣传，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启发工人的政治觉悟，倡导工人团结起来，开展劳工运动，受到工人的欢迎。工人来信说：“独秀先生……我们同伴的工人，多欢迎看你办的《劳动界》”，“从前我们有话无处讲，有冤无处伸，现在有了你们所刊行的《劳动界》，我们苦恼的工人，有话可以讲了，有冤可以伸了，做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名星呵！”^①陈独秀、施存统、陈望道等人于192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组织领导千余名工人，召开了庆祝五一大会。1920年11月，上海共产党领导建立了中国工人阶级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陈独秀到会发表了热情的演说。机器工会会员很快发展到300多人，并出版了《机器工人》。不久上海印刷工会、纺织工会也相继成立，并出版《友世画报》。这一时期陈独秀确是看重了工人阶级力量，尽力向工人进行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以便使中国工人阶级意识到本身的利益和历史使命。

（三）组织准备

以陈独秀为首的上海共产党，实际上成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和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组。上海共产党建立后，陈独秀立即写信给李大钊、张国焘，相约在北京同时建立共产党组织。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支部建立，并指导了北方各地建党工作。湖南共产主义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在陈独秀函约毛泽东后建立起来的，并且还寄去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章。上海共产党李汉俊写信给武汉的董必武，要他在武汉筹建党的组织，同时陈独秀在上海发展刘伯垂入党，要他到武汉筹建党组织，董必武与刘伯垂等多次商谈后建立了湖北“共产党支

^① 《劳动界》，第5册，1920年9月12日。

部”。上海党组织成员施存统于1929年夏去日本留学，建立了东京共产主义小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是陈独秀委托张申府去筹建的。山东共产主义小组是北京党支部派陈维仁去帮助成立的，并和上海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1920年12月，陈独秀应粤军司令陈炯明邀请，去广东任省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上海共产党由李汉俊代理书记。陈独秀在广东约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建立了广东共产党支部。各地共产党组织几乎都是由上海共产党直接、间接地联络成立的。1920年8月上海还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办外国语学校，以便向国外派出留学生，培养党的干部。

上海共产党实际上筹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1921年6月23日“一大”召开时，陈独秀在广州，派陈公博来上海参加大会并写了亲笔信提出了四点建议：（1）征求党员；（2）遵循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3）注意纪律；（4）目前主要工作为争取群众，为将来夺取政权作准备。^①大会采纳了他的建议。陈独秀的建党思想基本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主要有以下四点：

（1）主张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指导，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原则，走十月革命道路。

（2）认为“只有俄国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是真马克思主义。”^②基本上坚持列宁的建党的原则。以俄国布尔什维克为学习榜样，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

（3）组织上主张民主集中制，反对孙中山的总理独裁制和李汉俊的地方分权制。

（4）具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思想。主张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而尽力，不要依赖第三国际。

陈独秀的建党思想基本上是正确的。上海共产党是建立全国

^① 《社会科学》（上海），1981年，第3期，第26页。

^② 《社会主义批评》。

共产党的发起组，而陈独秀又是建立上海共产党的主要发起人，因此他理所当然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一大”选举陈独秀为中共中央局书记，便是对他作为党的创始人的地位作用的确认。“一大”后，陈独秀于1921年9月由广州回上海，在艰苦危险的环境下领导党中央的工作，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章

大革命时期的功过

(1922—1927)

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到1927年7月第五次代表大会，陈独秀历任中共中央局书记、委员长和中央总书记，是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陈独秀有密切关系，大革命运动的兴起、发展、胜利，以及由胜利转向失败，都和陈独秀息息相关。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月（约有半年），陈独秀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并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损失。他对大革命的失败负有重大历史责任。但是，大革命初、中期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和伟大胜利，也有他不可抹煞的功绩。科学地评价历史人物，应当“从既有的事实出发^①”，秉笔直书，既不因功匿过，也不以过掩功。

一、大革命的初、中期功大于过

大革命初期陈独秀的右倾思想已经暴露，在中期处理国共关系和工农运动问题上犯了一些严重错误，但是正确方面还是起主导作用的。陈独秀领导和参与制定的党的“二大”到“四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他主持下的一届至四届中共中央局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推动了革命运动迅速发展。1945年4月20日，中共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69页。

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总结第一次大革命的历史时，限于当时的条件，只讲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没讲他的功绩。但是决议既然讲“中国共产党全体同志，在这次大革命中，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怎能把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排除在外呢？毛泽东说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的革命积极性是非常之高的，因此获得了第一次大革命的胜利。”^①既然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又怎能说处于决策地位的总书记是完全错误的呢？事实上，从1922年到1926年期间，陈独秀对革命作了重大的贡献，择其要者而论之，有以下五点：

（一）在列宁和共产国际帮助下，主持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

陈独秀撰写的《共产党月刊》第一号短言，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都认为中国革命的直接目标是：无产阶级用革命手段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这反映了陈独秀和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同时对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又缺乏统一的了解；他们抛弃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坚持以社会主义救中国，同时都不了解中国的社会性质及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这时，列宁于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二大提出的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还没有传到中国。党的“一大”没有制定出一个合乎中国实际的革命纲领。

一大之后，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面临严酷现实是：国际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争夺远东地区，并为重新分割中国而激烈争斗，国内武人横行、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政治上毫无民主自由。1922

^①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

年9月，陈独秀从广州回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不久，便以“宣传过激主义”罪名遭法租界巡捕房逮捕，旋即被保释出狱（这是他五四运动以来的第二次坐监）。社会现实，使陈独秀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① 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也说到，“发行《共产党半月刊》专讨论世界的及本国的政治经济问题”。^② 随着对世界形势和中国社会现状的研究，陈独秀等中央领导人逐步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统治是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1921年9月，陈独秀发表《太平洋会议与太平洋弱小民族》一文，指出，“太平洋会议底结果若是列强互相妥协了，中国被压迫的程度将比以前更甚”，“若不急谋剧烈的反抗，迟早不免要受到列强分管和共管的命运”。^③ 1922年四五月间，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张国焘等人，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列宁的《民族殖民地提纲》的精神。这个提纲阐明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性质、任务等基本问题，使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受到极大启发和帮助。

这时中国的政局正是直、皖、奉三派军阀势力进行争夺中央政权的混战。1920年7月，直奉联合打败皖系。1922年4月直奉开战，奉系败北，直系独霸北京政权，打着“恢复法统”的旗号，企图武力统一中国。而一些势力较小的地方军阀则以“联省自治”相抗衡。北京的一些名流学者对吴佩孚寄以希望。1922年5月，胡适、蔡元培等人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提出“好人政府”的口号，主张不分党派，由全国

① 《马克思的两大精神》（《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178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32页。

③ 《新青年》，第9卷，第5号。

公认的好人组织政府，实行废督、裁兵、财政分开、尊重国会、制定宪法、停止内战、和平统一。一些党外朋友要求中国共产党支持好人政府。北京党的负责人李大钊也曾认为，好人政府是当前局势中一种差强人意的办法。

面对如此混乱的政治局面和众说纷纭的政治主张，中共中央必须向全国人民阐明自己的主张。这时陈独秀根据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精神，分析了时局，代表中共中央于6月15日起草发表《中共中央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文件分析了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民主革命屡遭失败的教训，明确指出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本国军阀的压迫是中国内忧外患和人民痛苦的根源，批评了“恢复国会”、“联省自治”、“好人政府”等错误主张，提出“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①初步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目标和斗争纲领。当李大钊在北京读到中央第一次对时局主张时，立即表示这是正确的、合时的，并向北京那些主张好人政府的朋友说明这是党的正确主张。与此同时，陈独秀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状况，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和严重的封建性质。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应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段路程。中央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和《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文，成为起草中共“二大”宣言的基础。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陈独秀代表中央局向大会作了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等九个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大会对国际、国内现状的分析，和民主革命任务的认识，集中体现于《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起草委员会由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三人组成，宣言由陈独秀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26页。

执笔起草，蔡和森修改补充。

宣言通过对国际、国内形势和中国社会基本状况的分析指出，当前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革命的基本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力量之一。宣言规定，党的最高纲领“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最低纲领即当前的基本任务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为了贯彻民主革命纲领，大会在《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号召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压迫。

“二大”宣言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正确地论述了中国的社会性质，指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比起一大纲领是一个认识上的飞跃，它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第一次大革命运动的根本指导方针。

“二大”取得的成就与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同时反映了一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任务，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积极成果。陈独秀在取得这一成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大”宣言的缺点是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缺乏认识，说“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等，这是党在理论上的幼稚的表现，不能认为这时陈独秀已形成二次革命论的右倾错误。

（二）在共产国际领导下，主持制定革命统一战线方针，积极进行第一次国共合作。

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方针的确立，有一个在实践中摸索和认识

的过程，陈独秀在这一过程中起了积极作用。

据包惠僧、张国焘、陈公博等人的回忆，和“一大”有关文献印证，党的“一大”会议曾讨论过党对于北方军阀政府和南方军政府以及孙中山、国民党的态度问题。张国焘等认为，南北政府是“一丘之貉”，应一律攻击。“一大”决议反映了这种观点，说“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①但是，董必武、李汉俊等代表认为应肯定孙中山自同盟会以来所进行的革命，孙文学说是有进步意义的。当时还有人以党的领袖陈独秀在广东政府任职为理由，说明南方政府比北方政府好，应区别对待。会中，由张国焘草拟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把南北政府相提并论，引起双方争执，未获通过，决定授权新选出的总书记决定。陈独秀在广东听取陈公博的报告后，决定不发宣言，因此中共“一大”文献没有宣言。^②这说明陈独秀采取了对孙中山、国民党和北方军阀政府加以区别的态度。党的“一大”之后不久，马林与陈独秀商得一致意见后，开始同孙中山接触。据包惠僧说，在“陈独秀同意之下，马林就于1921年10月间同张太雷到广州，和孙中山商谈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战线问题去了”。^③

1922年6月16日，广州发生了陈炯明军队围攻孙中山总统府事件。广东党内曾发生支持陈炯明还是支持孙中山的争论。陈独秀在上海当即向国民党明确表示，他虽然一度和陈炯明合作，现在陈已叛变革命，中共即与其断绝关系并一致声讨。中共广州支部负责人陈公博、谭植棠等公开发表支持陈炯明的文章。中共中央两次致函广州支部，严厉批评他们的错误，并将不执行中央指示的谭植棠开除出党，给陈公博以严重警告处分。中共中央还向国民党声明，中共将不因孙中山先生所受的暂时挫折而改变与他合

①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7页）。

② 陈公博：《我与共产党》。

③ 栖梧老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

作的立场。中共中央的鲜明立场和态度，使孙中山在危难中感到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支持和帮助。这件事对于促进国共合作起了重大作用。

党的“二大”之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向中共中央局提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建议。陈独秀和中央多数领导人主张党外联合，而不同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1922年4月2日，陈独秀给维津斯基写信，申述反对党内合作的理由：国共两党的宗旨及所依据的基础不同；国民党联合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不相容；人民认为国民党是一个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加入则在社会上失去信仰等等。陈独秀意见的主旨是要在独立、平等的基础上同国民党联合，而不是反对国共合作。在陈独秀的主持下，1922年7月召开的“二大”通过了联合战线的方针。1922年8月，西湖会议上，由于马林的建议得到国际批准，并以国际指示下达，再经马林、李大钊的解释，陈独秀遂接受党内合作的意见。但对马林的建议提出了一个修正，要求国民党取消打手模，忠于个人的誓词，共产党员得根据党的指示加入国民党。西湖会议后，陈独秀、李大钊、马林等多次与孙中山晤谈，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必要，促使孙中山同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改组国民党。不久，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首先加入国民党，开始了两党的正式联合。

1922年11月初至12月初，陈独秀率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的主题是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刘仁静代表中国代表团在会上发言说，中国共产党“已决定和国民革命的政党即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其形式是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并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①会后，1923年1月12

^① 刘仁静：《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日，共产国际正式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陈独秀完全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并把这个决议带回中国，贯彻于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之中。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陈独秀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上届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报告。报告说，中央委员会在反动当局剧烈的迫害，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始终“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口号下”坚持工作，开展了宣传工作、工人运动，争取人权运动，发展了党的组织，使“许多地方小组已联合成地区小组”，党员由“二大”时的195人发展到420人。报告强调说明了通过党内合作的形式实现国共合作的重大意义，他说：“在上届代表会议上，我们同意远东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与民主革命派合作问题的决议。情况的发展表明，只有联合战线还不够，我们又接到了共产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的指示。”“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们说服了与会的人，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重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以后我们便更多地注意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开始参加现实的运动”。^①这说明陈独秀已充分认识到，党的“一大”制定的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直接目的，不联合其他民主党派的纲领和政策是脱离中国社会实际的，而以党内合作形式建立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则是中国共产党参加现实运动的切实可行的政策。因此他把“三大”统一战线政策的确立，说成是党的政策由唯心主义到切合实际的重大改变。陈独秀的报告批评张国焘“思想非常狭隘”，“犯了很多错误”，表扬“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他还进行了自我批评，说“由于对时局看法不清楚……犯了很多错误”。

^①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党史研究》，1980年，第7期，第42页）。

大会在陈独秀主持下，热烈地讨论了国共合作的形式和策略问题，批评了张国焘、蔡和森等人的“左”的观点，基本统一了思想，通过了大会宣言和《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正式决定了以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参加国民党的方式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

在这次大会上，陈独秀和马林虽然表现了过分重视国民党，与忽视共产党独立性的右倾思想，但这不是主要的错误倾向。他作为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执行共产国际指示，主持制定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方针的功绩应充分肯定。

“三大”之后，陈独秀领导共产党积极参加改组国民党的工作。1922年9月4日，他参加了孙中山在上海召集的国民党中央和各省负责人会议，研究国民党改组计划。会上，孙中山指定陈独秀参加九人组成国民党改进草案起草委员会，改组后的国民党宣言和党纲、党章都是在陈独秀的积极参加下制定的。1923年1月，“中国国民党宣言”发表后，孙中山以总理名义任命陈独秀为国民党本部参议。陈独秀在推动国民党改组，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中起了重大作用。

（三）领导制定“四大”路线，并为贯彻

“四大”路线而积极工作。

从“三大”到1925年“四大”前后，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卓有成效的，陈独秀在中央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

1923年11月，陈独秀主持召开了中共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通过了《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确定“国民运动是我党目前全部工作”。“国民运动，当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指出，“国民党之力量必须建设在各种人民组织上面，必须以国民党名义去创造或参加各种人民组织”，“我们必须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但事实上不可能

时，断不宜强行之”。^①会后，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十三号》，要求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协同国民党积极筹建，要求选好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代表，以便“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旧的错误观念”。^②党的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和中央十三号通告有力地促进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纲、党章和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的决定，标志着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1924年5月，陈独秀主持召开了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讨论党在国民党中的工作，检讨了右的倾向，确定了党在国民党中的工作方针是“巩固国民党左翼和减杀右翼势力”，^③使“三大”以来的右的倾向得到一定的纠正。在党中央正确方针的指导下，共产党员大部分加入了国民党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我党帮助国民党组织了中央机构，健全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建立了工人部、农民部，并由共产党人在这些部里任领导工作，还有一些共产党员任国民党中央几个部的秘书工作。各省市的国民党党部也大都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进行了改组。在苏联的帮助下，党帮助国民党在广州建立了黄埔军校。党还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以广州为中心，积极恢复和发展了工农运动。1924年7月，以广州沙面工人罢工为转机，全国工农运动逐步恢复和发展。10月，孙中山在共产党的支持下镇压了广州商团叛乱。北京、上海等地人民团体发起成立反帝大同盟，掀起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反帝运动。中国共产党利用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的形势，积极支持孙中山北上，发起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的群众运动。这时，党的组织也由“三大”时400多名党员发展到900多人，从中央到地方的工作都比较活跃，工作成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编》（1921~1925），第146页。

② 同上，第165页。

③ 《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

效显著。

在全国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情况下，1925年1月，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维津斯基主持了这次大会。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的代表向大会作了报告。陈独秀作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决议案》，肯定了“三大”以来中央领导工作，“大会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下本党在国民党及国民运动中的活动，使本党日渐与实际政治生活接近而有可以领导中国国民运动之趋势，大致认为满意”。议决案指出，“第四次大会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中国政局的分析完全同意”^①，会议通过了11个议决案，其中《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和《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集中体现了大会的政治路线，《宣言》由维津斯基起草，得到陈独秀的赞同。第四次大会的突出贡献是：

（1）基本正确地分析了各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地位与趋向，明确提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我们务必在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民族革命的时代努力获得最大多数农民为工人阶级的同盟。”^②

（2）初步总结了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经验，提出了帮助和扩大国民党左派，批评争取中派，反对右派的政策，指出右倾错误是当时党内更为危险的错误。

（3）为了迎接和推动革命高潮，大会对发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作出了具体部署。

大会制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当然与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是分不开的。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陈独秀、李大钊等9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陈独秀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编》（1921—1925），第268页。

^② 《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

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

“四大”后，陈独秀主持中央工作，贯彻了四大路线，推动了革命形势迅速发展。1925年1月，中央政治局作出《对段祺瑞善后会议之议决案》，推动了全国各地要求召集国民会议的人民民主运动。

为了加强党对工农运动的领导，中央机关设立了中央农工部（张国焘任部长），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张国焘任书记、李立三、刘少奇任副书记），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委员阮啸仙、彭湃、易礼容等人）。各地方党组织也相应建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1925年2月，在郑州召开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5月1日党发起召开第二次劳动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这些都为迎接革命高潮到来作了思想和组织准备。“四大”闭幕后4个月，便爆发了五卅反帝革命运动。

（四）积极领导五卅运动，为促进革命高潮到来作出重大贡献。

五卅运动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发动和进行的，四届中央委员会常驻上海中央局的有陈独秀、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等五人。彭述之于五卅运动前两个月因病住医院，到运动结束后才出院。蔡和森于运动开始后不久去北京养病，10月间返沪旋即去苏联。所以留在中央局领导五卅运动的只有三人，即陈独秀、瞿秋白和张国焘。^①瞿秋白负责宣传工作，主编《热血报》，张国焘负责工人运动，陈独秀以中央总书记身份统筹全局，在中央的集体领导中起了决策作用。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刘少奇（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兼总务部长）、李立三（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刘华（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指挥工人运动，恽代英（《中国青年》主编，上海学联总书记）和李求实等人领导学生运动；

^① 郑超麟：《中国共产党与五卅运动》。

向警予、杨之华等人领导妇女运动；沈雁冰、杨贤江等人领导职员运动。

1925年2月，陈独秀亲自领导了上海的日本和其他外国纱厂的罢工斗争。他“指导工人如何提要求，如何推举代表，如何同外国资本家、中国资本家谈判。”^①二月大罢工成了五卅运动的前奏。

5月15日，上海日纱厂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群众激愤，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5月28日，党中央召开会议，研究了当时的形势和党应采取的策略，提出应当把工人经济斗争与目前正在蓬勃发展的反帝斗争汇合起来，使工人成为反帝统一战线中的中坚，争取一切反帝力量的援助。陈独秀主持会议，通过了《扩大反帝运动和组织五卅大示威的决议》。

5月30日，美英帝国主义在南京路开枪镇压游行示威的工人、学生。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陈独秀连夜召开党中央紧急会议，确定了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作为领导五卅运动的总策略，号召全市实行三罢（罢工、罢课、罢市）。党中央成立了行动委员会来领导三罢斗争。31日晚，上海总工会成立，陈独秀在大会上讲了话。会上宣布第二天实行全市总罢工。

三罢实现后，6月1日晚，党中央又召开会议，决定由上海总工会发起，成立工商学联合会作为统一领导全市反帝运动的公开机关，还决定把运动扩展到全国去。

8月上旬，帝国主义勾结奉系军阀加紧镇压罢工运动，上海资产阶级妥协调摇，单独开市。当运动面临危机的情况下，陈独秀在一次工会干部会议上，听取和采纳了刘少奇的正确意见，召开中央会议，及时作出决定，改变罢工斗争策略，以经济要求及地方性政治要求为最低条件，有领导、有组织地复工。8月10日，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发表《告全国工人、兵士、学生书》，指

^① 郑超麟：《中国共产党与五卅运动》。

出，有条件的复工“决不是停止反帝国主义斗争”。这就在不利的形势下及时正确地布置了退兵之战，使工人阶级免遭更大的损失。

五卅运动期间，陈独秀和瞿秋白在《向导》周报和《热血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揭露帝国主义残暴罪行，鼓舞群众革命斗志，不断总结运动中经验教训，指导运动的发展。

尽管陈独秀在运动中也有一些错误言行，但是他作为中央主要领导人积极领导五卅运动的功绩，应当得到充分肯定。

（五）为维护国共合作大局，领导和参加了 同国民党老右派的斗争。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酝酿、建立过程中，陈独秀曾经同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反动言行进行了斗争。西湖会议后，陈独秀率先加入国民党，积极帮助国民党改组工作，遭到国民党右派的攻击。1923年11月29日，国民党中央后补执委邓泽如、林直勉等11人上书孙中山说：“此次改组，陈独秀欲藉俄人之力量耸动我总理，于有意无意之间使我党隐为彼共产党所指挥……五年后将见陈独秀选为总理矣。”说陈独秀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灵魂”^①，恶毒攻击陈独秀为“陈毒兽”。由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帮助，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得到孙中山的肯定和支持，才排除了右派的干扰，实现了国共合作。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之后，共产党人加入到国民党中央领导机关，引起右派的恐惧。冯自由、马素等人出刊物，发传单，召开各种会议，公开反对国民党“一大”宣言。6月，张继、谢持、邹鲁、邓泽如等右派分子再次提出对共产党弹劾案，发表护党宣言，破坏国共合作。7月21日，陈独秀签发了《中央通告第十五号》，指示各地区党组织，对于右派分子的攻击、排挤必须进行

^① 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

适当的斗争，“对于非革命的右倾政策，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①陈独秀、恽代英等中央领导人在《向导》周报上发表了許多驳斥右派谬论的文章。陈独秀撰写的《我们的回答》一文，针对国民党右派出版的《护党特刊》、《民权旬刊》、《共产党破坏国民党证据之一部》等印刷品中污蔑共产党的论调，进行了有理有力的批驳。指出右派攻击共产党的实质，不是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之争，“更不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之争；实在是国民党内左派与右派之争，也就是国民党内革命派与不革命派之争，左派代表的是民众利益，右派代表的是私人官僚利益。”^②

五卅运动前不久，国民党右派出于对工农运动的恐惧心理，大肆污蔑工农运动。陈独秀于1925年3月7日发表《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对付中国国民运动之总策略》一文，告诫工人阶级“要认清敌人——帝国主义、军阀、国民党右派、工贼、冒充工会运动者——的策略，不要畏避他们的符咒，中他们的奸计呀！”^③

五卅运动以后，工农运动在全国得到空前的大发展，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日益激化，作为革命统一战线联合体的国民党也发生急剧分化。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国民党右翼势力（国家主义派、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等）纠合起来，纷纷蠢动。

为了开展反对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共中央发出了第65号通告，指出：“我们现在对于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右派之思想上的斗争，非常重要。”^④1925年下半年到1926年初，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右派势力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陈独秀虽然犯了许多右倾错误，但在反对国民党老右派斗争中是积极的。他于1925年9月11日发表《给戴季陶的一封信》，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223页。

② 《向导》，第83期，1924年9月17日。

③ 《向导》，第105期，1925年3月7日。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编》（1921—1925），第446页。

毫不客气地把戴季陶同国民党老右派并列加以批判，说：“自国民党改组以来，排除共产派的运动，不曾一日停止过。这个运动的最初代表人要算谢惠先生和冯自由先生；其次便是马素和邓家产两位先生；最近便轮到你季陶先生了。”^① 这封信针对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那本小册子散布的种种反共论调，从理论上和政治上给予了有力的批评。从1925年下半年至1926年春，陈独秀发表了《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预防赤化的国民党右派》、《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国民党右派之过去、现在及将来》等一批文章，这些文章批判了右派反苏、反共、反对工农运动，歪曲三民主义，破坏国共合作的反动谬论，分析了国民党分化为左、右派的原因、背景，揭露了右派的阶级实质。他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1月）前，冯自由为首的右派乃是代表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及奸商买办阶级利益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6年1月）前后，戴季陶为首的右派乃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② 由于这时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已经形成，他对右派的斗争是不力的。他认为以冯自由、马素为首的右派是老右派，戴季陶和孙文主义学会是新右派，而对于正在崛起，更加危险的真正的新右派蒋介石、胡汉民、谭延闿、吴稚晖等人却认识不清，并把他们当作国民党左派加以吹捧。陈独秀在1926年春的右倾错误主要是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认识不清，妥协让步，而在反对国民党老右派的斗争中是积极的，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形成和发展

陈独秀在大革命初期已经产生了右倾理论观点，大革命中

^① 《向导》，第129、130期。

^② 《国民党右派之过去、现在及将来》，1926年4月3日。

期，已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到大革命末期发展成为完整的投降主义路线错误。其发展过程，大体可分为几个阶段：

（一）1923年党的“三大”前后开始产生“二次革命论”的右倾观点。

1922年，陈独秀提出中国革命应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段路程，但是这两段路程关系如何？中国共产党人如何从第一段路程走上第二段路程还是十分茫然。1922年初，在党的领导下出现了第一次全国性的罢工高潮，在这次罢工运动的高潮中，陈独秀曾看重工人阶级的力量并由此预测到中国民主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他于1922年9月20日发表的《造国论》一文说，在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军阀的压迫下，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很难发展，“到了国民革命能够解除国外的侵略和国内的扰乱以后，无产阶级所尽的力量所造成的地位，未必不大过资产阶级，以现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倾向大过资产阶级便可以推知，那时资产阶级决难坚持独厚于自己阶级的经济制度，所以我们敢说，采用社会主义来开发实业，是国民革命成功后不能免的境界”。^①但是，“二七”惨案之后，陈独秀看到工人运动的暂时消沉，工人中无政府主义、经济主义和黄色工会势力抬头，又转而低估工人阶级的力量，改变了《造国论》中的观点，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太幼稚，而资产阶级力量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由此而逐步形成“二次革命论”的右倾理论观点。其代表作是1923年4月发表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7月发表的《中国农民问题》，12月发表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贯穿于三篇文章中的基本思想是把中国当时的国民革命当作辛亥革命一样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他说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幼稚的资产阶级未能从封建官僚阶级中截然分化出来，资产阶级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238页。

不懂得辛亥革命的阶级意义，革命失去了阶级基础，遂使政权为北洋军阀篡夺。因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若失去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①，在阶级力量的估价上，他过低估计无产阶级的力量和作用，夸大资产阶级的力量，说“国民革命中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②他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观念和对阶级力量的错误估计出发，得出中国革命的公式：“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国民革命成功后……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等资本主义发达起来，无产阶级再来进行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这就又回到18—19世纪欧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老模式。这种“二次革命论”的思想成为他以后观察指导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

这三篇文章中也有正确的方面：（1）分析了中国工人阶级中有雇农、手工业工人、产业工人三种类型，肯定了少数产业工人是“最勇敢的先锋队”；（2）指出了商业、工业资产阶级而外的官僚资产阶级，依赖外国势力和军阀政府，不但不是革命的而且是反革命的；（3）在夸大资产阶级力量的同时讲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幼稚性；（4）讲农民居处散漫，难以加入革命，同时又讲由于外资入侵，农业经济破坏，兵匪、天灾、官绅鱼肉等驱使农民有加入革命的可能。在《中国农民问题》一文中还说，经济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民经济基础是农业，农民占人口之大半数，是国民革命的伟大潜力，中国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加入，“终不能成为一个大的民众革命”。

但是这些正确的论点并没有改变其“二次革命论”的基本思想，其要害处是不承认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他讲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实际上是把农民当作资产阶级的同盟军而不

①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② 同上。

是当作无产阶级的同盟军。

(二)从1924年5月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到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陈独秀的右倾思想暂时得到纠正。

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说：“陈独秀的中央对于职工运动的取消主义倾向一直到1924年5月共产党扩大会议上才纠正过来。”党的“四大”后，工农运动迅速发展，在五卅反帝斗争的风暴中，工人阶级发挥了主力军作用，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也明显暴露出来。这一时期陈独秀发表了《中国国民运动中工人阶级的力量》、《亡国的上海》、《殖民地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革命的上海》、《我们应如何应付此次运动的新局面》等一系列文章，高度评价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提出了工人阶级领导权的观点^①，批评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但是这些文章不过是他在五卅运动热潮感染之下一种感性认识，并没有达到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理论认识，所以当五卅运动遭到失败，北方发生郭松龄倒戈失败，国民军败退，吴佩孚攻取河南等不利事件时，他又对工人阶级力量丧失信心，在国共关系上采取以退让求团结的政策。

(三)1926年上半年陈独秀的右倾思想进一步发展，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对国民党新右派妥协退让。

为了反击国民党新老右派的猖狂进攻，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我党领导人周恩来、毛泽东、陈延年等主张联合国民党左派打击右派，开除戴季陶、孙科的党籍，争取在国民党中央执委选举中中共党员和左派各占三分之一，挤掉右派并采取措施限制蒋介石的军事势力，但是遭到陈独秀的反对。他认为郭松龄倒戈失败

^① 《向导》，第160期，1926年6月30日。

是革命低潮的到来，为了维持广东地区国共合作的局面，应执行让步策略。他在上海同戴季陶、孙科等谈判，邀请他们回广东参加国民党“二大”，并亲自写信指示广东党组织欢迎这些右派回粤参加大会。他派张国焘到广州担任出席大会的共产党党团书记，贯彻执行退让政策。结果这次大会虽然给了右派一定的打击，但在最后选举时，戴季陶、孙科、胡汉民等右派人物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右派分子占了绝大多数。还把新右派蒋介石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抬高了蒋介石的地位。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用阴谋手段排挤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力量，篡夺革命领导权。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主张坚决回击，但是陈独秀附和苏联顾问团意见主张退让政策。他于6月9日发表的《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认为中山舰事件的原因是“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一切工作中都太过负责任”^①。结果，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蒋介石篡夺了第一军的军权。

1926年5月1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在国民党内排斥打击共产党，实现右派篡夺党权的“整理党务案”。对此，陈独秀仍然妥协退让，使这个反动的提案在会上通过。事后他于1926年6月9日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说，这是国民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②还说，这是两党合作的方式而不是反共阴谋。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后，蒋介石新右派分子在国民党中央机构中占了绝对优势，掌握了国民党的军政大权。

北伐战争前，蒋介石取得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掌握了

^① 《向导》第157期，第1527页。

^② 《向导》，第157期，第1526页。

北伐军的指挥权。北伐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对待蒋介石应采取何种方针，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陈独秀举棋不定。当时苏联顾问加伦将军提出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还是削弱蒋介石？广东区委请示中央，陈独秀说开会商量商量，张国焘主持开会决定方针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①，实际上听任蒋介石为所欲为。这说明陈独秀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认识不清，毫无戒备。

（四）1926年7月中旬，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上，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开始被中央接受。

这次会议在北伐军胜利进军，工农群众运动迅速发展的重要时刻召开。会议的正确方面是：（1）分析了国民党已分化为反动的右派、新右派、左派和共产派。指出广州三二〇事件、整理党务案都是对共产党的进攻，“确是反革命的行动”。^②提出共产党要和国民党左派结成强大的斗争联盟。（2）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动摇性，提出无产阶级应与资产阶级争此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③（3）承认“农民的政治觉悟及其在政治上、生活上的地位，必是一天一天地发展，将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之主要势力。”党要取得农民运动的指导权。^④（4）提出党“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⑤此外对工农群众运动、宣传、组织工作等也作了一些正确的决定。

① 周恩来，《关于一九二四年至二七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4页）。

②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1926年7月。

③ 《中央政治报告》，1926年7月。

④ 《农民运动议决案》，1926年7月。

⑤ 《军事运动议决案》，1926年7月。

陈独秀右倾思想影响这次会议的主要表现是：（1）陈独秀在《中央政治报告》中坚持了他于7月7日发表的《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中的错误观点，说出兵北伐只能是防御战，对北伐战争持消极态度，没有提出积极参加北伐战争的措施，会议通过的13项决议和《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只字未提“北伐”；（2）会议接受了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思想，认为中国民族运动的最好前途是“以革命手段达到民族的资本主义建设”；（3）会议虽提出了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争领导地位，但是强调要拉住资产阶级，害怕同资产阶级斗争会逼跑他，使革命运动流产”，错误地认为蒋介石、戴季陶等新右派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在客观上有倾向革命之可能的”，因而只强调反对老右派，对新右派则一味妥协退让；（4）会议虽讲到党应该取得农民运动指导权，但是又认为当时刚刚兴起的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的毛病”，在防止农民越轨之下，对农民运动作了许多限制。如限制农会权利和农民武装，提出由“正绅代替劣绅”为团总等。

以上几点说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开始形成中央的政策决议，直接影响了党中央的领导。

会后的一年时间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尚未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党的“四大”路线仍然起着指导作用。7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号通告，号召“民众积极的起来推动这个北伐，响应这个北伐”，“使北伐更多具有革命意义”。^①改变了对北伐的消极态度。9月10日，又发出了中央通告（钟字）第12号、15号、17号、18号和中央致粤区的信等文件，在发展工农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北洋军阀、反对国民党右派斗争中执行了许多正确的主

① 《中央政治报告》，1926年7月。

② 同上。

③ 《中央通告第一号》，1926年7月31日。

张和政策。北伐战争和工农运动都在轰轰烈烈地发展，所以还不能认为这时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

1926年下半年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思想进一步发展，突出地表现在政权问题上，正当北伐军会攻武汉、激战南昌、工农运动迅猛发展的时刻，陈独秀于9月25日发表《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一文说：“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还说“国民革命成功后之建设时期……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我们不是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①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北伐军到达武汉后，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共产党员“此时必须立足于在野党地位”，^②严令禁止参加政府工作，凡是已参加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员“限期辞职”，否则“立即登报公开开除”。^③在武装斗争胜利发展，党面临政权归谁所有的重大问题上，陈独秀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

（五）1926年12月党中央汉口特别会议，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形成，并开始~~在~~在中央占统治地位。

陈独秀在中央特别会议上的政治报告对形势作了错误的分析，提出了系统的机会主义的指导路线、方针和政策。

政治报告说，北伐军攻下南昌、九江之后，革命统一战线出现破裂的危机。危机发生的原因是：（1）帝国主义之分离政策；（2）国民党之右倾；（3）工农运动的发展使资产阶级恐慌；（4）我们党中的左倾幼稚病。他列举了“左稚病的六种表现，如包办国民党、包办民众运动等，实际上是把党内的正确主张和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263页。

② 《中央复湘区的信》，1926年10月7日。

③ 《中央给江西地方信》，1926年12月2日。

政策当作左倾幼稚病加以反对。

政治报告提出了七项解决危机的“挽救策略”：（1）防止党外右倾，同时反对党内左倾，以巩固联合战线；（2）督促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实行武力和民众结合的口号；（3）维持国民党军事首领势力之均衡；（4）扩大民主主义的宣传；（5）改善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6）扶助左派，建立以汪精卫为领袖的文人派政府；（7）确定我们对中小商人的政策。这七项的中心是“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陈独秀说：“联合战线之巩固程度，乃以这种‘左’右倾的距离远近为正比例”。^①他一方面用妥协退让的办法防止国民党右倾，同时用限制工农运动来反对党内左倾，其结果只能是断送党对革命的领导权，使右派的反革命阴谋得逞。

为了拉住汪精卫等国民党上层人物，政治报告完全否定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必要性，说土地问题只可以作为一般宣传口号，不可作为斗争口号。会议通过的《农民运动议决案》，把土地问题称为“研究室中”的问题。1926年下半年，农民问题成了时局发展的重大关键问题，否认农民土地斗争，也是一个带全局性的错误。

会议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议决案》，肯定了“仲甫同志的政治报告中所指出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各种危险倾向都是事实”。“仲甫同志在报告中所述各项挽救的策略，大致是对的。”^②要求各地方党部马上召集各种形式的党员会议，讨论贯彻执行。这就使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合法化，并开始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瞿秋白说，汉口特别会议是陈独秀右倾错误发展的一个关键性会议^③。它标志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形成。

① 陈独秀，《政治报告》，1926年12月13日。

② 《关于政治报告决议》（《中央文件选编》（1926），第389页）。

③ 瞿秋白，《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

（六）1927年上半年，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全面发展和贯彻，大革命运动由胜利转向失败。

汉口特别会议以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政策贯彻到各项实际工作中去。

1926年12月，蒋介石进占南昌后，发生迁都之争。蒋介石排斥异己、专横跋扈、篡权独裁的野心充分暴露，在国民党内出现了一种迎汪抑蒋运动。国民党左派和李济深、唐生智等各种迎汪势力都希望得到共产党的支持，以增加他们力量的砝码，中共应当利用这一形势，发展国民党左派，壮大工农群众力量。但是陈独秀却按照左的向右，右的向左的方针，在蒋、汪、唐之间搞所谓力量平衡，互相牵制的策略。陈独秀企图用蒋、汪、唐之间的均势来限制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他的立脚点不是站在发展壮大工农群众力量上面，而是到处帮助别人发展力量，特别寄希望于汪精卫，却没有发展自己的力量，结果不但不能防止统一战线破裂，反而加速了它的破裂。

在四一二政变前夕，陈独秀作为上海党中央机关主要负责人，没有利用当时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后高涨的革命形势，掌握工人武装纠察队，巩固发展工人阶级队伍，团结拥护和同情革命的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以及北伐军士兵和下级军官，壮大革命力量，作出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而是丧失应有的革命警觉，采取投降主义的政策。一方面他对蒋介石抱有幻想，企图以妥协退让来缓和冲突，说对于蒋介石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差不多都可以答应。^①他默认蒋介石制止上海政府成立的命令，遂使吴稚晖、钮永健等右派组成“上海临时政府委员会”，取代了上海人民的政权。为适应蒋介石的要求，他提出把工人纠察队成员派到国民革命军去“以淘汰复杂分子”，禁止工人纠察队执行镇压反革

^① 陈独秀：《给中央江浙区委的信》，1927年3月。

命任务。另一方面陈独秀把阻止时局逆转的重点放在以汪抑蒋上面，4月1日汪精卫从欧洲回国，4月3日便发表了《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说“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全体会议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为正在磨刀霍霍的蒋介石涂脂抹粉，解除了党和工人阶级的精神武装。蒋介石正是利用了陈独秀的错误，在无产阶级毫无戒备的情况下突然发动了反革命的政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地区的革命形势仍然继续发展，武汉革命政权还保有湘、鄂、赣三省，河南一部分和10几万正规军及许多工农武装。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反蒋运动。武汉国民党中央及武汉政府发布斥责蒋介石的命令，撤消蒋介石一切职务并下令通缉。但是武汉政府也处在反革命力量的四面包围之中，统一战线内阶级关系急剧变化。在这严重的关头，党怎么办？这时党内发生了东征讨蒋，还是北伐打张作霖的争论。在中央工作的瞿秋白主张东征讨蒋。在上海的周恩来、陈延年、罗亦农、赵世炎、李立三于1927年4月中旬联名向中央发出意见书，建议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指出如不迅速讨蒋，“则东南之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即使武汉北伐能直捣京津，而蒋之政权已固，继蒋而起者亦将大有人在。”^①党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分歧，谭平山、张国焘主张南伐，重建广东根据地。陈独秀、彭述之、张太雷等支持鲍罗廷的意见，主张和国民党左派一起北伐，与冯玉祥会师，打通国际路线。罗易又主张推迟北伐，先在两湖一带深入土地革命，巩固革命现有地域再谋扩大。党中央举棋不定，4月16日刚通过推迟北伐的决定，18日又撤消此决议，而支持国民党北伐，这就丧失了一个挽救革命的有利时机。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6页。

由于共产国际和陈独秀把持的党中央犯了许多右倾错误，造成革命的失利，引起党内许多同志的不满。瞿秋白于1927年二三月间写了《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指出陈独秀、彭述之的投降主义政策是党之大病，“必须赶快手术，暴露其病根。”周恩来在4月16日中央浙江区委的一次会议上，提出在将要召开的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检查党中央对广东、上海工作指导上的错误。毛泽东邀集彭湃、方志敏等各省农民协会负责人，在武汉举行联席会议，制定了立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方案，上书中央。为了总结教训，确定政策，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4月27日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在大会上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政治、组织报告。报告总结了党的“四大”以来的工作，承认了一些错误，但仍然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和立场，错误地估计当时的形势。在革命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却说，“革命运动中的潜在危险大为减少”。他为自己“三二〇事件”后的错误辩解，说“共产党的退让，是由于力量不足和党没有适当的准备而引起的。在广东，发生这样的错误应该认为是可以宽恕的。”^①他坚持把蒋介石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说“蒋介石叛变意味着百分之九十九的大中资产阶级变节”。^②他赞成鲍罗廷向西北去的逃跑主义理论，说“现在革命在向西北发展，而不是向东南发展”。^③他在报告中提出了土地问题，但是又反对没收一切地主土地，说“应该考虑对小地主的让步。不应陷入极左的错误，应保持一种折中的中庸的路线。”

会上，瞿秋白、任弼时等许多代表发言，对陈独秀的报告和右倾错误提出尖锐批评。大会通过的决议，批评了陈独秀在中央

^①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央委员会作的政治、组织报告（要点）（《党史研究资料》，第11期，1980年6月5日）。

^② 同上。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第40页。

领导工作的右倾错误。在《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否定了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指导方针，指出党中央在北伐战争的错误。“其根本原因，是因为过分估量了大资产阶级的作用。那时的策略是先帮助资产阶级完成其革命的第一阶段（扩大），然后再来做第二阶段的深入”。^①因而导致一系列的右倾错误。决议指出，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权，“足以保证革命的前途，将来不会开出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而是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②

大会通过的决议虽然对于党的政策和任务作了许多正确的规定，但是由于党在政治上、理论上的幼稚，对于当时革命迫切需要解决的许多现实问题，没有作出切合实际的回答。党内许多同志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的严重性和危害性认识不足，大会仍然选举陈独秀为党中央总书记。会后很多中央委员分赴各地，党中央的领导工作仍由陈独秀主持负责，结果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继续在全党贯彻并造成严重后果。

为了挽救中国革命危机，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27年5月召开第八次全会，专门讨论中国问题，通过了《中国问题决议案》。会议期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出两个紧急指示。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在对中国革命形势、任务的判断和对武汉政府的估量上有错误，但是提出了一些挽救革命的正确意见，其要点是：强调动员千百万农民从下面直接实行土地革命；加强工农武装，组成8个或10个师，动员2万共产党员和两湖5万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注意改造武汉政府；吸收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叛变分子等。共产国际五月指示到达中国时间过晚，又缺乏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共产国际的两个代表鲍罗廷和罗易意见又不一致，指示精神未能贯彻执行。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第40页。

② 同上，第38页。

“五大”之后，武汉地区的形势日益严重，一方面是外部敌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另一方面是内部反动势力活动猖獗。从5月开始，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动摇，叛变事件不断发生，武汉政府公开向右转。“五大”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有两条路线，一条鲍罗廷的“战略退却”路线，他认为“为应付这种恶劣的环境，只有暂时采取战略上退却的办法”，^①一条是罗易的战略进攻路线。陈独秀动摇于两者之间，基本倾向于鲍罗廷。他认为，掌握武汉党政大权的汪精卫是左右时局的关键人物，是国民党左派，拉住汪精卫是当时党中央最主要的工作。为了缓和党同汪精卫的关系，不惜丧失革命原则，牺牲工农利益，一味妥协退让。5月17日，武汉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叛变，率部进攻武汉，这次叛乱事件虽迅速平息，但是党中央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为夏斗寅叛变告民众书》却承认由于“农民的幼稚行为，特别在湖南，使军队里边发生不安”。并说，“农民的幼稚行为，决非共产党的行动。”^②把军队叛变归罪于农民的过火行为，接着5月20日，驻长沙的许克祥叛变（又称马日事变），这是武汉国民党公开叛变的信号。陈独秀仍然认为由于贫农的幼稚行为，引起小地主尤其是军人的剧烈反对，^③他派代表参加国民党中央的查办代表团赴湖南，一面查办许克祥，一面查办农运的“过火”。湖南省委彭公达、郭亮、柳直荀动员长沙附近8县农军向长沙进军。但陈独秀、鲍罗廷等认为，农军进攻长沙会引起整个政局的纠纷，造成和武汉国民党政府破裂，下令取消进攻长沙的计划，于是许克祥乘机反扑屠杀农军和革命群众，20多天内，1万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

陈独秀处理马日事变的投降主义方针，更助长了武汉国民党

① 《鲍罗廷在武汉国民党中央的报告》，1927年4月25日。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第100页。

③ 《对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1927年5月25日。

的反动气焰。汪精卫以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名义发出各种宣言和训令，攻击共产党，镇压工农运动。6月6日，朱培德在江西强制解送共产党人出境。6月中旬，经过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冯玉祥和蒋介石达成反共反苏协议，并决定实行“宁汉合作”，共同反共。6月29日，驻武汉的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发布反共训令，拘捕杀害共产党员。在这危急的形势下，党中央的领导更加混乱、动摇。陈独秀拒绝毛泽东、蔡和森关于加强土地革命和军事工作，作好应变准备的建议。6月30日，陈独秀在鲍罗廷和罗易的支持下，在党中央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国共合作11条政纲，规定国民党是国民革命之当然领导者，共产党人以请假名义退出政府，工农群众团体受国民党领导，工农武装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等。这个所谓11条政纲，向武汉国民党举起了全面投降的白旗，是陈独秀投降主义发展的顶峰。这个会后不久，共产国际指令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成立由张国焘、周恩来等五人组成的临时政治局常委会，陈独秀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但这时大革命失败的局面已成定局，五人政治局常委会虽作了一些努力，已不能挽回大局。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陈独秀在大革命末期所犯的投降主义错误概括起来是：

(1) 在统一战线中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对资产阶级无原则的妥协退让，以让步求团结，结果丧失了团结。

(2) 不重视农民土地革命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只是在资产阶级允许的限度内开展农民运动，实际上把农民视作资产阶级的同盟军。结果抛弃了农民这个伟大的革命同盟军，使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进攻面前陷于孤立。

(3) 放弃政权和军队，以在野党自居，结果在资产阶级叛变革命时，使党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这三条错误贯穿一个指导思想就是“二次革命论”。

三、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原因 及其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为什么会发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这当然有陈独秀自身的原因，但是不能过分强调个人主观因素。毛泽东说，研究党史“就是弄清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时间和一定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进程去研究。”^①陈独秀的错误同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党的状况及共产国际的指导都有密切关系。

（一）中国革命的复杂性、艰巨性和党在政治 思想上的幼稚。

中国共产党刚成立不久就登上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大国，是帝国主义在东方矛盾的焦点，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极其复杂。中国革命遇到的问题在国际共运史上没有前人经验可以借鉴，中国共产党如何认识中国革命的对象、性质、动力、前途等一系列问题，不能不经过一个艰苦的摸索过程。第一次大革命又是在敌强我弱和国共统一战线的情况下进行的。在革命的急剧发展时期，一切阶级及其代表人物都公开登台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呈现极其复杂的情况，统一战线中阶级力量的组合又是随着革命的发展而变化。革命营垒与反革命营垒不断地分化、改组；国民党与反革命军阀、官僚、政客互相渗透，盘根错节；各个政治派别激烈地纷争角逐。各阶级的代表人物不断变换着他们的脸谱，昨日之左派变为今日之右派，今日之革命军人变为明日之新军阀。处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纷纭复杂的阶级关系和千变万化的

^① 毛泽东，《如何研究党史》（《党史研究》，1980年，第1期）。

政治风云面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是难以避免的。

一方面，中国革命面临着极其复杂的情况；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缺乏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而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右派却拥有强大的力量和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这就是陈独秀犯错误的历史背景。在这样背景下，即使别人处于陈独秀的地位，也难免不犯错误，只会在犯错误的性质、程度和改正快慢上有所不同。列宁领导的1917年2月革命也是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被资产阶级打败。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说：“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中国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列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因此党的领导机关中占统治地位的成分，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在这一阶段的紧要关头中，没能领导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而使革命遭到失败。”^①

（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有其自身的思想根源。

陈独秀在从激进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中原来的旧意识、旧的世界观没有彻底转变。他从1920年下半年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同时，杂有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五四运动以后，他逐渐放弃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拥护十月革命的道路，主张以社会主义改造中国。但是他并未系统地、完整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如他1922年8月在《陈独秀文存》自序中所说，五四以来的“几十篇文章……没有什么有系统的论证，不过直述我的种种直觉罢了”，^②当然也就不能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当革命的实践证明在中国以实现社会主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73页。

^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200页。

义为直接目标走不通时，便又回到欧美18—19世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旧观念。中国革命的历史车轮已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他仍然以旧民主主义观点观察中国革命性质、前途、动力等问题，由此产生“二次革命论”的机会主义理论。

（三）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上的错误。

从中国共产党创立至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战略指导方针，正确方面是主要的，对于推动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和工农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也有许多原则性错误。陈独秀的许多右倾错误同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代表有直接关系。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有其自身的主观上的原因，也有来自共产国际方面的原因，二者的关系如何？哪一个是主要的呢？

历史研究应当以真实为基础，这个问题应当由事实作出回答。

自从党的“二大”通过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后，“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①共产国际成了中共中央的上级，它对中共具有政治指挥权，组织人事权，甚至有必要时改组中共中央政治局之权。中国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政治理论上不成熟，而列宁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和第三国际在战胜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国际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之后，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无产阶级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这又增加了中共对共产国际的依赖性，共产国际执委会实际成了中共中央的“遥控家长”。陈独秀基本上是追随共产国际路线的。当陈独秀的意见与共产国际的指示有矛盾时，大多数的情况下，总是服从共产国际。1922年初，马林提出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实现国共统一战线，起初陈独秀坚决反对，当马林的意见作为共产国际决议下达时，他立即服从，并带头第一批以个人资格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39页。

加入国民党。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三大”前后发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篇文章，提出夸大资产阶级力量、低估无产阶级力量的右倾观点，这固然同他在“二七”惨案后的悲观情绪有关，同时也由于他接受了共产国际指导国共合作中右倾的思想。1922年12月，拉狄克在共产国际“四大”作报告，贬低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把无产阶级降到资产阶级追随者的地位。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的决议，说：“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①陈独秀参加了共产国际“四大”，听取了拉狄克的报告，带回了决议，接受了其中右倾思想。中山舰事件发生之时，联共（布）中央委员、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率领苏俄视察团在广州。他认为事变是苏联顾问和中共在军事工作中太冒进引起的，从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出发，应当退让，并同意蒋介石的要求，撤换军事顾问季山嘉、罗加觉夫等人。布勃诺夫到上海，向陈独秀说明中共应对蒋介石采取让步的方针。^②陈独秀赞同布勃诺夫的意见，不同意广东区委提出的坚决反击的方针。4月上旬，当陈独秀进一步了解到事态的严重性后，致电莫斯科，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变党内合作为党外合作。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必须执行把共产党员保留在国民党的路线，并派维津斯基到中国，纠正要求退出国民党的错误。”^③陈独秀便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整理党务案”，是蒋介石提出，同鲍罗廷几次协商而达成协议的。陈独秀执行共产国际的意见，指示参加会议的中共党团，赞成通过此案。直到1926年12月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93页。

② 《向导》，第148期，1929年4月8日。

③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1页。

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委会还肯定了“整理党务案”，说“并不企图以共产党分子代替左派之领导工作。”^①四一二前夕，陈独秀与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掩饰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说蒋介石“决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这也不是陈独秀个人的意见。3月，共产国际总书记布哈林在莫斯科联邦共产党员积极分子大会上报告说，只要蒋介石“暂时还未反动，尚未变节，无产阶级政党是可以帮助他的。”^②3月16日，苏联《真理报》社论说蒋介石“……发誓效忠革命原则，忠于孙中山主义和社会主义，服从群众党——国民党的领导。”^③4月5日，即汪陈联合宣言发表的同一天，斯大林在莫斯科干部会议上也说，蒋介石“遵守纪律”，这说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同陈独秀一样在四一二之前对蒋介石的认识和方针都是错误的。

陈独秀是一个性格倔强有思想有主见的人，他有时同共产国际代表意见分歧，并敢于批评他们，但最后总是服从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的裁决。1926年初，陈独秀和鲍罗廷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上有分歧。鲍罗廷于1926年2月中旬，在一个报告中阐明什么是国民党左派时说，只有赞成解决土地问题的人才是真正的左派，现在国民党中央无左派。陈独秀在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汉口特别会议上针对鲍的观点批评说：“这是一种新奇的逻辑”，“等于专候下礼拜吃鱼肉，把今天吃豆腐、白菜维持生活看作不必要。”他认为凡赞成减租减息的人就可算是国民党左派。^④这次会议在不了解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精神的情况下，通过了陈独秀提出的“反对党内‘左’倾，防止党外右倾”，反对“耕地农有”，限制工农运动等右倾机会主义政策。1927年

① 《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中国问题决议决策》，1926年12月16日。

② 莫斯科中山大学编，《国际评论》，1927年6月5日。

③ 《真理报》社论：《中国革命与国民党》，1927年3月16日。

④ 杨岩云：《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56页。

1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传到中国。这个决议案和斯大林在会上所作的《论中国革命底前途》的演说指出，无产阶级应当争取革命领导权，力争革命发展的非资本主义前途；特别强调土地问题开始紧急起来，成为时局的中心问题。这些精神同刚刚闭幕的12月会议的报告和决议是相冲突的。于是陈独秀召开中央会议，讨论共产国际的决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在这个文件中，检讨了陈独秀在12月会议上的报告中的错误观点，批评了二次革命论和在农民土地问题上的错误。文件中说：“在今日以前我们有一个根本错误，乃死守着数千年以来形式逻辑头脑的错误……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以为今天只能作国民革命”，“我们必须绑着自己的手脚”，“一切都等待到第二次无产阶级革命再说，这便是我们过去方针和战略上的根本错误”。还说，遵照“此次国际中国问题提案的根本方针与战略”，中共应“采用急进的农民政纲”。今后“一切政策及工作计划，即须依据此提案的方针与战略进行”。^①

这个文件证明陈独秀力图在政治上同共产国际保持一致。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战略方针和具体指示之间又常常自相矛盾。1926年10月，即在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之前，发往上海的一个电报说：“在占领上海以前暂不应加强土地运动。”^②《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则强调在中国推进土地革命，但是又没有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土地纲领。它要求中共在继续国共合作、不掌握革命武装的条件下开展工农运动，解决土地问题，所以当工农运动引起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反对而危及国共合作关系时，陈独秀便采取限制工农运动的政策。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第12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7页。

诚然，陈独秀也有不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情况，这也要作具体分析。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会议期间向中共发出了著名的五月指示。陈独秀于6月15日致共产国际电称：“你们的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要设法建立民主专政，但短期内不可能实现。用改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将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① 陈独秀所陈述这些理由是符合实际的。五月指示，6月1日传到中共中央，贯彻时间只有半个多月，单就组建8个到10个师的军队这一点来说，也是不可能办到的。同时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会的决议又规定了一个前提，执行五月指示而又不破裂同武汉国民党的关系，这也是不可能的。陈独秀对待五月指示的错误，在于他没有根据五月指示的精神，在武装工农、土地革命、镇压反革命活动等问题上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积极措施。而继续把拉住汪精卫作为党的工作中心，把纠正工农运动“过火行为”作为“迫切任务”。^② 这一点陈独秀同共产国际两个代表鲍罗廷、罗易是完全一致的。罗易为取信于汪精卫，竟把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电文送交汪，汪精卫便以此作为反共的借口。

以上事实说明，共产国际是中国革命的最高决策者，陈独秀基本上是一个执行者，尽管陈独秀也有自己的思想主见，不断提出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但是从根本上要受到共产国际的制约。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可以纠正他的错误，共产国际的右倾错误更因与他自身的右倾思想相吻合而积极贯彻执行，所以共产国际应当对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负主要责任。陈独秀个人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相对共产国际来说，是第二位的。

^① 《罗易赴华使命》，第324页。

^② 1927年6月15日陈独秀致共产国际电。

第四章

托陈取消派

(1928—1937)

大革命的失败是陈独秀一生中又一个转折点，如果说五四运动是他由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前进的转折点，那么大革命失败则成为他走下坡路的转折点。在政治思想上他从马克思主义者转向叛离马克思主义，但又不同于张国焘那样卖身投靠的叛徒；在组织上从共产党的领袖转向托洛茨基反对派，但在反蒋、抗日等问题上又不完全同于托派。陈独秀是怎样走向反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又是怎样与托洛茨基主义相结合而成为托派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开展反对托陈取消派斗争的？如何评价他1932年被捕入狱之事等，对这些问题应当进行具体的分析，从中引出教训以为殷鉴。

一、从右倾机会主义到取消主义

1927年的一场伟大革命风暴在国民党的反革命屠刀之下，化作血雨腥风，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人头落地。面对这严酷的现实，作为大革命时期党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是不能无动于衷的。他说：“自1927年中国革命遭受了悲惨的可耻的失败后，我因亲身负过重要责任，一时感觉无以自处，故经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反省期间。”^①1927年7月初，陈独秀已经离

^① 独秀，《答共产国际书》，1930年2月17日。

开中央领导岗位，先是隐蔽在汉口，不久移居上海党的秘密机关，深居简出，不担任党的任何工作，拒绝国际要他赴莫斯科学习的指示。党的一切会议，包括“八七”会议这样重要的会议，均不能参加。他是在脱离党的政治生活，脱离党批评监督的寂寞生活中苦思，不可能获得积极的成效。陈独秀曾自谦是一个“浅薄的马克思主义者”，^①的确由于他在理论上的浅薄和幼稚，缺乏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自我解剖精神，又固执自负，听不进一切反对者的意见，特别是由于共产国际推卸大革命失败的责任而对共产国际抵触呕气，把一切错误的来源归之于莫斯科，而没有着重从中国党的历史和现状中，从自己的政治领导和世界观中进行深刻检讨，当然就不能真正认识错误，不能从挫折和失败中吸取教训，迷途知返，结果陷于更深的机会主义——取消主义之中。

陈独秀走向取消主义，大体上经过以下三步：

（一）1927年“八七”会议前后 陈独秀在反对国民党反革命屠杀政策方面，在公开的言论中尚能同党保持一致，例如他在党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的“寸铁”专栏里发表了许多杂文，揭露国民党清党反共制造白色恐怖，谴责“国民党变成纯粹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党”，“国民党和北洋军阀没有两样”，^②并且还发出了向国民党复仇的呼声。^③但这时他在国内政治形势的估量方面已同中央发生分歧，对“八七”会议确定的以武装起义来反抗国民党屠杀，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发生抵触。1927年11月至12月，陈独秀给中央写过几封信，信中虽不无可取之处（如不赞成上海暴动及关于广州暴动策略的建议），但总的来讲对形势的估计比较悲观，调子比较低沉，

^①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7年12月10日。

^② 《布尔什维克》，第1期。

^③ 同上，第11期。

他说，“国民党虽不能长久巩固统治，而眼前尚不致崩溃，我们以群众力量扫荡他们的时机尚未成熟”，“因此我以为此时的工农运动应偏重经济斗争……以发展我们的实力”，“暴动为不得已而用的方法……此时尤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①他还不同意发动以土地革命为内容的农民武装暴动，而“提议用‘四不’口号（不缴税、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去号召农民群众，他对“工农政府”、“苏维埃政府”这些口号殊不以为然。^② 这几点表明陈独秀的右倾取消主义观点已开始暴露。

（二）1928年6月党的“六大”前后 陈独秀拒绝去苏联出席大会，对六大大会的根本路线十分不满，认为中国革命之现阶段是反革命时期，“六大”所规定的民主革命十大政纲是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混合物。这时陈独秀的取消主义思想与党的“六大”路线发生了根本的对立。

（三）陈独秀于1929年8月5日发表的关于中东路事件的第二封信标志着他的取消主义思想的正式形成 陈独秀关于中东路事件的第一封信（1929年2月28日）和第三封信（8月11日）分析了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批评了党中央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变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革命战争”的口号。他认为这一口号不足以戳穿国民党政府在收回中东路宣传上的“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不足以争取教育受国民党欺骗宣传的广大小资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因此他建议中央以“反对国民党误国误民政策”来补充和代替“拥护苏联的”的口号。历史证明，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是正确的。陈独秀关于中东路事件的第二封信（即8月5日的信）完全抛开了中东路问题不谈，而在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责任，当前的革命性质、革命形势和斗争策略等一系列问题上，全面攻击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政策

① 陈独秀1927年11月12日致中央常委的信。

② 陈独秀1927年12月13日致中央常委的信。

路线，提出了一整套的取消主义的形势分析和政策主张。此后陈独秀进一步与托洛茨基主义相结合，形成一套系统的托陈取消派的政治纲领。

陈独秀从右倾机会主义发展到取消主义，有一条内在的思想线索，就是他的“二次革命论”。“二次革命论”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是他根深蒂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观念的表现。大革命失败后，他仍然沿着“二次革命论”的思路走上取消主义道路。

早在北伐战争前后，陈独秀按照他的“二次革命论”思想预言，中国革命在打倒以孙传芳、张作霖为代表的封建势力之后，中国历史必然进入资本主义时代。1927年吴佩孚、孙传芳虽已打垮，张作霖还未打倒，国民党就叛变革命，在人民的血泊之中建立了南京反革命政权。1927年至1928年，经过一场新老军阀之间的混战，蒋记南京国民党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这时陈独秀仍然认为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建立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背叛革命的整个国民党政权即资产阶级为中心为领导的政权”。^①陈独秀取消主义的根本观点就是对国民党政权阶级性的错误论断，而这一错误论断又是他顽固坚持“二次革命论”的必然结果。政权性质是社会性质的标志，既然“资产阶级经过两次革命已经掌握了政权”，^②中国的社会便不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在政治上，北洋军阀的垮台是封建势力的消亡，封建势力丧失了中央政权，失去了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在经济上，中国的封建残余经过了商业资本主义的长期侵蚀，已变成残余之残余，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已经占了优势。这是陈独秀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性质的见解。由此出发，便产生出一系列取消主义的谬论。在革命性质问题上，不承认中国革命现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认为“资

^① 陈独秀1929年8月5日致中央的信。

^② 陈独秀等：《我们的政治意见书》（1929年12月15日）。

产阶级政权相当稳定和经济相当恢复”，^①中国无产阶级只有等待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革命形势和任务问题上，认为当前是“反革命势力全盛时代”^②，“中国革命的高潮……不会快要到来”^③。因此在目前行动上应当采用最民主主义的口号如“为召集国民会议奋斗”，“武装暴动”和为“建设苏维埃”而奋斗的口号不能作为当前的行动口号。^④大革命失败后，尽管陈独秀在主观上也对国民党怀有国仇家恨，可是他的机会主义理论却使他得出取消革命的结论。

二、从党内反对派到托洛茨基派

陈独秀从右倾机会主义走向取消主义的过程，也是他反对“六大”后的中共中央，反对共产国际，并与托派相结合的过程。

党的“八七”会议后，陈独秀虽然对“八七”会议的方针和国际对自己的组织处理十分不满，但是他说：“我当时为党的组织纪律的拘囚，不得已取了消极态度。”^⑤

“六大”前后，陈独秀同党的分歧还是以党内斗争的形式反映出来。同时逐渐在党内形成了一股反对共产国际、反对新中央、拥护陈独秀的势力，被称作陈独秀派。这批人都是大革命中执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六大”后丧失职务的原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干部。1928年，陈独秀派有五六十个人，开始了组织活动，这时的陈独秀派，还是一个党内反对派。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后，陈独秀派与共产国际、党中央的矛盾日益加深，发展到

① 陈独秀等：《我们的政治意见书》（1929年12月15日）。

②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

③ 陈独秀1929年8月5日致中央的信。

④ 同上。

⑤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

公开对抗。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陈独秀开始接受托派理论。此后，陈独秀派便逐步与托派相结合，形成托陈取消派。

陈独秀接受托派理论的途径是：（1）通过彭述之。据《彭述之简史》讲，1929年春，彭述之从莫斯科回国的留学生中得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两个文件：《中国革命的回顾与前瞻》和《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革命问题》。彭述之将这些文稿转交给陈独秀，陈看后，“亦完全同意托氏的基本观点。”^①（2）通过刘仁静。1929年8至10月，刘仁静从苏联回国途中，专程去土耳其会晤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自把他为中国反对派写的政治纲领《中国政治状况和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交给刘仁静带回国。刘仁静到上海后，将此文件转交陈独秀，并向陈介绍了会见托洛茨基的经过。陈独秀闻后认为，在中国问题上，托洛茨基比斯大林正确。^②（3）通过托派留学生的直接影响。陈独秀的外甥吴继严，1929年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把苏共“十五大”前后路线斗争的情况，托洛茨基的立场、观点、遭遇等向陈独秀详细陈述。陈听后十分兴奋，极感兴趣，促使他决心与托洛茨基主义合流。^③

1929年5月以前，陈独秀并不了解托洛茨基的思想理论和政治观点，可是一旦接触托派理论之后，便一拍即合，立即“根本承认托洛茨基同志的主张是合乎马列主义的”。^④

一贯坚持右倾机会主义的陈独秀，为什么能够同以极左为特征的托洛茨基主义相结合呢？有人说，这是由于陈独秀企图打着托派旗号招兵买马以扩大实力，并获取国际托派组织的经费。我认为主要的原因还在政治思想方面。

① 《安徽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第32页。

② 亮平等：《托洛茨基派的真面目》。

③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④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

(一)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与陈独秀的取消主义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前者为后者提供了理论武装。

托洛茨基的主要理论是“不断革命论”，这一理论是托洛茨基于1905年提出，并在1917年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后坚持不渝。“不断革命论”的基本内容之一是以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来否认当时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主张超越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其核心是否定农民的革命作用。托洛茨基在1922年为他的《一九〇五年》一书所写的序言说，“不断革命论”，“这个奇妙的名称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直接摆在俄国面前的应是资产阶级的目的，可是它不能停留在这些目的上面，除非使无产阶级执掌政权，革命就不能解决它当前的资产阶级任务，无产阶级执掌政权又不能以革命的资产阶级范围来限制自己。”

陈独秀取消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认为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阶段的完结。

可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陈独秀又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政权“已经不会排斥帝国主义了，不会肃清封建残余，不会解放农民而完成民族革命了。”^① 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结束了，而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却未完成，岂不自相矛盾？陈独秀正是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中获取了解决这个矛盾的理论，这就是说，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已经转向反动，“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任务（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及土地革命），必须无产阶级领导城市及乡村的贫农取得政权，才能彻底完成”，在将来，“下次革命高潮初起时……动员群众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因此“民主专政现在已成了一种反动的口号，中共“六大”规定的革命政纲是

^① 陈独秀1929年8月5日致中央的信。

“破产的路线”。这样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便在否定党的民主革命政纲，否定以农村为中心的武装起义，主张合法的国民会议运动这些基本点上达到一致。陈独秀的取消主义思想便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合二为一，成为在“左”的和最革命的词藻装饰下的取消主义。

(二)托、陈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共同见解是他们相结合的政治基础。

1927年中国革命失败之后，共产国际和陈独秀之间在如何认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教训和责任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共产国际认为，中国革命失败是由于“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领导”和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等人的右倾错误，而国际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同中国党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没有关系的。斯大林于1927年8月1日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的报告中说：“反对派无论什么时候也没有举出而且也举不出共产国际有那一个指示，那一个决议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产生孟什维克主义倾向，因为世界上就没有这样的指示。”^①陈独秀的看法则完全相反，他认为大革命的失败是“国际对中国革命根本政策之错误”，这个错误主要表现在“对国民党阶级性的错误观察和加入国民党”。^②陈独秀认为，共产党员加入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进行这场革命，势必丧失党的独立性，“屈服在国民党的组织之内”，当蒋介石制造三·二〇事件乃至四一二政变之后，他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又遭国际拒绝，结果“只有步步投降资产阶级”，导致革命失败，所以“国际是应当负

^①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9页。

^②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江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1929年11月15日。

责的。”^①陈独秀这些与共产国际相对立的观点恰恰与托洛茨基反对派在联共党内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内发表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相吻合，而且比陈独秀更系统更有理论。1925年至1927年间，托洛茨基反对派在许多提纲、论文和演说中一直批评斯大林、布哈林在中国问题上的政策路线。他主张用列宁在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年二月革命的路线政策来指导中国革命，反对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的代表国民党建立联盟，尤其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他说：“无论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无产阶级的党不能加入别阶级的政党与别的阶级混合组织，无产阶级政党之绝对独立是共产主义政策之基本的和先决条件。”^②他指责蒋介石进行四一二政变是斯大林、布哈林的机会主义妥协路线所造成。^③武汉时期，他坚决反对国际“必须用一切办法帮助武汉国民党”的政策，他说“我们反对以中国将军为基础的那个政策，我们反对把中国工人阶级隶属于国民党。”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完全取消在组织上政治上对国民党的依赖。”^④要求立即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显然，托洛茨基的这些主张，有力地支持了陈独秀的立场和观点，当陈独秀于1929年5月了解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理论主张时，真是相见恨晚，如获至宝。他在1930年2月复国际的信说：“因为你们的蒙蔽与封锁，直到半年前我们才得到托洛茨基同志关于中国问题及一些苏联问题的文件，从此以后我才彻底的系统的了解在中国问题中所犯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之真正根源所在。当你们将革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或‘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时，而托洛茨基同志却早已在你们背后指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也并且预言了这种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必然

①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

② 陈东晓编：《陈独秀评论》，北平东亚书局印行，民国二十三年初版。

③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纲》。

④ 《托洛茨基言论》（下），第804页。

达到的结果。”^① 这就是陈独秀接受托派理论的政治基础。

（三）托陈反对派在受到共产国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之后，相互同情，共同进行反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斗争。

“八七”会议撤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六大”撤销了他的中央委员，中东路事件后，开除了他的党籍。陈独秀认为这都是由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不肯承担大革命的失败责任，不能容纳党内的反对意见，使自己成为替罪的羔羊。因此心中十分不满，憋了一肚子气。满腹怨气的陈独秀，看到托洛茨基在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会议上的许多发言、报告和提纲中斥责“斯大林官僚集团”“独裁”、“专制”、“对党使用暴力”、“窒息党的思想”，是一位只会作辣菜的厨师时^②，自然感到托洛茨基的话代表了自己的心声，替自己出了一口闷气。

托洛茨基曾经在国际会议上为斯大林把陈作为中国革命失败的替罪羊而鸣不平，以实行列宁遗嘱为名，呼吁要把“斯大林撤下来”。陈独秀也深为同情托洛茨基的遭遇，谴责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把托洛茨基驱逐到苏联以外，交到阶级敌人手中。^③ 要求“召回托洛茨基同志反对派，恢复其党籍，并恢复托洛茨基同志的领导工作。”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机会主义者与反对派在“惺惺惜惺惺”的情绪下便结合起来了。”^④

陈独秀派与托洛茨基主义在理论、思想和政治上的结合必然导致托派组织的建立。1929年9月，以陈独秀、彭述之、尹宽三人为首组成“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10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第一

① 独秀：《答共产国际书》，1930年2月17日。

② 《托洛茨基言论》（下），第820页。

③ 独秀：《答共产国际书》，1930年2月17日。

④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47页。

次指责陈独秀为“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指责他们在党内搞小组织行动，但仍然称陈独秀为同志。由于陈独秀拒绝党的批评，坚持搞派别活动。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开除陈独秀等人的党籍。12月15日，陈独秀联络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80人在上海昆明路开会，成立了无产者社。无产者社就其政治性质来说 已经是托派组织，因为它公开打起了托洛茨基的旗号，他们发表的纲领性文件《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是直接依据托洛茨基为中国反对派写的政治纲领《中国政治状况和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而写成的。无产者社的成员最多时达100多人，在上海、北京、广州都有几个支部。1930年3月出版《无产者》月刊，宣传托洛茨基的理论和托陈取消派关于中国革命的政策主张。“无产者社”虽属托派组织，但在建立之初尚未同托洛茨基的国际组织直接挂钩，直到四个托派组织统一之后，才成为国际反对组织的一部分。在“无产者社”先后成立的托派组织是：“我们的话社”、“十月社”、“战斗社”。从1930年6月到1931年3月，托洛茨基多次来信指示四派进行统一。由于四个托派组织都要以我为核心，互不服气，统一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针对这种情况，托洛茨基来信指出，“象陈独秀那样一个杰出的革命家”，应当成为四派统一的主干。托洛茨基还在信中教训其他托派说：“难道你们当中有好多共产党员能象陈独秀那样老练吗？……我们反对派青年当中有许多人能够而且应该向独秀同志学习学习啊！”^①由此可见，不但陈独秀需要托洛茨基主义作为反对共产国际的武器，托洛茨基也需要借重陈独秀的“名望”和影响来完成托派统一事业。经过几番吵吵嚷嚷的协商会议，中国的四个托派组织终于在托洛茨基的遥控指挥之下，经陈独秀居中斡旋，于1931年5月1日在上海提篮桥舟山路的一个住所，召开了统一大会。会议通过了宣言和托派纲领，选举出以

^① 《陈独秀评论》，第209页。

陈独秀为书记的托派中央领导机关，决定出版机关刊物《火花》。统一后的托派沿用原陈独秀派的名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从1929年12月建立无产者社到1931年5月四派统一，陈独秀已经从党内反对派变为名符其实的托派，并且在中国托派事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成为中国托派的首领。陈独秀这个托派首领还踌躇满志地企图重现中共“一大”后迅速发展的局面，他主持的托派统一大会后第一次中央全会发给托洛茨基的电报说：“他的中国同志正完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开端，布尔塞维克——列宁派的旗帜不久将飘扬在全中国。”^①但是事与愿违，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托派组织不久便因内部争权夺利而四分五裂，投向军统特务者有之，向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告密者亦有之。1931年5月23日，托派中央的五个常委被捕，陈独秀又勉强组织了一个“临时常委会”，维持了一年多亦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此后中国托派组织在苟延残喘中勉乎为继。

三、铁窗五年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彭述之等托派领导人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在蒋介石查清了陈独秀确与红军无关系之后，将其移交江苏省高等法院审理。1933年4月14日至20日，江宁地方法院开庭审判。4月26日，宣判陈独秀13年徒刑。一年后减为8年徒刑，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第一监狱，直到1937年8月被释放出狱，整整铁窗五年。

陈独秀在狱中的政治表现和思想言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坚持托派立场和托派组织活动

陈独秀入狱后，并未断绝同上海托派组织联系，据濮清泉

^①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第164页。

说：“陈独秀虽在狱中，但与上海保持着联系，上海托派文件通过刘静贞（郑超麟之妻）在探监时送给陈独秀，而陈独秀对外面托派的意见和文章也通过她带回上海。”^①由于陈独秀的许多故旧友人和学生系国民党上层人物，他在狱中受到优待，比较自由。他便利用这些条件与外界托派沟通消息。陈独秀被捕后，上海托派以刘伯庄为首组建临时常委，不久这些人去大学教书不干了。陈其昌、赵济等人又成立了一个临委。陈其昌为首的托派临委同陈独秀的关系更加密切。1933年9月，陈独秀从狱中为这个临委起草和发出了《目前形势与反对派任务》的文件，指示他们行动方针和任务。1934年初，托洛茨基了解到中国托派行将灭亡，派了一个国际代表格拉斯（南非人，化名李福仁）来中国，并拟前往狱中探视陈独秀，未成，但两人有文件来往。^②不久，刘仁静控制了上海临委，与陈其昌发生争斗，刘仁静以“机会主义”、“误国政策”等罪名攻击陈独秀，并决定将陈独秀、陈其昌二人开除党籍，为此陈其昌到南京监狱找陈独秀商量对策。1935年1月15日，陈其昌带回陈独秀给赵济、尹宽、史朝生等人一封指示信。^③1935年，刘仁静被捕后，陈独秀又从狱中发出信来，要王文元、陈其昌、赵济等人成立三人委员会，尽力维持托派残局。许多资料证明，陈独秀虽身陷囹圄，仍关心着托派事业，坚持托派的政治立场，并与托派组织不断地发生联系。

（二）表现了爱国、抗日、反蒋的政治思想

狱中的陈独秀仍坚持托派的基本立场，但是中国托派的情况很复杂。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发生后，托派内部由于对抗日态度不同而发生分化。陈独秀反对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政

① 濮清泉：《中国托派的产生和灭亡》。

②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③ 1935年2月8日《校内生活》，《雪衣最近来信》。

策,主张举起反日反国民党的旗帜;而另一部分托派则宣传“工人无祖国”,反对抗日;还有北方的一些托派成为了亲日派。1938年,周恩来对罗汉说过,“所谓中国的托派,事实上很复杂,可以大致将其分为四派,一派是赞成抗日的,你和陈独秀等属之一。”^①

陈独秀从被捕、受审到五年铁窗生活,始终没有向国民党屈膝献媚,出卖人格,相反地却表现了一付士可杀而不可辱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铮铮“傲骨”,表现了一个爱国者的品质和蔑视国民党权贵,放荡不羁的文人气质。

陈独秀被捕之初,10月22日出版的《社会新闻》发表《陈独秀死活预测》一文,说陈独秀“是共产党取消派”,“是反对共产党现行暴动政策者”,“只要他继续反共,似可以不至于死”,甚至可“化险为夷亦未可知也”。这段话暴露了蒋介石企图利用陈独秀作为反共政治工具的险恶用心,但是陈独秀在国民党的威逼利诱面前,依然我行我素,使国民党费尽心机而未能如愿。10月20日,陈独秀被押解南京军政部司法处,受到军政部长何应钦传询,“约谈一小时之久”。10月26日《中央日报》报导,陈对询问各点“均无深切表示”。据濮清泉和包惠僧的回忆,何应钦曾邀陈独秀题字,陈挥笔写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十三个大字^②。如果与中央日报报导“均无深切表示”联系起来看,这题字可能就是陈独秀对何应钦威逼利诱的回答。曾经主持陈独秀案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在《我和共产党斗争底回忆》一文中,叙述了他向陈独秀劝降的情形。他说,开始我很自信,“以为可以使他放弃过去的政治主张,……可是接谈之后,我的信心动摇了,我发现他的态度相当倔强”,“他虽已被中共开除党籍,但仍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命。……我自己劝说无效,又邀请1919年前后在北大和他同事的许多老友向他进

① 汉口《正报》,1938年4月24日。

②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言，但他仍是这个态度。”徐恩曾同陈独秀接触中深深感到“他有中国读书人的传统风度，他有坚强的民族自尊心”。^①

1933年4月14—22日，江宁地方法院第二庭开庭公审陈独秀案。检察官以“危害民国罪”对陈独秀、彭述之等提出公诉。陈独秀从容答辩说，“我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人民有义务反抗违背民主主义和民权的国民政府。他斥责蒋介石“对日本侵略东三省采取不抵抗主义”，“‘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竟成为国民党的金科玉律，儿皇帝将重见于今日，亦不哀乎？”他反驳起诉书说：“如以反政府即危害国家，孙中山、黄兴反对清政府和袁世凯政府而被后者斥为国贼岂笃论乎！”^②陈独秀的自撰辩诉状洋洋数万言，有许多痛斥国民党祸国殃民的慷慨陈词，而且情文并茂，一时曾轰动全国。国民党以不许为共产党张目为名而禁止各报登载，只有天津《益世报》抢先登出。

陈独秀在法庭上的答辩中也宣传了托派主张。他回答“对于红军主张如何？”时说：“照现在状况，尚用不着红军，共产党理论，先有农工基础，待有政权，才需要红军”。当回答国民会议主张时说：“共产党有权召集则自行召集之；如南京国民政府召集，共产党亦往参加”。^③这些托派主张，也被国民党用以反共宣传。陈独秀的法庭辩诉当然称不上是革命者的豪言壮语，但表现了强烈的反蒋抗日和爱国主义精神，则应予肯定。

陈独秀在狱中写下数十首诗篇，题为“金粉泪”（包括56首诗）^④，从思想内容来看，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几类：

① 沈云龙：《有关陈独秀生平的补充资料》（《传记文学》，第31卷，第2期，115页）。

② 陈独秀：《自撰辩诉状》。

③ 《国闻周报》，第10卷，第17期，《陈独秀开审记》。

④ 《金粉泪》56首，手稿现存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4辑全文发表）。

(1) 抒发抗日爱国情怀。

放弃燕云战马豪，胡儿醉梦倚天骄。

此身犹未成衰骨，梦里寒霜夜渡辽。

这里显然是以五代时石敬瑭投降契丹，割让燕云16州（今北京、大同地区）故事，喻蒋介石九一八事变后以“绝对不抵抗”放弃东三省，故胡儿即日本侵略军如“天之骄子”，恃势骄横，侵占我东北大好河山，诗人虽身居囚室，只要此身未成衰骨，梦里亦想北上抗敌卫国。

长城以外非吾土，万里黄河惨澹流。

还有长江天堑在，贵人高枕永无忧。

日本侵略军侵占东三省后，1933年又侵入长城以内，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万里黄河为之惨澹，而国民党政府却梦想依赖长江天险，不作抗敌准备。

(2) 痛斥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投降，对内残民以逞的罪行。

健儿委弃在疆场，万姓流离半死伤。

未战先逃恬不耻，回銮盛典大铺张。

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大片国土沦丧，任士兵溃散弃尸疆场，百姓流离失所，而党国要人出巡、回归却如封建帝王回銮盛典一样大肆铺张，耗费大量民脂民膏。

开门闭户两争持，佞倭主人佯不知。

幸有雄兵过百万，威加百姓不迟疑。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欲独霸中国是谓闭户，英、美等国坚持门户开放以分沾瓜分中国之利。主政者国民党拥有雄兵过百万，只用以欺压百姓，在外国侵略者面前却如同患了软骨病。

(3) 讽刺国民党反共、复古、倒退。

五四五卅亡国祸，造反武昌更不该。

微笑捋须张大辫，石头城畔日徘徊。

诗中讥讽蒋介石诬“五四”“五卅”运动，背叛辛亥革命，

提倡复古，如“辫帅”张勋魂返南京，当捻须微笑矣。

清党倒党一手来，万般复古太平哉。

当年北伐诚多事，笑倒蓝衫吴秀才。

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乃清末秀才；北伐战争打垮吴佩孚之后，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又成为新军阀，其倡导复古尊孔亦步吴之后尘，故吴秀才当纵声大笑以至颠倒。

(4) 鞭笞国民党政府的腐败、黑暗。

十三万万债台高，破产惊呼路政糟。

太子叨光三百万，宗臣外府大荷包。

陈独秀自注：孙科掌铁道部时侵吞三百万元，汪兆铭任行政院长以铁道部为外府。

法外有法党中党，继美沙俄黑百人；

囚捕无须烦警吏，杀人如草不闻声。

讥讽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如同俄国沙皇时代的武装匪帮黑色百人团。

(5) 控诉国民党苛政。

兵车方过忍朝饥，租吏追呼鸟夜啼；

壮者逃亡老者泣，将军救国要飞机。

陈独秀自注：广东、湖南皆以飞机捐榨取民间巨款。

苛捐榨尽民间血，百业凋残袖手看。

商贾不知遗教美，但愁歇业忍饥寒。

遗教系指三民主义。国民党整天唱着三民主义高调，却不能掩饰百业凋残和人民饥寒交迫的吼声。

(6) 直泄仇蒋、反蒋之愤懑。

贪夫济济盈朝右，英俊凋残国脉衰。

孕妇婴儿甘并命，血腥吹满雨花台。

严刑重典事唐皇，炮烙凌迟亦大方。

暴虐秦皇绝千古，未闻博浪狙张良。

以暴君秦皇喻蒋介石，对其用严刑酷吏，屠杀革命者和进步人士表现了极大的愤慨。

狱中的陈独秀，已经叛离马克思主义，但仍不失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和民族气节的人。同张国焘那类出卖灵魂，丧失人格，认贼作父，摇尾乞怜的无耻叛徒应有所区别。

（三）文化学术研究

陈独秀作为政治犯受到狱中优待，一个人住在一所小院，近似软禁。他的囚室如同书房，书架上经、史、子、集俱全。他在狱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读书和文化研究中渡过，特别醉心于文字学，从《尔雅》到《说文解字》都专心研读，并具有自己的创见。他认为中国过去的小学家研究文字学都拘泥于许慎、段玉裁的说文解字，不能形成文字科学。他要言前人之所未言，用唯物史观探索一条科学的文字学道路。狱中的几年，他撰写了《实庵字说》、《老子考略》、《荀子韵表考释》、《干支是字母说》和《孔子与中国》等书稿，发表于《东方杂志》。据包惠僧回忆，他还写了一本《声韵学》，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外还写了《实庵自传》两章，后由东亚图书局出版。

四、中国共产党反对托陈派斗争的经验教训

托陈取消派在思想上背叛了马列主义，在组织上分裂党，反对共产国际，他们打着托洛茨基主义旗帜，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列宁主义路线，全盘否定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反对“八七”会议制定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实行工农武装暴动和土地革命总方针，反对“六大”制定的中国民主革命的正确路线，反对正在艰苦斗争中的中国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实际上就是取消革命。但是从陈独秀个人的思想演变来看，他坚持取消主义的政治纲领，这主要是由于他没有正确总结大革命

失败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形势、革命任务等一系列问题作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分析的结果。在他的政治行为方面，没有同国民党同流合污。即使在被捕入狱之后，也没有向敌人屈膝投降，因此不能把他划为反革命。还必须看到陈独秀在走上取消主义的这段时期中，也不是一切皆错，他在某些个别的局部的问题上提出过一些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意见。例如，他赞成广州暴动，并对暴动的策略问题提出了一些正确意见；他反对1930年上海暴动的冒险计划；在中东路事件问题上他对中央的批评是正确的，他反对共产国际的意见中也不全部是恶意攻击，其中也批评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一些错误指挥。

陈独秀派的政治斗争是左右开弓，两面出击，一方面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另一方面反对蒋介石国民党，仔细观察托陈派的言行，可以看出，他们进行的这两方面的斗争是有区别有轻重的。他们对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攻击言论中，也夹有嘲讽与谩骂（如诬蔑党领导的红军战争是“新式流寇”、“匪式骚扰”等），但主要还是以路线斗争的姿态出现的。声称要“坚决的、不可调和的、不中途妥协的和国际的及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者奋斗到底。”^①“我们所争的乃是整个路线之根本改变”，^②等等。他对蒋介石国民党，则视为资产阶级反动派。陈独秀在托派统一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说：“国民党对内高压，对外投降，军人独裁，用刺刀削去了人民的权利，饿殍载道，民不聊生。……国民党统治者则是醉生梦死过着酒绿灯红的生活，资产阶级各派都是反动派”，^③从陈独秀主笔的《布尔什维克》“寸铁”专栏到他在《无产者》、《火花》、《校内生活》等托派刊物中的大量言论，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揭露、鞭笞国民党的“刺刀政治”和祸国

①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

② 陈独秀等，《我们的政治意见书》，1929年12月15日。

③ 《文史资料》，第71辑，第39页。

殃民的反动政策，应当说他们把政治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国民党的。同时国民党也是把托陈派作为一个政敌而加以打击的。托派统一大会刚刚结束不久，便连续三次遭到国民党的大破获。国民党并没有因为陈独秀被共产党开除而宽恕他。国民党的检查官在法庭上起诉陈独秀时说：“查被告之被开除是被史大林派开除，并非完全脱离共产党”。起诉书认为，史托两派在反对国民党的策略和手段上虽有不同，“凡此种种都是内部问题。在具体观点上，他们都主张打倒国民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样的目的，都是共产党，都是危害民国……”。^①这说明国民党之所以大肆搜捕托陈派，是因为托陈派的言行危害了它的统治。那种认为“统治阶级以拘捕陈独秀的手段与陈氏共同协商进攻中国革命”^②的论调是不符合事实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一二八上海抗战爆发后，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和国民党的卖国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反蒋浪潮。在这一浪潮的推动和影响下，陈独秀发表宣言和文章，提出了抗日救国和反对国民党卖国政府的主张。他在《火花》第三期上发表的《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道》一文，发出了“排斥日货和对日作战”的呼吁。这时他不再攻击红军运动，而希望红军运动和反日运动联系起来。他对“国民会议”的口号也作了新的解释，说：“在反日反某党（指国民党）的高潮中涌现出一个和卖国的某党政府对抗的国民会议，这一革命的国民会议，是不能而且也不会由国民党政府召集的，它应当是全国反日民众自动集合的总机关，同时也是领导民众反日斗争的总机关。”他还试图把“国民会议”与“苏维埃”协调起来，把两者都作为“代替反革命政权”，实现“革命的民众政权”的途径。综上所述，我们从陈独秀的政治言论和政治行为中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尽管

① 《国闻周报》，第10卷，第17期，《陈独秀案开审记》。

② 博古：《托洛茨基主义——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先锋队》。

他是一个从党的队伍中分裂出去的阶级异己分子，但是他在反蒋、抗日、爱国这三个根本点上同党还是一致的。所以他是一个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机会主义者，而不是反革命。

根据当时的情况，我们党对于托陈派应当采取什么方针政策呢？周恩来同志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说：如改组派当时是反对我们的，但他们同南京的矛盾是可以利用的。再如第三党，对他们在思想上瓦解我们这一点应该反对、批评，但在反蒋问题上仍是可以与他们合作的。”^①如果采取周恩来所说的对待第三党和改组派那样的政策，在政治思想上、组织上，坚决彻底地划清界线，开展必要的斗争，批判他们的托派谬论，肃清其政治影响，同时在反蒋问题上同他们合作，则有利于发展革命力量。但是，当时在左倾路线统治下的中央，受苏共反托派斗争的影响，武断地认为托陈取消派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而主张“以最主要的火力打击它”，^②采取了过火的反托派的斗争方针。1932年1月1日，陈独秀以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名义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呼吁一切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提出了共产党各派大团结的口号。对此，“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回答是，我们应当记住斯大林的话，“对于托洛茨基主义最小的自由主义的或调和的态度，将是极大的濒于叛卖工人阶级的罪恶。”^③陈独秀和彭述之、罗汉一起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与党中央开个联席会，谈判合作抗日，并要求恢复党籍，回到党内工作。以王明为首的党中央的回答是：等十年再说。^④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统治下的党中央采取了过火的反托派斗争的政策，不加分析，不作区别，把托陈派完全推到反革命的一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82页。

② 博古：《托洛茨基主义——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先锋队》。

③ 同上。

④ 人方晷：《清算陈独秀》。

边，以致错误地把反革命的帽子扣到陈独秀的头上。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从右倾机会主义发展到取消主义，从党内反对派变为托洛茨基派，在错误的道路上愈滑愈远，这主要是由于他本身的立场和世界观所决定的，同时和党内斗争中的不良倾向也有关系。周恩来同志曾经指出：“‘八七’会议在党内斗争上造成了不良倾向，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而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犯了惩办主义的错误。”^①一方面陈独秀坚持错误立场，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和当时中共中央对陈独秀问题的处理上采取了简单粗暴、过分追究个人责任、无限上纲、过分打击等错误作法，这就必然促使矛盾激化，酿成严重的敌对情绪。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与党彻底决裂而走上反党道路，我们在评论陈独秀堕入托陈取消派这段历史时，对于党内斗争的这一教训，也必须加以总结，以为历史的借鉴。

^① 《周恩来选集》（上），第172页。

第五章

抗战时期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活动

(1937—1942)

一、十字路口的徘徊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和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于14日发表“自卫”宣言，从此全国抗战开始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形成，在中国共产党释放政治犯的要求下和各界人士的营救下，陈独秀于8月23日获释出狱。

伴着淞沪战役的隆隆炮声走出监狱的陈独秀，面对举国上下团结抗战的局面，又重新振作精神，企图再次登上政治舞台发挥重大作用。在抗战爆发后急剧变化的政治形势下，国内各派政治势力也都向陈独秀伸出手臂，企图争取和利用他。中国共产党主张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阶级、阶层、团体和个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改变了王明路线时期对陈独秀排斥打击的政策，转而采取争取、团结、挽救的政策。这时陈独秀在政治上处于十字路口，这对于他是一个历史的契机，使他得到一个转变政治立场、改正错误，回到党和人民队伍中来的机会。然而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因素，他在这个十字路口徘徊了一阵，没有投靠当权的国民党，也没有回到共产党，没有参加和重组第三党，也没有回到托派组织中去；而是我行我素，孤身奋斗，仍然沿着反马列主义的思想路线滑下去。

陈独秀由南京老虎桥模范监狱获释时，国民党调查统计处处长丁默村前往接应，请他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招待所下榻，他表示谢

绝,而去故友家中暂住几日便赴武汉。国民党中央日报以“陈独秀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为标题登载陈独秀出狱消息。陈独秀于8月25日给申报馆写信声明:“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给中央日报以针锋相对的回击。蒋介石派人劝他就任南京国民政府劳动部长,周佛海和张伯苓邀请他到国防参议会任职,他都断然拒绝说,我的个性不适宜于作官。朱家骅受蒋介石之命,请他组织一个新共党并答应给10万元经费,他坚决不干。陈独秀到武汉后,叛徒张国焘找上门,请他出面组织冒牌共产党,他说,“我没有这个能耐”。^①后来,当陶希圣问他是否有意组党时,他说:“如果唯物史观真是科学的,那么一个社会,一个无产阶级不会有二个党……我要是再组织一个党,或者组织不起来,要真的组织起来的话,不会比毛泽东的好些。”^②

大革命失败后脱党的谭平山,也去找陈独秀商讨组织第三党,陈说“无意于此”^③。据周佛海回忆,陈独秀出狱后,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的胡适要帮助他去美国一家图书公司写书,以安享晚年之优裕生活,他回答说,我的生活简单不用去美国。^④

陈独秀出狱后,不少托派分子先后前来请他重整托派组织,他回答说:“各奔前程”^⑤。陈独秀于1937年11月21日给陈其昌的信说:“我只注重自己的独立思想……我在此发表的言论……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从目前可以查到的资料证明,陈独秀出狱后确实在组织上脱离了托派。

①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② 《传记文学》,第30卷,第5期,第22页。

③ 《中国革命博物馆访问包惠僧记录》(《党史研究资料》,第15期)。

④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⑤ 黄纲鉴:《中国托派组织前期历史概况》。

陈独秀出狱后拒绝了以上各种政治出路，同时托罗汉到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南京办事处，要求会见叶剑英、博古和董必武，表示“陈愿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①叶剑英等三次会见陈独秀，规劝他以国家民族为重，放弃成见，承认错误，回党工作，一致抗日。陈独秀表示要去延安，叶经请示党中央后告以必须履行三项条件：“（1）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2）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3）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②陈独秀回答说：“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悔改之事确难从命。”^③陈独秀到武汉后，董必武又会见他，劝他抛弃固执与偏见，履行中央提出的三项条件，写一书面检讨，回党工作。这时陈独秀已派罗汉赴延安谈判，途中因山洪爆发，未达，在西安会见了林伯渠，林将此事报告中央。毛泽东认为，“中国托派不能与苏联的托派相提并论”，“陈独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尝不可一起抗日。”^④1937年11月20日延安《解放》周刊发表《陈独秀先生向何处去》一文，说：“当陈独秀先生恢复自由后，大家都在为陈先生庆幸，希望他在数年的牢狱生活里，虚心检讨自己的政治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列里。”反映了党中央对陈独秀采取争取教育的态度。罗汉回到武汉向陈独秀汇报了西安之行，陈独秀立即给党中央写信表示赞成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他对彭健华说：“党的路线和政策完全正确，正好在抗战过程中来发展和壮大党的力量。”^⑤

陈独秀有回党工作的愿望，党对他也采取团结教育的态度，

① 叶剑英、博古、董必武给《新华日报》的信（《新华日报》，1938年3月20日）。

② 同上。

③ 濮清泉，《中国托派的产生和灭亡》。

④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421页。

⑤ 彭健华，《回忆和陈独秀的两次会晤》（《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1辑）。

在全民族团结抗日的形势下，陈独秀完全有可能回到党内或与党携手合作抗战，但是事情发展的结果却是陈独秀走上与党彻底决裂的道路，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以为应从两个方面作具体的分析。

从我党一方来看，当党中央争取陈独秀工作正在进行，陈独秀也正在向党靠拢时，王明、康生等人出来打横炮，这是造成谈判破裂的重要原因。据张国焘回忆，1937年12月下旬，王明、康生从苏联返延安后举行了中央政治局12月会议。这次会议最后讨论了陈独秀问题。王明说：“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和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和蒋介石及其下属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也不能和陈独秀合作”。“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①接着康生于1938年1月28日和2月8日在《解放》周刊第29—30期上发表题为《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文章，诬指陈独秀为领取日本津贴的汉奸。此后武汉《新华日报》连续发表指责陈独秀为托匪、汉奸、间谍的文章。陈独秀于3月17日写了给《新华日报》的一封公开信，第二天在《扫荡报》上发表，信中说“事实胜于雄辩”，要求党拿出证据来。指责党“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事实是非”。他气愤地对包惠僧说，“老干们（指王明等人）不会欢迎我，我也犯不着找他们。”^②此后陈独秀便与党断绝联系而去走自己的路。从一定意义上说，党内的左倾错误断送了挽救陈独秀的工作。

另一方面，陈独秀出狱后继续坚持托派立场，拒不承认错误，这是不能回党工作的根本原因。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422页。

^②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陈独秀出狱后，没有去上海参加托派临委的原因是：其一，托派内部矛盾。刘仁静控制上海托派临委后曾与陈独秀、陈其昌发生激烈争斗，彭述之出狱参加上海临委使矛盾更趋尖锐。托派临委写报告给托洛茨基，指责陈独秀：“一贯在政治上采取机会主义立场，在组织上采取取消主义观点。”^①陈独秀也发信给托洛茨基，对上海临委批评指责。他斥责“彭述之死不接受教训，还在钻死牛角”。^②刘仁静到武汉去找他也不予理睬。其二，陈独秀看到在全国抗战爆发，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革命高潮兴起的情况下，托派仍坚持打倒南京政府的方针，骂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向国民党投降，很不得人心，“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小集团……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③其三，陈独秀想以组织上脱离托派取得与党联络的资格，与党谈判过程中又企图以一纸“我不是托派”的声明来代替他对过去加入托派错误的检讨。由此可见，陈独秀组织上脱离托派，并不是由于认识了以前走过的托陈取消派的道路是错误的，政治上仍然坚持托派立场，思想上仍然信奉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观点。因此党向他提出的三项条件，他只接受二、三条，拒绝接受第一条，拒绝向党检讨托派错误，并且说：“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无过还未定之天，不写，有什么过可悔？”^④陈独秀要求回党工作的思想基础是抗日救国，由于国难当头，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他凭藉一片爱国心而要求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而不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基础上来，这就不可能从根本上与党团结一致。如果陈独秀确系在铁窗五年中对过去托派错误作了深刻反省，愿意回到马

① 临委1932年7月通过的《我们对于陈独秀同志的意见》，《临委给国际的报告——关于DH同志的问题》

② 彭健华：《回忆和陈独秀的两次会晤》。

③ 陈独秀：《给托洛茨基的信》，1939年7月（《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第183页）。

④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列主义的立场上来，出狱后接受党的三项条件，即使王明、康生干扰，暂时不能回到党内来，亦可象李达那样在党外与党合作抗日，宣传马克思主义，继续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贡献。所以陈独秀拒不承认错误，坚持托派立场，是他不能回到党内来的根本原因。

④ 陈独秀一贯固执自信，一身傲骨，当他的傲骨面对国民党的威逼利诱而不为所动时，这是值得赞许的高尚行动；但是当他的傲骨对着共产党，拒绝向党检讨错误时，则使他在背叛马列主义的斜坡上一路滑下去而不能回头。

二、抗战初期的政见

陈独秀于1937年9月自南京乘船赴武汉，途中已就抗日救国问题拟定了五个题目，准备写一本抗日政见书。到武昌后，便积极撰写，并到处发表演说。陈独秀在武汉8个月发表的许多文章和讲演，后来编成《我对抗日的意见》和《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两本小册子。1938年5月，陈独秀由武汉到重庆，滞留三月余，又迁居江津县。这期间他继续发表16篇对于抗战和时局的文章和一些书信。这些文章、演讲和书信完整地表述了陈独秀抗战初期的政治思想。

（一）陈独秀的抗日政见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路线政策的某些一致点。

陈独秀的抗日政见有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团结进步的倾向，提出了许多积极正确的主张，其中有一些意见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路线政策基本一致或比较接近，主要有以下三点：

（1）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陈独秀出狱后迅速认识到托派坚持打倒南京政府，反对国共合作的极左政策已不合时宜，并公开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线。他认为在民族危急存亡的今日，全国各党各派和全国人民应当团结御侮，“国共两党为了民族危机，停止多年的内战，在军事上合力抗日，这是无可非难的事。”^①

在统一战线中，国民党是当权的大党，“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②因此中国共产党提出在服从民族斗争的前提下，“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③陈独秀赞成党的这一主张，他要求国民党在统一战线中不要一党独裁，要开放民主，使“在野党及一般人民都应有政治的自由，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④以及批评政府的自由。他在《各党派应如何巩固团结》一文中，驳斥了国民党大肆宣传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论调，说，“不幸得很，竟有人在各党派合作抗战中，提出思想信仰之统一为党派合作抗战的条件问题，这未免太过幻想了。”“如果定要拿思想信仰之统一为各党派合作抗日的条件，那只有先从事内战，肃清了异己，然后才来抗日。”“我奉劝主张统一思想信仰的人们，多做点抗日救亡工作，少发点幻想罢！”^⑤他指出，强调思想统一，则只有一党存在，根本无所谓团结合作。

1937年底，上海、太原、南京相继失陷，日本力图迅速结束对华战争，加紧对国民党进行军事威逼和政治诱降，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与国民党秘密谈判，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妥协投降倾向有所抬头。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以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时陈独秀的态度也是鲜明的，他针对国民党的妥协倾向，于1937年12月发表《打倒消极先生》和《言和即

① 张永通、刘传学编：《后期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第12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4页。

③ 同上。

④ 《后期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第89页。

⑤ 同上，第123页。

为汉奸！》两篇文章。他说：“不胜而言和，这不是和，而是妥协、屈服、投降！”“民族抗战正是提高国民精神向上之最有力的兴奋剂，一旦妥协屈服言和，由失望而悲观，国民道德之向下坠落，必一日千丈……”“南宋偏安的局面现代已经做不到了。”他要求“政府要抗战到底，人民要援助政府，使政府能够抗战到底！”^①他看到反共磨擦事件时有发生，“深恐此种磨擦如果发展下去，甚至影响抗战前途”。他提出为制止磨擦，维护团结，各党各派应当把民族利益放在党派之上，“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及其他在野党派，都公开合法存在，……而不采取招降态度；”共产党和其他党派承认国民党对抗日战争的最高统率权。

尽管陈独秀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他自己的动机和目的，在不要求国民党开放政权问题上有悖于党的独立自主原则。但是在抗日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各党派平等合作，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坚持团结合作，反对磨擦分裂这些基本点上，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一致的。

（2）主张全民抗战，反对片面抗战

陈独秀在武汉期间，已看到国民党片面抗战的危险性，竭力鼓吹全民抗战，他在回答《国闻周报》记者访问时说：“据我个人的观察，目前还只有政府的抗战，没有人民的抗战。”^②“假使民众不起来，政府的军事势力始终陷于孤立的地位”，将会“日趋于全中国灭亡之路”。^③他以阿比西尼亚败亡的教训，告诫国民政府：“如果我们还不曾忘记阿比西尼亚皇帝曾因单靠军队不发动民众而失败的教训，我们在抗日战争中，急需发动广大的真正民众……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全面抗战”应“是既定国策”。^④

① 《后期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第84页。

② 《国闻周报》，第14卷，第40期。

③ 《后期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第40页。

④ 《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568页。

他在《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及怎样得到胜利》、《怎样才能发动民众》、《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等讲演中，系统地论述了发动全面抗战的种种问题：第一，发动全民族抗战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我们的军事力量，我们的一切物质力量是打不过敌人的，我们可以战胜敌人的是我们的精神，全民族一致起来不做奴隶的伟大精神。”^① 这伟大民族精神的具体表现就是全中国人民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实行全国人力财力的总动员”，“这是我们胜利之最大保障”。^② 第二，实行全面抗战的中心是发动民众。“人力的全国动员和财力的全国动员一样，都需要民众自动。靠政府强派是不会有有多大成绩的。”“必须要使民众了解民族解放战争的意义，自动的起来参加战争才行。民众如果蜂涌起来，武装起来，自愿的参加战争，那么，不但正规军的补充不成问题，并且还有大量的游击队，辅助正规军作战，这才是人力的全国动员”。第三，如何发动民众。（1）必须解除民众自身痛苦。广大农民受着贪官污吏、地主、保甲长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怎会有抗日的情绪”。（2）必须让民众自己组织团体，官办的招牌的没有民众的民众团体，在抗战中，除禀承上官命令发几个通电外，是不会有任有力量的。（3）必须让人民有政治自由。他认为没有这样的“大发动”，是不能抵抗“站在我们眼前凶恶而有力的敌人，挽救国家民族之危亡的！”^③

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在如何抗战问题上存在两条不同抗战路线的分歧。1937年8月，党的洛川会议明确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陈独秀的全民抗战的主张基本上符合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他提出的“抗战中应有的纲领”十条，也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

① 《后期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第81页。

② 同上。

③ 《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565页。

十大纲领基本一致。

(3) 在抗日战略上持久战和消耗战的观点

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向全国人民指明抗战的前途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战略方针，科学地阐明了抗日战争的客观规律，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陈独秀有感于中日战争的现状和中日两国的现状，认为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应扬长避短，由此而提出了一种朴素、自发的持久战观点。他于1937年11月，接受陈斯曼访问时说：“我们足以制日本于死命而获得最后胜利的把握在于‘持久战’，抗战愈能持久，则胜利的把握也愈大。”^①他主张持久战的理由是“日本对中国作战，利在用飞机大炮，速战速决，尽可能的不使战争范围扩大；中国对日战争，利在发动全国民众蜂起参加，持久抗战，尽可能的使战争范围扩大，以消耗敌人军力和财力。”^②他认识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单凭军事决战不能取胜，必须实行持久的全面抗战，才能长期消耗敌人而最后战胜敌人。他说：“单靠政府手中所有的一点飞机、大炮、坦克车，对日作战，不啻以卵投石。只要全国广大民众无束缚的自由组织起来，活跃起来，武装起来，敌人便无法摧毁这到处蜂起的几千万武装民众，这几千万武装民众之游击战的洪流，不但能够使政府的正式军队有反攻之可能，并且使敌人已经占领的地方，一夕数惊，不能统治，如此敌人越深入占领的地方愈扩大，它们危险便越厉害。”^③应当说陈独秀的这些见解是十分锐敏和难能可贵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同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理论相吻合。但是他的持久战观点，不是建立在对中日战争客观规律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不能成为科学的军事理论，只是一种比较清醒的战局观察而已。所以武汉失守后不久，随着形势的日益恶化，他又很

① 陈斯曼：《陈独秀先生访问记》，1937年11月2日。

② 《后期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第93页。

③ 《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581页。

快抛弃了这些论点，并发表许多与这些论点相矛盾的悲观论调。陈独秀的持久战观点与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只在一段时间里保持一致。即使如此，亦应肯定。

已经叛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拒不悔悟托派错误的陈独秀，为什么在抗战初期发表了许多与党的方针政策相符合和相接近的政见？这是由特殊的历史条件和陈独秀这个人物的特殊性所使然。这特殊的历史条件就是民族敌人深入国土，民族矛盾上升为压倒一切的主要矛盾。除极少数汉奸外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能不赞成和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全国各党各界各派和全国军队、政府、人民、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的号召。陈独秀这个人物有许多不同于一般政治人物的特点，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他终身都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即使被开除党籍，背叛马列主义之后仍不失为一个爱国者。他始终具有强烈的民族感情和一颗热烈的爱国之心，他在狱中和出狱之后为民族危亡、山河破碎而痛心疾首，痛斥一切丧失民族气节的汉奸败类，斥责他“多年尊敬的老朋友”周作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枪尖指挥之下，在日本帝国主义走狗——中国的汉奸卖国贼领导之下高谈中国文化再生，这不能不是人类文化之奇耻大辱！”^①

由此可见，陈独秀抗战初期政见与党的方针政策的某种一致性，是在爱国主义思想基础上的一致，而不是马列主义思想基础上的一致；是在抗日救国，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问题上的一致，而不是在中国民主革命纲领上的一致。

（二）在抗战的性质、目的和战略指导路线上，陈独秀同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分歧。

深入到抗战的性质、目的及抗战胜利后建立什么样国家等问题上，他又同党发生根本原则上的分歧：

^① 陈独秀：《告日本社会主义者》（《后期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第168页）。

(1) 关于抗日战争的性质和目的

陈独秀并没把抗日战争仅仅看作中日之间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军事战争，还认为它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当陈独秀谈及抗日救亡种种问题时，如上所述确有不少积极正确的主张，但是当他把抗日战争同中国民主革命基本问题联系起来观察时，便暴露了他仍然顽固地坚持着反马列主义的“二次革命论”。

他否认当前中国仍旧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说：“中国此时还是一个‘初期资本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居领导地位”，“资本主义在中国，还大有发展之余地。”^①“如果人们不敢断言中国此时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制发展工业，这必须毅然决然采用资本主义制来发展工业。”“我们只认为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过程，要来的东西让它快点来不要害怕他。”^②他认为中国近代六七十年来的改革与革命的大运动，都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和科学。“第一次，李鸿章改革；第二次，戊戌维新；第三次，辛亥革命；第四次，北伐运动；今日的抗战乃第五次”。^③完全抹杀了中国民主革命自五四运动之后有了新、旧之别，把抗日战争当作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在此思想指导下，他认为：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乃是脱离帝国主义之压迫与束缚，以完成中国独立与统一，由半殖民地的工业进到民族工业，使中国政治经济获得不断的自由发展之机会。”^④

抗日战争的最终目的是“推翻帝国主义者所加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障碍”，^⑤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近代工业。

① 《资本主义在中国》（《后期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第146页）。

② 《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后期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第176页）。

③ 《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540页。

④ 《抗日战争之意义》（《后期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第38页）。

⑤ 《抗战中应有的纲领》（《后期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第89页）。

抗战建国就是建立一个“近代国家”，其内容是“民族的国家独立与统一”，“立宪政治之确立”，“农民解放”，“民族工业之发展”。说穿了就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

陈独秀仍然以“二次革命论”的反马列主义观点，观察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以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分析抗战的性质、意义和目的，攻击党的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相衔接的论断是：“超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幻想”，^①反对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因而在抗战指导路线上与党发生原则分歧。1938年5月陈独秀迁居江津期间，同党的分歧日益加深，以致公开攻击党的抗日路线和方针政策。

（2）关于抗战指导路线

第一，否认中国共产党对于抗日战争的领导权。

陈独秀认为抗战中的国民党政府已成为民族资产阶级政府。他于1938年8月8日撰写的《我们为什么而战》一文说：“国民政府对于工商业，对于币制，对于交通，对于军事，都沿着资本主义发展的路，着手建设”，“而企图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新兴国”。^②既然抗日战争的目的是“建设民族独立的国家，以发展民族工业，以完成辛亥革命所未完成之任务！”^③当然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是领导全国抗战的唯一政党。“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以在野党资格绝对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率权这一事实，”^④他要求在野党应避免“地位之竞争；”^⑤反对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敌后抗日民主政权。他攻击党的独立自主原则说：“民族垂危的今日，在野党派应该口心如一的研究政府抗战，获得胜利，

① 《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后期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第132页）。

② 《后期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第160页。

③ 《辛亥革命之回顾与前瞻》（《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551页）。

④ 《后期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第122页。

⑤ 同上。

不应该有保存实力趁火打劫的企图。”^①虽然他也尖锐地批评国民党政府的达官贵人，生活豪华，狂嫖滥赌，人民侧目，但其目的是为了为了使国民政府洗刷污浊，负起领导全国抗战的责任。

第二，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

陈独秀把抗战胜利的希望主要寄托于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他讲组织民众，发动民众都是为了帮助、配合政府抗战。他轻视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说游击队只有“属于正规军指挥”，“与正规军配合起来才能起较大的作用”。^②他攻击党领导人民军队深入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是“以最前进的政党自命的蠢材，大反其‘唯武器论’和大唱其‘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大吹其‘大刀旋舞起来’，‘皇军’便要发抖的法螺。”^③他攻击党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农村工作为重心，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是“闹出了‘山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笑话，所以才有依靠农村攻取城市的错误路线”。^④说“如果我们执迷不悟，过分的估计游击队和游击战术，无意识的帮助敌人更容易的占据了我国全国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游击队布满了全国的农村和小城市，甚至避开敌人的势力在偏僻地方建立一些可怜的边区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国！”^⑤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和“左”倾机会主义者王明这两个历史上的冤家对头，竟然在反对党的抗战指导路线上走到一起来了。他们都一致地否定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反对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一致地否定敌后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地位，反对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路线，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原因正如斯大

① 《后期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第137页。

② 《论游击队》（《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612页）。

③ 《民族野心》（《后期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第143页）。

④ 《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598页。

⑤ 同上，第613页。

林所说：“右派和极‘左派’实际上是双生子，……他们都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①抗战初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本质未变，王明则由“左”倾转向右倾，成为新陈独秀主义，两者都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统一的思想路线。

三、最后的政治见解

陈独秀自1938年5月迁居江津县城内，居住不到一年。1939年7月，又迁居到江津县郊外30余里的鹤山坪，在这个荒僻的山村里，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三年。这期间法西斯势力横行世界，大半个中国沦丧，国共关系日趋紧张。陈独秀在孤寂的生活中，政治上消沉，思想上颓废，在叛离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愈走愈远，成为孤家寡人，孑然一身，而又至死不悟。这三年中，陈独秀发表的论文和给友人的信，汇编为《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

陈独秀的最后政治见解中反苏、反共，顽固坚持资产阶级民主观，肆意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完全彻底地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对世界前途和中国抗战前途悲观失望

抗战初期，陈独秀对中国抗战前途十分乐观，充满必胜的信心。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国际法西斯势力的猖獗，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溃败，他便由乐观转为悲观，由信心十足转为绝望和哀叹。

1939年9月，德国突袭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法西斯势力很快席卷大半个欧洲。日本为了把中国变为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对国民党政府加紧政治诱降，

^①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9页。

同时向西北和四川发动军事进攻。1940年5月，宜昌失陷，重庆受到威胁。英美为了应付欧洲紧张局势也对国民党劝降，以牺牲中国换取对日妥协。在国民党大后方，恐惧法西斯势力和对日妥协的空气甚嚣尘上。

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对世界的前途，人类的命运十分悲观，眼前是一片漆黑。他认为此次世界大战不外三种结果：“一是英美和德日不分胜负而议和；二是胜利属于英美；三是胜利属于德日。第一种结果之可能性最少……，第二种和第三种以何者最大呢？”“我们估计……德日胜利的可能较大。”^①陈独秀预测的三种结果完全排除了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力量胜利的可能性。他还说，在此次大战中希望弱小民族，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简直是作梦，“他们将感觉着由欢喜的天国堕落到悲哀的深渊。”^②他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将要失败的悲观估计出发，为人类的前途勾勒了一幅阴森可怕的图画。在这幅图画中，“将来法西斯蒂专政会和以前的专制一样，普遍的发展，而且形成历史上——整个时期，亦即每个时代民主制向前发展之先，都经过一专制黑暗时期”。^③虽然他说看清这“可愁的趋势”是为了“加紧主观上的努力，在此次大战中，彻底击溃希特勒及其伙伴之势力”，然而他根本不相信社会主义苏联和世界人民具有击败世界法西斯的力量，这种所谓“加紧主观努力”不过是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④的空谈而已。

他对中国抗战前途的估计中，根本无视敌后解放区战场已经成为抗日的主要战场，解放区军民抗击了侵华日军60%以上和几乎全部伪军这一事实，仅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溃败而得出

① 《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后期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第211页）。

② 同上。

③ 《再论世界大势》（《后期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第221页）。

④ 同上。

失败主义的结论。他说：“中国目前的局势有三个前途：（1）经英法等国调停，蒋介石承认日本之要求而屈服；（2）蒋介石政府退守四川、贵州、云南，事实上停止战争”；“如果蒋介石政府不能从云南获得英法物资接济，连守住川云贵都没有把握。”

“（3）日本攻入云南，蒋介石逃往国外。”^①这三个前途竟然全是中国的失败，只是失败的程度有所不同。这时的陈独秀正如他自己所说，是由抗战初期“喜欢的天国，堕落到悲哀的深渊”，而在偏僻的四川山村发出阵阵的孤鸿哀鸣。

（二）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制度

1939年至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时，国际法西斯势力，英美法西方国家和社会主义苏联这三大集团之间的矛盾、角逐十分复杂。陈独秀地处荒野山村，坐井观天，不了解全局，只凭一点报纸、电台广播消息，便以其主观主义的偏见对国际形势进行完全错误的分析和揣测，对苏联的内外政策全盘否定，大肆攻击。

他把这次大战的参战国划为两条战线：以英、法、美等民主国家为一方；以德、意法西斯国家为一方。说日本还不是法西斯国家，却把苏联与德意法西斯国家并列称“俄德意法西斯制”，说莫斯科、柏林、罗马“这三个反动堡垒，把现代变成了新的中世纪”，“此时人类若要前进，必须首先打倒这个比中世纪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国社主义与格柏乌政治。”^②这真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连罗斯福，丘吉尔都不能接受的奇谈怪论。

陈独秀为什么把苏联列为法西斯国家？这是有其缘由的。

（1）他认为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对外政策完全背叛了国际主义。

^① 《给托洛茨基的信》1939年7月。

^② 《给西流的信》，1940年9月。

“放弃了以世界革命为中心的政策，代之以俄国民族利益为中心的政策”。^①他对苏联最为反感者有四件事：其一，他认为苏联在中日战争一开始便“应该以领导中国对日抗战为它自己的责任，并且应该出兵参加战争”，这才是国际主义态度。^②苏联没有这样做，才使日本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上海、南京和武汉。其二，他针对1939年8月，苏联出于策略考虑，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协定，说“苏联仍旧站在国际社会主义的立场，便不会和希特勒妥协”，^③背叛被侵略的民族，指责第三国际“实际站到希特勒方面”。^④其三，1939年9月，德军进攻波兰，苏联为了在本国西部建立一条“东方战线”，出兵进占波兰东部地区，他认为这是苏联“伙同法西斯蒂瓜分波兰”。^⑤其四，1939年底，苏联为了防止德国利用芬兰边界进攻列宁格勒，以战争手段强迫芬兰割让和租借芬兰湾一些岛屿及部分领土，他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列强行为，并斥责重庆《新华日报》“为苏联征伐芬兰辩护。”^⑥

诚然，苏联在二次大战中确有一些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错误。但是从总体来说，苏联基本上奉行国际主义政策，是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主力军和坚强堡垒。苏联军队和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了举世公认的伟大贡献。陈独秀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偏概全，以至人妖颠倒，敌我混淆，把社会主义苏联与德、意法西斯相提并论。

(2) 由仇恨斯大林发展到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陈独秀自大革命失败后，对斯大林的仇恨与日俱增，认为他

① 《被压迫民族之前途》（《后期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第231页）。

② 《后期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第232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给连根的信》，1940年9月。

⑥ 《给西流等的三封信》，1940年3月2日。

的一生毁于斯大林，在南京狱中还写了一首《告少年》的五言长歌，讽喻斯大林是一个“云雨翻覆手，信义鸿毛轻，食人及其类，勋旧一朝烹”的大疔疫鬼。^①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把自己对于斯大林镇压托派的旧仇与大国沙文主义的新恨联系起来，称斯大林是和希特勒一样的大独裁者。并且寻根求源，认为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斯大林独裁。他说，“斯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制……并非斯大林个人的心数特别坏些。”“斯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达”，“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②他由此得出结论：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必然产生独裁者。于是，他把斯大林与希特勒相等同；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相等同；把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与德国的法西斯统治相等同。并且说：“苏俄政制是德意的老师。”^③

（三）顽固坚持资产阶级民主观

陈独秀晚年恶毒攻击社会主义苏联的同时，大肆吹捧资产阶级民主制。他认为，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的独裁统治”都是由于资产阶级民主制遭到破坏的结果。说苏联“十月以来，拿‘无产阶级民主’这一空洞抽象名词作武器，来打毁资产阶级的实际民主，主才会有今天斯大林统治的苏联，意德还跟着学话”。^④他根本否认无产阶级民主，认为事实上只有资产阶级民主，“并不是在内容上另有一个无产阶级民主政治”。^⑤他从资产阶级民主观出发，

①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② 《给西流的信》，1930年9月。

③ 同上。

④ 《给连根的信》，1940年7月31日。

⑤ 《传记文学》，第30卷，第5期。

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归结为民主与法西斯之争。英、美、法代表民主，德、意、俄代表法西斯。说：“此次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将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英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①他说：“我根据苏联20年的教训，深思了六七年”，才得出这个从资产阶级民主走向大众民主的见解。由此可见，陈独秀最后的政治见解，就是彻底背叛社会主义，重新坚持他曾经抛弃过的资产阶级民主制，顽固坚持资本主义道路。

陈独秀这一最后的政治见解得到了许多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极口称赞和热烈喝彩。胡适1948年专门编辑出版《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一书，并作序说：“我觉得这几封信，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稀有的重要文献”，“是独秀自己独立思考的结论”。“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只有他能够大胆的指摘‘自列宁、托洛茨基以下’均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真实价值。”^②傅斯年说：“他的精神到底是法兰西革命的产品”。^③美国和台湾的一些反共学者发表评论，认为陈独秀是从科学民主出发，经历了误入共产主义歧途的教训，最后又回到民主立场上来。“他摆脱了俄国革命的影响，而回到五四运动的时代去了”。^④

陈独秀是回到了五四运动时代去了吗？否！

五四时期陈独秀提出的科学民主口号，是反对封建专制和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思想武器，最后见解的民主观则是吹捧帝国主义、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武器。五四时期陈独秀高举着科学民主旗帜，是积极的、进取的、振兴中华的旗帜，最后见

① 《给西流的信》。

② 《传记文学》，第30卷，第5期。

③ 同上。

④ 同上。

解的民主观则是反动的、倒退的阻碍中国历史前进的反动思想。五四时期陈独秀的科学民主观，是他由民主主义道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经阶梯，最后见解的民主观则是他背弃社会主义，顽固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宣言书。

历史证明，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的是艰苦抗战中的中国共产党。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则完全是五四精神的反动。

四、陈独秀晚年的生活和学术活动

陈独秀晚年在政治思想上彻底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走进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死胡同，并且死不回头，因而理所当然的被党和人民所抛弃。但是，他始终保持了一个爱国者的民族气节，保持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清高、孤傲的风格。

他栖身荒僻山村鹤山坪的大部分时间里，居住在一个清朝进士杨鲁承的旧居石墙院内。住的是一间上无天花板，下是泥土地的民间瓦房，^①另有一间书房和厨房，由潘兰珍伴随作



^① 《后期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第14页。

家务。经济来源靠写文章拿点稿费 and 担任《时事新报》主笔，每月得到一点津贴。每逢生病，医药费开支亦甚困难，有时得到一些老朋友和北京大学同学会的资助，有时靠典当度日。“贯休入蜀唯瓶钵，山中多病生死微。岁晚家家足豚鸭，老馋独噬武荣碑。”^①这首自撰诗正是他晚年生活的写照。但是，他虽然陷于贫困潦倒之中，也绝不为五斗米向国民党权贵折腰，从不接受一文不义之财，而安于清贫自立的生活。在鹤山坪，他撰写了一本文字学手稿，定名为《小学识字教本》，准备陆续在江津县白沙国民党教育部的一个出版机构印刷发行。但是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要更改书名，他宁肯不要预支给他的两万元稿费，也坚持一字不动。1941年3月，朱家骅赠陈独秀5000元，由张国焘转寄，陈将其原封退回，托郑学稼转交回张国焘，并附信说：“却之不能，受之有愧，以后万为我辞。”^②罗家伦、傅斯年等人也曾登门向陈独秀赠款，他拒不接收，并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救济。”^③当时曾任国民党中央军校特训班教官的任卓宣同情陈独秀的清苦，寄去200元钱，亦被原封退回。^④陈独秀病危之中，仍叮嘱潘兰珍说：我死后切莫拿我卖钱，“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后来潘遵嘱拒绝了许多赠金，江津的一些地方人士也称赞陈独秀晚年人穷志不穷。

陈独秀晚年在贫病交加之中，仍埋头学术研究，他深居简出，终日埋头写书。用了一年多时间校正杨鲁承遗著，一本名为《杨鲁承先生谈〈皇清经解〉手稿》，一本名为《杨鲁承先生遗作六种》。他的主要精力是整理和撰写文字学书稿。抗战期间在《东方杂志》发表的文章有《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中国古史表》、《禹治九河考》

① 《后期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第13页。

② 郑学稼：《陈独秀先生晚年的一些事》（《传记文学》，第30卷，第5期）。

③ 《党史文汇》，1986年，第4期。

④ 《我与陈独秀先生》（任卓宣先生补充发言），《传记文学》，第30卷，第5期。

等，这些文字学著作曾汇编为《小学识字教本》。合字形、字义、字音的研究为一整体便是小学。陈独秀的《小学识字教本》，集一生文字学研究之成果，不拘泥于《尔雅》和《说文解字》，具有自己的创见，但一直未能出版，只在江津白沙油印过一部分，后来由梁实秋带到台湾。1970年由台湾中国语文研究中心整理影印，称《文字新诠》，这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为545个“字根”和“半字根”作诠释，下篇只诠释了366个“字根孳乳字”，最后一个“抛”字还没有诠释完就去世了。如果说陈独秀最后的政治见解完全是污泥浊水，那么他的文字学著作却堪称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一颗闪光的明珠。

陈独秀在鹤山坪的岁月里，已是风烛残年。身患有胃溃疡，又有高血压，生活清苦，营养不良，病情日益加重。据陈松年说：“一日，忽有客自远方来，父亲格外兴奋，多吃了些马铃薯，便肠胃梗塞，引起发高烧，心脏病发作，又不慎跌交中了风，一星期后，三病迸发，心脏扩大而停止了跳动。”^①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孤独寂寞中悄悄离开人间，终年63岁。

陈独秀是以彻底背叛马克思主义而终其一生的，他晚年亦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于1941年12月23日致郑学稼的信中说：“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之价值。”“更不屑以布尔什维克自居也。”^②还说他重新估价布尔什维克理论时，“非以马克思主义为尺度也。”^③陈独秀应当得到的盖棺定论，无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叛徒，但不失为一个爱国的学者，他的悲剧在于他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还自以为是在总结一生经验，探觅经世济民之良策而死不悔悟。

① 沈寂，《再访陈松年谈话记录》（《陈独秀评论选编》（下），第326页）。

② 《传记文学》，第30卷，第5期。

③ 《给S和H的信》，1941年1月19日。

结 束 语

纵观陈独秀坎坷曲折的一生，前半生是从一个儒门秀才出发，而又同封建主义绝裂。辛亥革命时期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五四时期成为高举科学民主大旗的激进民主主义者，进而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大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者。这一时期他驰骋政坛，叱咤风云，大刀阔斧，冲锋陷阵，向旧势力开战，不愧为一个投入时代洪流，奋勇搏击前进的弄潮儿。但是陈独秀的后半生，从大革命失败走上托陈取消派的道路，便完全丧失早年生气勃勃的革命、进步作用，成为阻碍革命事业前进的反面人物。

从陈独秀早期到晚期这种变化中，我们应得到一点什么启示呢？

任何个人，即使杰出的历史人物，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参加到历史前进的行列中去，绝不能违背历史发展方向，一意孤行。马克思说：“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①在中国近代历史行程中，也可以看到这样一幅图画：康有为、梁启超乘甲午之风云，公车上书，维新变法，救亡图存，演出了壮怀激烈的戊戌维新运动。康、梁成为时代之骄子，学子之楷模，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改良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页。

代表了时代前进的要求。然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已风起云涌，康、梁却死抱住改良主义不放，又演出了一场小小的保皇闹剧。昔日之骄子，成为人们所不齿的小丑。五四时期的陈独秀，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呼唤新文化运动的风雨，遂取代康、梁而成为青年之导师，思想界之明星，这是因为科学民主代表了五四时期历史前进的要求。五四运动之后，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风雷激荡之中，他逐步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这也是顺应了时代潮流，因而才有南陈北李齐名，蜚声中外。但是，当他背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要求，妄图以取消主义阻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继续前进时，便每况愈下，最后落得只身孤影，在四川偏僻的山岗上，发出几声孤鸿哀鸣。所谓最后的政见，只是被人们看作晚年的陈独秀演出的一出无足轻重的笑剧而已。

古今中外一切伟大的历史人物，其所以伟大在于他能正确地了解他所处时代的条件和特点，他们的言行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否则伟大就变成了渺小，英雄就变成了小丑，明星也就会变得暗淡无光。

* * * *

本书初稿完成后，承蒙茅家琦教授和张永通副教授审阅书稿，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谨此致谢。